

曾國藩

中國歷史
研究會
叢書

第三輯

學術先進

蕭一山編著

主編

潘印
公維
展廉

勝利出版公司印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曾國藩

定價國幣叁元伍角

(外埠酌加郵運匯費)

編著者蕭一山

發行人印維廉

總發行所 勝利出版公司
南京中山北路三三三號

上海發行所 上海廣東路一七〇號

北平發行所 北平和平門內北新華街一號

經售處 各埠各大書局

民國三十五年三月初版

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平版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782.877 特藏

4412

臺灣省立臺中圖書館



31120003586392



第三輯

學術先進

朱一山 編著

勝利出版公司印行

作者小傳

蕭一山先生，現年四十二歲，江蘇銅山人，國立北京大學畢業。嗣復赴英，在劍橋大學研究。歷任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北平師範大學、中央大學教授，北平文史政治學院、河南大學文學院、國立東北大學文理學院院長，暨河南歷史研究所所長、廬山峨眉訓練團特聘教官、中央訓練團講師兼指導員等職。先生學識淵博，著作等身，治清史尤精，爲我國當代史學權威。重要著作，計有「清代通史」（商務）、「清史大綱」（待刊）、「太平天國叢書」（商務）、「清代學者著述表」（商務）、「太平天國詔諭」（國立北平研究院）、「太平天國書翰」（同上）、「近代秘密社會史料」（同上）、「非字館文存」（文通）、「民族之路」（黃埔出版社）、「大英政府文書總目」（英文本）、「經世釋義」等。其中「清代通史」一書，尤爲學者所宗。本書爲先生冒暑寫成，於會國藩學術思想，抉發至爲精翔，見解亦超恆流，爲不可多得之力作。現任國民參政員，部聘教授兼國立西北大學文學院院長。

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編纂趣旨

潘公展

國於天地，必有興立。我中華民族，立國迄今，垂五千年，並世國家，其文化之悠久，殆無其倫。近百年來，他從一個堂堂大國，淪爲被人輕侮凌辱的次殖民地，不平等條約的桎梏，幾乎把他束縛得透不過氣來，於是有由懼外而媚外、精神上喪其所守的趨勢。不但外人往往以爲中國已無可爲，卽國人亦幾懷疑其立國之道是否還能存在。到了國父倡導三民主義，鼓動國民革命，數十年間，民族意識的火炬始復大放光明，而尤其自抗戰軍興，全國軍民在總裁領導之下，作堅苦卓絕的鬥爭，把世界上所謂三大強國之一的日本，打得日暮途窮，陷入毀滅的深淵，於是全世界人士方曉然於中國的立國精神確有可以珍視者在。

抗戰一開始，總裁就昭告全世界的人士說：「我們是有無窮的威力」。這「無窮的威力」是什麼？中國的敵人絕不瞭解，中國的友邦也未必開始就瞭解，就是參與抗戰的全國軍民恐亦未必都全能瞭解。祇有讓事實來說明這個真理。

我們這雄偉壯烈的神聖火燄，在持久而普遍地燃燒着；它照耀着東方，也照耀到西方。全世界的人民，在驚奇，在禮讚。不瞭解的人說這是神祕的奇蹟，一個永遠猜不透的謎。祇有真知灼見之士才由此而逐漸地體認出中華民族力量之雄厚，是導源於優良的

文化傳統與民族精神；他們一面歌頌這世界古國的新生，一面却大聲疾呼的要效法「中國精神」。尤其是英國牛津大學的教授們，一語道破，他們說：「英國人士對中國文化學術之真義的價值，過去不無疑惑之處。但時至今日，一方鑒於狹義國家主義的橫暴相仇，一方感於中國反日態度的莊嚴鎮靜，究竟誰爲世界文化的領導者，現在我們可無疑義了」。

這優良的文化傳統與民族精神，蘊蓄在每一個中國人的血液中，溶化而成爲自尊自信的高尚德性；更由這種自尊自信的高尚德性，凝結而爲自立自強的堅強力量。這種力量是內蘊的而不是外鑠的，是持久的而不是偶發的，是積五千年治亂興亡的洗鍊，而創造成爲至大至剛的民族精神。在平時，我們是生於斯、息於斯而不自知，可是一遇到國家危急之秋，祇要有賢明領導者振臂一呼，把全國的意志力量集中起來，則平日蘊蓄在每一個國民血液中的潛伏力量，便如疾風驚電，有觸即發，無堅不摧。這沛然不可抵禦的民族力量，是導源於四萬萬人的同德同心，而表現在舉國上下的共生共死。我們愈戰愈强的原因在此，我們「威力無窮」的關鍵亦在此。

這就是外國人所尊敬而要效法的「中國精神」！

近百年來，如果我們全國上下能够發揮「中國精神」，何致慘遭五千年來未有的變局，把民族生機斲喪殆盡？而最可痛心的，是我們在抗戰四五年之後，民族中還不免有

自輕自賤的渣滓存留着。在長沙三次大捷的消息傳出後，居然還有一些中國人說這是受英美太平洋參戰的影響，而有些人還公然把異邦看作祖國，這真是道地的「文化奴隸」。文化奴隸們是僅僅具有中國人的軀體，而根本實已喪失中國人的靈魂。因此我們從事文化工作者，更應當倍加努力，不僅要珍重和寶貴這「中國精神」，並且還要發揚光大；拿這聖潔的火燄，去焚化那些醜態百出的民族渣滓。——這是我們編纂這套「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的主要動機。

我們編纂這套故事集，既不是整理國故，也並非懷古幽思，更談不上復古傾向。它祇有一個目的，就是希望在建國文化的坦途上，貢獻力量，建築小小的基石。我認爲建國文化是建築在兩大基礎上：第一是發揚固有的優良文化，從根救起；第二是吸收最新的科學工藝，迎頭趕上。這套故事集就是第一個基礎上的許多基石之一。

有人說，我們發揚固有文化，應當着眼於全社會或全民族，何必要先致力於名人傳記，宣揚這些一姓一家或少數人的事蹟？這種見解，似是而實非。要知道歷史上所稱的偉人，也就是代表這個民族文化的結晶；要了解我民族文化的精髓，必先要研究這些偉人的事功學術及其影響。因爲多數人的活動，往往受少數人的感召，如夏禹的治水，孔子的教育，秦始皇的統一，成吉思汗的遠征，國父的革命等等，並非一人一姓之功，而是全民族精神力量的總表現。況且我們敘述的方法，也不是爲某一個人作年譜，而是

着眼於他對全民族的貢獻。現在我們發揚固有文化，決不是復古運動，而是含有「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的重大意義，所以就歷史上選出若干偉大人物，描寫其所以成爲偉人的精神所在，其影響自更可深刻動人。譬如敘述夏禹治水，僅僅敘述事實，還不如描寫夏禹用什麼精神和力量治水而成功。因爲夏禹治水的事實，在今天自然不會全部重演，而像夏禹這位民族偉人，有志的青年自都可以「有爲者亦若是」。有了一位夏禹，已經能够扭轉乾坤，假使有許許多多夏禹，試想中國對世界的貢獻將如何偉大！由此可見本書的任務，雖是檢討過去，而實際上未嘗不含有創造將來的使命。

我們一向衡定人物的標準，不外「立德」、「立功」、「立言」三者。這套故事集也大體上採用此法。有大德於天下，永爲國人頂禮膜拜者，爲民族偉人：列第一輯。有功勳於國家，或其事功人格足以激勵青年者，爲歷代賢豪；列第二輯。學術思想照耀千古，堪爲我民族文化的結晶或代表人物者，爲學術先進；列第三輯。共凡三輯，都三十冊，如有必要，亦得增減。如此，分讀可以知我民族精神之所寄託，合讀則可了解我民族文化的全貌。爲了普及宣傳，故寫作方法力求通俗，使讀本書者如看傳記文學。爲了節約紙張，各書的內容重質不重量，每冊的字數也以五萬字至八萬字爲度。

承各位專家學者熱忱襄助，使我這個志願得以圓滿成就，由衷的感激，實非筆墨所能表達。現既編纂就緒，刊行有日，謹將本人編纂本集的動機和志願，奉告讀者。



曾國藩像

目次

| | | |
|-----|----------|-----|
| 引子 | …… | 一 |
| 第一章 | 家庭環境 | 一一 |
| 第二章 | 經世之禮學 | 二五 |
| 第三章 | 學術背景 | 四一 |
| 第四章 | 思想體系 | 六五 |
| 第五章 | 天才與志氣 | 九三 |
| 第六章 | 京官時代的政論 | 一〇三 |
| 第七章 | 編練湘軍及其特點 | 一二一 |
| 第八章 | 太平天國的平定 | 一四一 |

引子

上相南征策衆材，
軍容十萬轉風雷，
書生却進安民策，
盜弄潢池事同哀！

這是我國近代一位偉大的人物——曾國藩送唐鏡海先生詩，
海那有這樣的功業呢？說起曾國藩來，一般人總要聯想到太平天國的天王洪秀全，洪秀全承襲天地會的餘緒，啓發民族革命的偉業，爲社會主義作先導，當然不能算「盜弄潢池」，



蕭一山編著



但是清朝人都稱他作長毛賊，而十五年的天國，居然被一個書生打平了，這不是很可哀的事嗎？清末民初的革命黨人，繼洪楊而倡排滿運動，建民國而復皇漢聲威，不免就要唾罵曾文正公了。章炳麟是當時激烈派的代表，他曾經說過：「曾國藩者，譽之則爲聖相，讞之則爲元凶，要其天資，亟功名善變人也。始在翰林，豔舉聲律書法以歆諸弟，稍游諸公名卿間，而慕聲譽，沾沾以文詞蔽道真。金陵之舉，功成於歷試，亦有羣率張其羽翮，非深根甯極，舉而措之爲事業也。所志不過封徹侯，圖紫光。既振旅，始爲王而農行遺書，可謂知悔過矣。其功實方諸唐世王鐸鄭畋之倫。世傳曾國藩生時，其大父夢蛟龍繞柱，故終身癩疥如蛇蚶，其徵也。凡有成勳長譽者，流俗必傳之神怪。唐人謂鄭畋之生，妊于死母，其誇誣蓋相似。死三十年，其家人猶曰：『吾祖民賊』。悲夫，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見檢論雜誌）。以民族罪人加諸曾國藩而託之於其子孫之口，真是他的「魂魄猶有餘羞」嗎？可是章炳麟又以英雄許之，說：「曾左之倫，起儒衣韋帶間，驅鄉里服耒之民，以破強敵，宗棠又能將率南旅，西封天山，置其叛逆，則上度皇甫規嵩，下不失爲

王鐸鄭畋，命以英雄誠不虛」（檢論對二宋）。更推論他的爲人治蹟，說道：「湘軍之夷洪氏，名言非正也。洪氏以夏人撻建夷，不修德政。而暴戾是聞，又橫張神教以軼干之，曾國藩左宗棠之起，其始不過衛保鄉邑，非敢贊清也。當是時駱秉章向榮獨知向義，……湘人雖蔑易秉章，又甚惡向榮爲人，卒不能干正義，故其檄書不稱討叛，獨以異教愆禮數之。洪氏已弊，不乘方伯四岳之威，以除孱虜而流大漢之豈弟，是以沒世不免惡名。然其行事猶足以愜人心者，蓋亦多矣。……曾左知失民不可與共危難，又自以拔起田舍，始出治戎，即數爲長吏牽掣，是以所至延進耆秀，與共地治，而殺官司之威。民之得伸，自曾左始也。……終身衣不過大紬，食不過一肉，時時與人圍棋宴遊，或具酒肴，雜以茶茆，言談時及載籍，文辭恢喁間之，其山澤之儀不替也。故其下吏化之，不至於姦，初政十年，吏道爲清矣。……夫此諸將帥者，倨讓不同，寬猛亦從其性也，而皆體任自然，不好苛禮，不擾四民，不徇污吏，不畏強死。羣校所推，以曾左爲主。雖下未齒王道謝安之流，誠令監視一國，輔以知遠，而軌以法程，亦可以垂統矣！」（檢論近思）。可見就是

怪僻的章炳麟除民族大義一點外，也不能不佩服曾文正公，「行事足愜人心」，共治伸張民權，「體任自然」，「吏道爲清」，是一個「可以垂統」的人物哩！要說他「不乘方伯四岳之威，以除虜虜而流大漢之豈弟」，就是他「沒世不免惡名」的原因，那更有點冤枉！章先生既知道他「不敢贊清」，而以「異教愆禮」數洪楊，足徵國藩是爲文化而戰爭，爲宗教而戰爭，自不能以民族大義責之！據傳說：彭玉麟始終不願做清朝的官，即有羞事異族之義，並曾勸國藩自主東南；英人戈登也勸過李鴻章，他們爲什麼都不敢作呢？我們試一看左宗棠的性格，那樣豪邁不羈，他曾見過洪秀全，勸以仍用孔孟學說，秀全不聽。後來他立功邊徼，氣凌朝右，尙不免懍殿陛之森嚴，以天威爲可畏，就可以知道在幾千年君主專制政體之下，一般人的忠君思想是如何牢不可破了。曾國藩又怎能冒天下之大不韙，而輕舉妄動呢？後來剿稔匪，辦教案二事，均爲盛名所累，不得國人諒解，一轉眼間，鐘銘世勳，聖相威嚴，却變爲謗譏紛紛，舉國欲殺，可見舊社會的潛勢力之大。如果他做些狐狸狐搨的勾當，難道就能成功嗎？事後論人，自己不免忘掉時代環境了！他們在

實際上確把滿清的政權轉移於漢人，無形中又增加了會黨的勢力，替民族革命隱隱做下驅除難的工作，就在這一點來講，也算功可補過吧！況且他們的眼光，已着重在全世界上，帝國主義者能方張之勢，壓迫欺陵我們，漢滿的畛域，究竟是可有可無的，爲整個中華民族謀出路，計劃出一種復興的方案，守舊維新，安內攘外，雖然沒有達到救國救世的目的，畢竟是個不世出的哲人，值得我們稱贊啊！

梁任公以史學家的眼光，批評曾國藩說：「曾文正公，近日排滿家所最唾罵者也。而吾則愈更事而愈崇拜其人。吾以爲使曾文正生今日而猶壯年，則中國必由其手而獲救矣。彼惟以天性之極純厚也、故雖行破壞焉可也；惟以修行之極謹嚴也，故雖用權變焉可也。彼其事業之成，有所以自養者在也，彼其能率厲羣賢，以共同事業之成，有所以字於人且善導人者在也。吾黨不欲澄清天下則已，苟有此志，則吾謂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復也」（見飲冰室文集論私德）。又說：「曾文正者，豈惟近代，蓋有史以來不一二觀之大人也已；豈惟中國，抑全世界不一二觀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羣軼論之天下，在並時

諸賢傑中，最稱鈍拙，其所遭值事會，亦終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並不朽，所成就震古鑠今而莫與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歷百千艱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銖積寸累，受之以虛，將之以勤，植之以剛，貞之以恆，帥之以誠，勇猛精進，卓絕堅苦，如斯而已」（曾文正公嘉言鈔序）。這把曾國藩「立德立功立言三並不朽」，而爲「全世界不一二觀之大人」的由來說得很明白，見解非常平允，可謂曾文正公一個知己。但梁先生還不曉得曾文正公之所以偉大，因爲他是中國文化的產物。曾公同時之新學家容閔，及今人郭斌蘇氏對於此點頗有所見，容氏說：

曾文正公爲中國歷史上最著名人物，同輩莫不奉爲泰山北斗。其才大而謙，氣宏而凝，可謂完全之真君子，而爲清代第一流人物，亦舊教育中之特產人物」（見西學東漸記）。郭氏說：「我國過去教育目的，不在養成狹隘之專門人才，而在養成有高尙品格多方發展之完人。求之西方，以英國牛津劍橋兩大學之教育理想，與此爲最近似。曾文正公即我國舊有教育理想與制度下所產生最良之果之一。故能才德俱備，文武兼資。有宗教家之信仰，

而無其迷妄；有道德家之篤實，而無其迂腐；有藝術家之文采，而無其浮華；有哲學家之深思，而無其鑿空；有科學家之條理，而無其支離；有政治家之手腕，而無其權詐；有軍事家之韜略，而無其殘忍。西洋歷史上之人物中，造詣偏至者固甚多，然求一平均發展，道德文章事功三者之成就與文正相比者，實不數數觀。而文正之在中國，則雖極偉大，要不過爲中國正統人物中之一人。嗚呼！斯真中國教育之特色，中國文化之特色也」（見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七日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曾文正公與中國文化一文）。容郭二氏均以曾國藩的「道德文章事功三者之成就」爲我國教育文化之特色，較之梁先生的評論深刻多了。然而他們仍未能說明我國之教育理想，就是一「內聖外王」一「明體達用」的經世之學，曾國藩所謂「經世之禮」也。不錯，禮學是孔子的教人之道，也是中國文化的正統，但如曾國藩其人者，在中國歷史上，依然「不數數觀」，非僅其中之一人而已。爲什麼呢？因孔子沒後，二千年來，「春秋經世」之義，甚少解人，有成就的更不用說了。考據詞章義理三種學問的發展，致陷人於「狹隘之專門人才」一途，如荀子所譏爲俗儒陋儒者。故曾

國藩對他們均有所菲薄，而欲以深與博之功力，兼綜三者之長，以恢復固有文化的特色。其成就之恢宏，遠非一般號稱「正統人物」者所能相比。倘不了解這種境界，則曾國藩豈不變成一個萬能的天神了嗎？

「恩怨盡時方論定，封疆危日見才難」。昔人之所以詠張江陵者，亦可以此詩來論定曾國藩了。當時他的朋僚歌功誦德的話，我們不需一一徵引，只看一個朋友而兼「政敵」的左宗棠，對他如何論定吧！宗棠寄其子孝威書云：「念曾侯之喪，吾甚悲之，不但時局可慮，且交遊情誼，亦難愜然也。輓聯云：『知人之明，謀國之忠，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蓋亦道實語。見何小宋（璟）代懇恩卹一疏，於侯心事，頗道得着，闡發不遺餘力，知劄剛亦能言父實際，可謂無恭矣。君臣友朋之間，居心宜直，用情宜厚，後前彼此爭論，每拜疏後，即錄稿咨送，可謂鉏去陵谷，絕無城府。至茲感傷不暇之時，乃復負氣耶。『知人之明，謀國之忠』兩語亦久見章奏，非始毀今譽。兒當知吾心也。吾與侯有爭者國事兵略，非爭權競勢比。同時纖儒，妄生揣疑之詞，何直

一晒耶」。曾國藩對左宗棠始終有揚揄，無貶詞，甚至說：「橫寬七十二州，更無才出其右者」。宗棠之進用，亦由國藩所薦，乃二人性情不同，「有爭者國事兵略」，不是私人的權利之爭，故皆能持大體。以「撰語自誇，務壓二公」（指曾胡）的左宗棠，早有「曾侯觥觥，當世所宗，公與上下，如雲如龍」（祭胡文忠公文）之言，又不僅俟蓋棺以後始云：「自愧不如元輔」了。即此可知曾國藩為一代冠冕，絕不偶然的。

曾國藩的事業之成就，完全由學問而來，無關乎命運，今昔人的議論都是一致的。就是撰湘軍志的王闓運，對曾公時露不滿之意，也說：「湘軍兵威之盛，豈天數耶？一二人謀力之所致也」。國藩自己也說過：「山陔寒儒守一經，出山姓氏各芳馨。要令天下銷兵氣，爭說湘中聚德星。舊雨三年精化碧，孤燈五夜眼常青。書生自有平成量，地脈何曾獨效靈？」（次韻何廉昉太守感懷述事詩）。這是老實話，至於他在金陵軍營官軍昭忠祠記裏說：「時未可為，雖聖哲亦終無成；時可為，則事半而功倍也；皆天也」。所謂「天」
「時」是指太平軍初起「代興迭盛，橫行一時」的朝氣；或指將衰「權分勢散，廣封駭豎」

的暮氣。其家書亦嘗歸功於天，乃謙讓不矜之意，萬不可體會有失。最有趣味的是他告訴門人俞樾的話說：「李少荃（鴻臚）拚命做官，俞蔭甫（樾）拚命著書，吾皆不爲也」（見春在堂隨筆）。究竟他拚命幹些什麼事呢？豈僅「上相南征策衆材，軍容十萬轉風雷」嗎？也不是的。假如讀者要知道這位「壽生自有平反量」的「聖相」是如何造成，請讓我把他的生平一一仔細道來！

第一章 家庭環境

湖南湘鄉有一個小村莊名叫白楊坪，村內一家院子的後邊，生長了很大的藤蘿，盤繞枯樹，枝葉蒼翠，甚是茂盛，好像表現這人家雖是歷代耕種的農夫，似乎有一種不平凡的氣水。這家主人曾玉屏每天起得很早，自己帶着傭工，肩着鋤頭，開田種菜，非常勤苦；家裏還餵着一羣豬，塘裏又養了好多魚，自給自足，頗覺快活。玉屏生三個兒子，只長成兩個：長名麟書，季名驥雲。他家五六百年來都以農爲業，從沒有讀書求科名的。他在少年時代不務正業，常跑進城裏面，和一些浮薄子弟往來，被年長的父老譏笑，這纔發憤力田，自以失學爲恥，叫他的大兒子麟書去努力讀書。他好接近文士，對老成人極其尊重，盡力作些慈善公益的事業，漸漸得到鄉里族衆的信任，遇事排難解紛，爲人威重剛直，後來就成爲地方上的紳士了。大兒子苦苦用功，常提着考籃到縣城去應試，可是始終不得意，總是快快的下第而回。有一天玉屏的年近七十歲的老父親，忽得一夢。夢見一個大蟒，自

空中蜿蜒而下，昂首蹲踞，鱗甲燦爛，就把這老人驚醒了。正在這個時候，家人報說他老人家添了曾孫，原是麟書的夫人江氏所生。老人家甚是歡喜，覺得這孩子或者有些來歷，要光大曾家的門楣哩。這雖是一段神話，但孩子長到三十五歲以後，終身患着癩疾，每天兩隻手抓搔，必脫下一把皮屑，他的像貌，端莊注視，張爪刮鬚，有人說他像一條癩龍。王闓運也說過：「吾嘗怪其相法當刑死，而竟侯相，亦以此心耿耿，可對君父也」（湘綺樓日記戊寅二月二十七日）。可見他的貌相很怪，大約後人從這些觀點來附會的。你道這初出世的小孩是那一個？他就是中國近代第一流的名人曾國藩。

曾國藩生於前清嘉慶十六年十月十一日，距今已一百三十二年，正當清朝由盛轉衰的時候。他生下來以後，一直長到三四歲，戶庭罕聞啼泣之聲。他母親性情倔強，操作很忙，不甚照顧他，他總依在祖母的紡車旁邊，鳥語花開，注目流眄，像是一個有堅忍性而極不平凡的孩子。六歲入塾讀書，取名子城，曾祖父就去世了。八歲他父親因屢考不中，開館授徒，叫他跟在塾中讀五經。作父作師的麟書先生，晨夕講解，指畫耳提，督責甚嚴，常

常在枕邊叫醒他來背誦詩書，不到兩年光景，居然把五經讀完了。於是學習八股文，準備看應考。十四歲就隨同父親到長沙省城去應童子試，成績甚好。他仍從父親念周禮儀禮及史記文選。道光十年他長到二十歲，麟書先生覺得不如兒子的資質聰明，自己所知者盡都教完了，應該讓他往外縣去求名師。在衡陽從汪覺菴先生學習一年多，又回本縣漣濱書院來肄業。他原字伯涵，這時取滌其舊染之污，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的意思，改號滌生。山長劉象履看見他的天才恢廓，以爲大器。他父親一共應試十七次。到了四十三歲（道光十二年），纔補入縣學（秀才），但他只遲一年就考取了。這年十二月國藩結了婚，夫人是衡陽廩生歐陽凝祉（滄溟）的女兒，九年前因愛國藩之才而許字的。夫婦的感情很好。入學的第二年，國藩在長沙嶽麓書院讀書，有一位同學性情褊躁，因國藩的書桌放在窗前，那人就說：「我讀書的光線都是從窗中射來的，不是讓你遮着了嗎？趕快的挪開！」國藩說：「你叫我放在什麼地方呢？」那人說：「放在床邊好了！」國藩果然照他的話移置了。國藩晚上用功讀書，那人又說：「平常不念書，夜深還要聒噪人嗎？」國藩只好低聲默

誦。但不久國藩中式舉人，傳報到時，那人更大怒說：「這屋子的風水本來是我的，反叫你奪去了！」在旁的同學聽着不服氣，就問他：「書案的位置，不是你叫人家安放的嗎？」

怎麼能怪曾某呢？」那人說：「正因如此，纔奪了我的風水」。同學們都覺得那人無理取

鬧，替國藩抱不平，但國藩毫不在意，可見他氣度的一斑了。這時他僅二十四歲。照例要

在次年入京會試，在京一年多沒能考取，出作江南之遊，借錢買二十三史帶回家。麟書先

生頗爲歡喜，告訴他道：「只要你能用心讀完這些書，我替你還債是可以的！」因此他在

家裏讀了一年的史書，學問有很大的進步。道光十八年，他又到北京會試，臨行因家中寒

苦，向戚族借貸二十二串錢，一路雖省吃儉用，到京也只賸下三串。幸而這一次得中三甲

第四十二名進士，朝考一等，改爲翰林院庶吉士，從此置身詞林，抱有澄清天下之志，因

改名國藩。年底新翰林榮耀還鄉，親友都來道賀，煞是熱鬧。這時國藩的祖父玉屏先生

已六十五歲，多年辛勞的願望，雖是兒子沒有成就，究竟在長孫身上實現了，自覺歡喜。

常，就告訴麟書說：「我們是務農的人家，即令富貴也不要忘本呵！大孫子當了翰林，讓

他女心去做他的事業吧！家中的食用，千萬不要累贅他！」所以國藩從此進京做官，家下還靠着耕種過活。有時寄些俸銀回來，大都贍濟戚族。道光十九年十一月二日，國藩的長子紀澤生，就是那一天他啓程北上。第二年他父親送歐陽夫人入都，過幾個月就回來了。祖父玉屏，支持家計，一直到七十三歲（道光二十六年），患了痿痺病，臥床不起，滿堂兒孫，侍候得十分周到。尤其長子麟書先意承歡，夜不解帶，如是又過了三年，老人家方纔長逝，這時國藩已經作到禮部侍郎了。國藩的性情，多半是受他祖父的遺傳。玉屏先生白手理家，鑿石決壤，家道纔得小康。他的威儀言論，雄偉非常，氣象尊嚴，凜然難犯。對自己的兒子和不肖的鄉人，往往在稠人廣坐之中，壯聲訶斥，一點都不寬假，麟書總是一起孝起敬，屏氣負牆，跼蹐徐進，愉色如初。所以國藩內剛外柔，纔能成就他一生偉大的事業。

國藩兄弟五人：他年最長，次名國潢，字澄侯，比他小九歲，讀書鄉里，無大成就，僅以監生候選縣丞，是國藩替他捐的。在國藩治軍平亂的時候，他居鄉辦團，常常借勢殺

人，縣官無可奈何。國藩回家知其事，以錐刺其股，國潢呼痛。國藩說：「你殺人就不痛嗎？」國潢的天資平平，一生只照管家務。三名國華，字溫甫，比他小十一歲，出嗣叔父驥雲。國藩也替他「納貢入監」，鄉試未中，在家讀書。咸豐五年，國藩被困於江西，他纔間關走武昌求援，率五千人往救，後從李續賓征皖北，軍敗，與李同殉難於三河，死事最烈。國藩的哀詞說：

鱣鱣我祖，山立絕倫，有蓄不施，篤生哲人。我君既長，魯國一儒，仲父早世，有季不孤。恭惟先德，稼穡詩書，小子無狀，席此慶餘。粲粲諸弟，雁行以隨，吾詩有云，午君最奇。挾藝千人，百不一售，彼羸穢者，乃居吾右，抑寒不伸，發狂大叫，雜以嘲談，萬花奇笑。世不吾與，吾不世許，自謂吾虎，世棄如鼠，相舛相背，逝將去汝！一朝奮發，仗劍東行，提師五千，往從阿兄，何堅不破，何勁不摧，躍入章門，無害無災，燿篋鼓角，號令風雷。昊天不弔，鮮民銜哀，見星西奔，三子歸來。弟後季父，降服以禮，匝歲告闋，靡念苞杞。出陪戎幄，匪辛伊李，既克潯陽，雄師

北邁，剗潛剗相，羣舒是嘅，豈謂一蹶，震驚兩戒！李旣山頽，弟乃梁壞，覆我淮人，君子六千，命耶數耶？何辜於天！我奉簡書，馳驅嶺嶠，江北江南，夢魂環繞，卯痛抵昏，酉悲達曉。莽莽舒廬，羣凶所窟，積骸成岳，孰辨弟骨，骨不可收，魂不可招，崢嶸廢壘，雪漬風飄，生也何雄？死也何苦？我嘗負弟，茹恨終古。

這首哀詞好像是國華的小傳，他雖不得志於科名，而仗劍從軍，生平頗爲奇特。國藩對於諸弟的性情才幹和將來成就，早就有一種批評，他說：

辰君平正午君奇，屈指老沅真白眉。

辰君指國潢，生庚辰歲（嘉慶二十五年），午君卽國華，生壬午歲（道光二年），後果如其言，而老沅就是他的四弟國荃了，字沅甫，生於道光四年，比他小十三歲。當國藩爲翰林時，入京從之受業，年僅十六歲，十八歲回湘，國藩送之蘆溝橋，卽以「白眉」推之，可見國荃的志氣非凡，與國藩爲難兄難弟了。國荃本麟書第四子，在家庭中兄弟姊妹排行第九，所以國藩稱他爲九弟，以後帶湘軍出征，軍中呼爲「九帥」。我們看曾國藩的酬九弟

詩云：

遠離予季今三載，辛苦學詩絕可憐！王粲辭家遘多患，陸雲入洛正華年。輪轅塵裏鬢毛改，鼙鼓聲中筋骨堅。門內生涯何足道，須要嘗膽報堯天！

漢家八葉耀威弧，冬幹春膠造作殊，豈謂戈鋌照京口，翻然玉帛答倭奴！故山豈識風塵事？舊德惟傳嫁娶圖。長是太平依日月，杖藜零涕說康衢。

杜韓不作蘇黃逝，今我說詩將附誰？手似五丁開石壁，心如六合一游絲。神斤事業無凡賞，春草池塘有夢思，何日聯牀對燈火，爲君爛醉舞僊僂？

辰君平正午君奇，屈指老沅眞白眉！入世巾袍各骯髒，閉門諧謔即支離。中年例有妻孥役，識字由來教養衰，家食等閒不經意，如今飄泊在天涯！

這正是道光二十二年鴉片戰爭南京訂約的時候，國藩對於時事的關懷，和兄弟間的互相期許，在詩中都可以看出來。「翻然玉帛答倭奴」，「須要嘗膽報堯天」，痛心和議，勵志報國，誰知詩意？屈指白眉！春草池塘之夢，五丁神斤之業，在少年時代的曾國藩，業已

頭角嶄嶄，爲乃兄所賞識，所殷望，後來兄弟同出治軍，共建大業，真是十幾年前早就安排定了。國藩歲暮雜感，特別憶念沅甫說：

阿弟光明者，愛兄心尙孩，良時無汝共，雅抱向誰開？
難就陸雲業，多慚計武才。皇都寧不美，捨去竟何哉？

可見國藩不願國荃離開他，而「兄弟怡怡」，感情都非常融洽。我們再看他的憶弟詩：

無端繞室思茫茫，明月當天萬瓦霜，可恨良宵空兀坐，遙憐諸弟在何方？紛紛書帙誰能展？黯黯燈花有底忙？出戶獨吟聊妄想，孤雲斷處是家鄉。

就可以知道國藩友于情篤，至性過人了。但國藩對於他的弟弟們不僅是感情上的維繫，而尤在德業方面的督責，我們看他的家書，大半是「致諸弟」的，爲學治事，處世接物，無一不悉心教導，特別注重孝友耕讀，綿延世澤。如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六日的信裏說：

今人都將學字看錯了，若細讀賢賢易色一章，則絕大學問，卽在家庭日用之間，
於孝弟二字上，盡一分便是一分學，盡十分便是十分學。今人讀書，皆爲科名起見，

於孝弟倫紀之大，反似與書不相關，殊不知書上所載的，作文時所代聖賢說的，並非要明白這個道理。若果事事做得，即筆上說不出何妨？若事事不能做，並有虧於倫紀之大，即文章說得好，亦祇算個名教中之罪人。賢弟性情真摯，而短於詩文，何不日在孝弟兩字上用功，曲禮內則所說的，句句依他做去，務使祖父母父母叔父母無一時不安樂，無一時不順適，下而兄弟妻子，皆藹然有恩，秩然有序，此真大學問也。若詩文不好，此小事不足計，而好亦不值一錢，不知賢弟肯聽此語否？

又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的信裏說：

吾細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盡，其子孫始而驕佚，繼而流蕩，終而溝壑，能慶延一二代者鮮矣。商賈之家，勤儉者能延三四代，耕讀之家，謹樸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則可以綿延十代八代。我今賴祖宗之積累，少年早達，深恐其一身享用殆盡，故教諸弟及兒輩但願其爲耕讀孝友之家，不願其爲仕宦之家。

曾國藩可謂盡其心力以教導諸弟了，然而他仍說：「余生平於倫常中，惟兄弟一倫，抱愧

尤深，蓋父親以其所知者盡以教我，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盡教諸弟，是不孝之大者也」。又告訴陳源竟說：「余欲盡孝道，更無他事，能教諸弟進德業一分，則余之孝有一分，能教諸弟盡十分，則我之孝有十分，若全不能教弟成名，則我大不孝矣」。他這樣重視諸弟的教育，可惜他們的學問都無所成就，國潢「中等之資」不用說了，國華國荃都是「上等之資」，何以也如此呢？大約有兩種原因：一是他們的家庭，畢竟因為國藩做官而闊綽多了，小兄弟已不知稼穡之艱難，自不能「積苦力學」。二是天資高而無恆，如國華國荃在長沙嶽麓書院肄業二年，並從羅澤雨改文，可是「看書不甚多，絕無長進」，故國藩時以有恆告誡。這些小兄弟們頗有點「恃才傲物」，很難對付，以國藩友愛之深，還不免有時鬧皮氣，惹嫌言。另外還因為婦女識見短淺，妯娌叔嫂之間，是不易相處的。但國荃却是一個非常的人物，他在科舉上不甚得意，二十四歲入縣學，二十五歲補廩，二十九歲纔選為優貢（咸豐二年），所以國藩壽沅甫弟四十一初度詩說：

陸雲入洛正華年，訪道尋師志頗堅，慚愧庭階春意薄，無風吹汝上青天。

幾年橐筆逐辛酸，科第尼人寸寸難，一劍須臾龍變化，誰能終古老泥蟠。

這兩首詩指出國荃以後魚龍變化，建功立業，並非由於科第，可見人才是不能拘守一格的。國藩的五弟名國葆，字季洪，後改名貞幹，字事恆，比國藩小十七歲，也是一個了不起的人。他幼年「落落自將，脫去畦町」，有些超人的見解。二十三歲入縣學後，即不肯做舉子業。最初隨國藩練湘軍，識僚佐楊載福、彭玉麟，以為非常器，已願下之，後楊彭果成名將。他避居紫田山，謝絕人事。及國華戰敗，纔誓出殺賊。投效胡林翼，與國荃會師安慶南京，以功晉知府。可惜為疫癘所染，病死於軍中。國藩說他：「智足以定危亂，而名譽不並於時賢；忠足以結主知，而褒寵不逮於生前；仁足以用部曲，而妻孥不獲食其德；識足以祛羣疑，而文采不能伸其說」，「所謂命焉者非耶？」這一羣如龍如虎的昆仲，際會風雲，名滿天下，不特改換了曾家幾百年的門楣，而且左右中國的大局，為近代傑出的人才。麟書先生在晚年命國藩書一聯懸之廳事，說道：

有詩書，有田園，家風半讀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澤；

無官守 無言責，時事不聞不問，只將艱鉅付兒曹。

相傳林文忠公（則徐）的父親也會寫一聯說：「粗衣淡飯好些茶，這箇福，老夫享了；齊家治國平天下，此等事，兒曹任之！」這和「積苦力學」的老秀才麟書先生是一樣的意思。「知子莫若父」，文忠文正遂同為中國近代史上的有數人物，而國藩的成就，較之林則徐尤為大。一門忠徽，更非則徐所及，故國藩亦以「粲粲諸弟，雁行以隨」自豪。這都是他們的先德慶餘，多半由乃祖玉屏先生的「有蓄不施」而來的。國藩治家，標其祖德，歸納為八個字：「書，蔬，魚，豬，早，掃，考，寶」。讀書，種蔬，養魚，養豬，謂可以「覘人家興衰氣象」；早起，掃屋，祭祀祖先，親睦鄉里，因他祖父嘗說：「人待人無價之寶也」；這完全可以看出他們的家風了。國藩乙未歲暮雜感詩道：

高嶺山下是儂家，歲歲年年鬥物華，老柏有情還憶我，天桃無語自開花。幾回南國思紅豆，曾記西風浣碧紗。最是故園難忘處，伴鶯亭畔路三叉。

高嶺山伴鶯亭就是「篤生活人」的勝地，多麼令人幽幽嚮往呵！

會國藩

二四

第二章 經世之禮學

國藩的稟性是由於家庭環境養成的，可是他的學問成就，却得力於北京做官的時代。他在翰林院一共九年，自庶吉士升到侍講學士，都是一種清要的職務。翰林院好像現在的中央研究院，不過研究院只作純粹的學術研究，而翰林院則是儲備人才的總機關，平素爲皇帝皇子講書，可充經筵講官，春坊庶子；放考差，可充鄉會試主考總裁，同考官及各省學政。或纂校殿閣祕書，總不外乎文墨之事，所以很有研究的工夫。國藩前幾年多看些歷史書，兼及詞章，注重經世之學，頗有心得。及善化人唐鑑到京師做太常寺卿，這位老先生是當時有名的理學家，和大學士倭仁同以理學相號召，國藩以前輩之禮事之，常常請教他們。唐鑑告訴他說：

束檢身心，讀書明理，當以朱子全書爲宗。……最是靜字功夫要緊。大程夫子是後代聖人，也是靜字功夫足。王文成亦是靜字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動心。若不靜，省

身也不密，見理也不明，都是浮的，總是要辯。

倭仁用功最篤實，每天言動，皆有劄記，見過自訟，一點都不虛妄。國藩受了他們的影響，因以朱子爲日課，而致力於宋學。我們看他壬寅（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八日記云：

何丹谿來久談，語多不誠。午正會客一次，語失之佞。酉正客散，是日與家人辦公送禮，俗冗瑣雜可厭，心亦隨之紛亂，尤可恥也！鐘後何子貞來，急欲談詩。聞譽心忡忡幾不自持，何可鄙一至於此！此豈復得爲載道之器乎？凡喜譽惡毀之心，卽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於此關打不破，則一切學問才智，適足以欺世盜名已矣。謹記於此，使良友均知吾病根所在。與子貞久談，躬不自一而言之不作，又議人短，頃刻之間，過惡叢生，皆自好譽之念發出。

初十日記云：

至海秋家赴飲，渠女子是日納采，座間聞人得別敬，心爲之動。昨夜夢人得利，

甚覺豔羨，醒後痛自懲責，謂好利之心，至形諸夢寐，何以卑鄙若此！方欲痛自瀟洗，而本日聞言，尙怦然欲動，真可謂下流矣！與人言語不由中，講到學問，總有自文淺陋之意。席散後，閒談皆游言，見人圍棋，躍躍欲試，不僅如見獵之喜。口說自新，心中實全不真切。歸查數，久不寫帳，遂茫茫然不清晰，每查一次，勞神曠功，凡事之須逐日檢點者，一日姑待，後來補救則難矣；況進德修業之事乎？是席間海秋言：「人處得我者不足觀心術，處相怨者而能平情，必君子也」。此余所不能也。

十四日記云：

起晏，心浮不能讀書，翻陳臥子年譜，涉獵悠忽。飯後讀易蹇卦，因心浮故靜坐而已昏睡，何不自振刷也！未初客來試以時藝，讚歎語不由中，予此病甚深。孔子之所謂巧令，孟子之所謂餽，其我之謂乎？以爲人情好譽，非是不足以悅其心，試思此求悅於人之念，君子乎？小人乎？且我誠能言必忠信，不欺人，不誑語，積久人自知之，不讚人亦不怪。苟有試而譽人，人且引以爲重，若日日譽人，人必不重我言矣。

給人自欺，滅忠信，喪廉恥，皆在於此，切戒切戒！

十一月初八日記云：

醒早沾戀，明知大惡而姑蹈之，平旦之氣安在，真禽獸矣！要此日課冊何用？無日課豈能墮壞更甚乎？尙觀顏與正人君子講學，非拚著而何？辰正讀旅卦，飯後讀巽卦，一無所得，白文都不能背誦，不知心忙甚麼？丹黃幾十葉書，如勉強當差相似，是何爲者？平生只爲不靜，斷送了幾十年光陰，立志自新以來，又已月餘，尙浮躁如此耶？

日記中痛自劾責之言甚多，可以看出他的理學慎獨功夫是如何了。不久，他更訂立一個課程表：

不聖則狂，不上達則下達，殆矣哉！自十月朔立志自新以來，兩月餘漸漸疏散，不嚴肅，不謹言，不改過，仍故我矣。樹堂於昨初一重立功課，新換一個人，何我遂甘墮落耶？從此立課程，新換爲人，毋爲禽獸。

課程

敬（整齊嚴肅，無時不懼，無事時心在腔子裏，應事時專一不雜，如日之升。）

靜坐（每日不拘何時，靜坐半時，體念來復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鎮。）

早起（黎明即起，醒後勿沾戀！）

讀書不二（一書未點完，斷不看他書，東繙西閱，徒徇外爲人，每日以十葉爲率。）

讀史（丙申購二十三史，大人曰：「爾借錢買書，吾不憚極力爲爾彌縫，爾能圈

點一編，則不負我矣！」嗣後每日點十葉，間斷不孝。）

謹言（刻刻留心，是工夫第一。）

養氣（氣藏丹心，無不可對人言之事。）

保身（十月十二奉大人手諭曰：「節勞節慾節飲食，時時當作養病」。）

日知所亡（每日記茶餘偶譚二則，有深意是徇人。）

月無忘所施（每月作詩文數首，以驗積理之多寡，養氣之盛否，不可一味耽著，最

易溺心喪志。）

作字（早飯後作字半時，凡筆墨應酬，當作自己課程，凡事不爲待明日，愈積愈難

清。）

夜不出門（曠功疲神，切戒切戒！）

在課程表訂立以後，他的學術見解，道德修養，都有很大的效益。後來劉長佑督直，對捻匪主張合勦，與國藩主張分堵的意見不合，而國藩極稱之。長佑對人說：「滌翁於此乃毫無芥蒂，良由做過聖賢工夫來也！」所謂聖賢功夫，就是他一生嚴以劾己，寬以容衆的精神，的確在這時植立了很好的根基。但他並不是一個純粹的理學家，理學只是他整個學問的一方面而已。他在復夏穀甫的信裏說：

乾嘉以來，士大夫爲訓詁之學者，薄宋儒爲空疏；爲性理之學者，又薄漢儒爲支離。鄙意由博乃能返約，格物乃能正心，必從事於禮經，考覈於三千三百之詳，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細，然後本末兼賅，源流畢貫，豈極軍旅戰爭食貨磅雜，皆禮家所應討

論之事。故嘗謂江氏禮齋綱目，秦氏五禮通考，可以通漢宋二家之結，而息頓漸諸說之爭。

他的治學方法是由博返約，格物正心，所以他不盡以理學爲詔事，同時也博覽六書，及乾嘉訓詁諸書，而且不以宋人註經爲然。他的歸宿是「禮學」，以爲禮學可以「通漢宋二家之結，而息頓漸諸說之爭」。禮學是什麼呢？就是經世學。有一天唐鑑告訴他說：

爲學只有三門：曰義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學，多求粗而遺精，管窺而蠶測；文章之事，非精於義理者不能。至經濟之學，即在義理內。

國藩就問道：「經濟宜如何審端致力？」鑑答：「經濟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歷代典章，不外乎此」。這可見國藩特別注意經濟學了！但國藩贊成唐鑑的「經濟不外看史」之說，不贊成他把經濟放在義理內，我們看國藩在聖哲畫像記裏說：

姚姬傳氏言學問之途有三：曰義理，曰詞章，曰考據。戴東原氏亦以爲言。如文周孔孟之聖，左莊馬班之才，誠不可以一方體論矣。

從前的理學家（唐）文學家（姚）經學家（戴）都只承認學問有三種，而國藩獨提出「文周孔孟之聖，左莊馬班之才」，是「不可以一方體論」的，因此他說：「先王之道所謂修己治人經緯萬彙者何歸乎？亦曰禮而已矣。杜君卿通典言禮者十居其六，其識已超越八代矣」。他要打破三種學問說的藩籬，而以「修己治人經緯萬彙者」爲禮學，纔算是「先王之道」。所以他說杜君卿的通典言禮者多，其識已超越八代，直可追蹤秦漢，「欲周覽經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通典是各種制度的沿革史，爲什麼會國藩這樣的尊重它呢？因爲它可以上接馬班「經世之典」。接着他又說：

有宋朱子張子之所討論，馬貴與王伯厚之所纂輯，莫不以禮爲兢兢。我朝學者，以顧亭林爲宗，國史儒林傳褒然冠首，吾讀其書，言及禮樂教化，則毅然有守先待後，舍我其誰之志，何其壯也！厥後張高菴作中庸論，及江慎修戴東原輩，尤以禮爲先務，而秦尙書蕙田，遂纂五禮通考，舉天下古今幽明萬事，而一經之以禮，可謂體大思精矣。吾圖畫國朝先正遺像，首顧先生，次秦文恭公，亦豈無微旨哉？

這很明顯的可以看出他的「微旨」是以禮學爲中國學術的正宗，漢學家「擅有宋五子之術」，宋學家「以漢學破碎害道」，斷斷未已，都爲國藩所譏議。他說：「屏棄羣言以自隘」，「爭得失於一先生之前」，是「姝姝自悅」的「斗筭者」（以上引文均見畫像記）。又說：「近世所學者，不以身心切近爲務，恆視一世之風尚以爲程而趨之，不數年風尚稍變，又乘其業以趨於新。如漢學、宋學、詞章、經濟以及一技一藝之流，皆各有門戶，更迭爲盛衰，論其源皆聖道所存，苟一念希天下之譽，校沒世之名，則適以自喪其守，而爲害於萬世」（見年譜）。他反對漢宋學各有門戶，痛惡趨新執一的投機分子，尤以沽名邀譽爲喪守害世，他要爲務本之學，只有禮學體大思精，可以通漢宋二家之結，因爲它是經緯萬彙的綜合學問，乃經世之大法。所以國藩在辛亥七月的日記裏，就把經世學很顯然的標示出來了。

有義理之學，有詞章之學，有經濟之學，有考據之學。義理之學卽宋史所謂道學也，在孔門爲德行之科；詞章之學，在孔門爲言語之科；經濟之學，在孔門爲政事之科；考據之學，卽今世所謂漢學也，在孔門爲文學之科；此四者缺一不可。予於四

者，略涉津涯，天質魯鈍，萬不能造其奧窔矣。惟取其尤要者，而日日從事，庶以漸磨之久，而漸有所開。義理之學，吾之從事者二書焉：曰四子書，曰近思錄。詞章之學，吾之從事者二書焉：曰曾氏讀古文鈔，與曾氏讀詩鈔，二書皆尙未纂集成帙，然胸中已有成竹矣。經濟之學，吾之從事者二書焉：曰會典，曰皇朝經世文編。考據之學，吾之從事者四書焉：曰易經，曰詩經，曰史記，曰漢書；此十種者，要須爛熟於心中，凡讀他書，皆附於此十書，如室有基而丹雘附之，如木有根而枝葉附之，如雞伏卵，不稍歇而使冷，如蟻成垤，不見異而思遷，其斯爲有本之學乎？

我們看國藩這一段話，就知道他對於一般學者分學問爲三途是不很贊成的，他要把經濟之學特別提出來列爲孔門的政事之科，真可以發孔學之蘊蘊了。至於禮學好像是四種學問的綜合體，故云「缺一不可」；其實禮學就是古代的經世學，也就是歷史學，它是包括義理詞章考據，「不可以一方體論」的。我們再看國藩的孫侍講芻論序說：

古之學者，無所謂經世之術也，學禮焉而已。周禮一經，自體國經野，以至酒漿

虞市巫卜繕彙天鳥蠶蟲，各有專官，察及纖悉。吾讀杜元凱春秋釋例，一歎邱明之發凡，仲尼之權衡萬變，大率秉周之舊典，故曰周禮盡在魯矣。自司馬氏作史，猥以禮書與封禪平準並列，班范而下，相沿不察。唐杜佑纂通典，言禮者居其泰安，始得先王經世之遺意。有宋張子朱子益崇闡之。聖清膺命，巨儒輩出，顧亭林氏著書，以扶植禮教爲己仕，江慎修氏纂禮書綱目，洪纖畢舉，而秦樹灃氏遂修五禮通考，自天文地理軍政官制，都萃其中，旁綜九流，細破無內。國藩私獨宗之，惜其食貨稍缺，嘗欲集鹽漕賦稅國用之經，別爲一編，傳於秦書之次，非徒廣己於不可畔岸之域，先聖制禮之無所不賅，固如是也。

在他的雜著筆記中論禮又說：

古之君子之所以盡其心養其性者，不可得而見，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則一秉於禮。自內焉者言之，舍禮無所謂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禮無所謂政事。故六官經制大備，而以周禮名書。春秋之世，士大夫知禮，善說解者常足以服人而強國。戰國

以後，以儀文之瑣爲禮，是女叔齊之所譏也。荀卿張載，兢兢以禮爲務，可謂知本好古，不逐乎流俗。近世張爾岐氏作中庸論，凌廷堪氏作復禮論，亦有以窺見先王之大本。秦蕙田氏輯五禮通考，以天文算學錄入爲觀象授時門，以地理州郡錄入爲體國經野門，於著書之義例，則或駁而不精。其於經世之禮之無所不賅，則未爲失也。

這兩段話對於禮學就是古代經世的源流、功用和範圍都說得很詳細。後來李鴻章撰曾文正公神道碑，根據此點，纔把他老師——曾國藩的學問，更作具體的說明：

公爲學研究義理，精通訓詁，爲文效法韓歐，輔益之以漢賦之氣體，其學問宗旨，以禮爲歸。嘗曰：「古無所謂經世之學也，學禮而已」。古今聖哲自文周孔孟，下逮國朝顧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孫諸儒，取三十有二人，圖其像而師事之，自文章政事外，大抵皆禮家言，嘗謂「聖人者自大地萬物推極之至一室米鹽，無不條而理之」。

郭嵩燾撰曾文正公墓誌銘也說：「公始爲翰林，窮極程朱性道之蘊，博考名物，熟精與禮，以爲聖人經世宰物，網維萬世，事無他，禮而已矣」。可見「經世宰物」的禮學，

非從義理考據詞章入手而綜合一歸是不行的，這也就是歷史學的功用了。莊子說：「春秋經世，先王之志」。顧亭林說：「夫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謂之行事者，天下後世用以治人之書，將欲謂之空言而不可也」。莊顧均以春秋爲經世治人之書，猶之曾國藩以史漢通典爲經世之典。古代的著作極簡單，分科更不詳，經世是寄託在歷史學中的，所以孟子說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義是什麼？就是經世了。可見經世學和歷史學在古代是不可分的。

曾國藩既以禮學來代表經世學，也就是古人所說的「修己治人」，「內聖外王」，「有體有用」之學。因爲中國古代政教不分，官師合一，所以領袖必須兼備「聖」「王」雙層資格：有「聖」人「修己」之「體」，然後纔能爲「王」者「治人」之「用」。倘有修己之體，而不得爲治人之用，如孔子亦可稱爲「素王」。本於此種見解、所以纔有大學八目，中庸九經的政治哲學，曾國藩所謂：「自內焉者言之，舍禮無所謂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禮無所謂政事」，也是一樣的意思。秦漢以後，政教分離，精神領袖和事業領袖，

不必兼備於一身，注重精神者，往往忽略事業的具體條件，注重事業者，又往往忽略精神的基礎條件，難得兩種領袖同時合作，所以社會也就不能平均發展，常有畸重畸輕之弊了。譬如漢唐的事業很盛，而君主多有慚德，學術流於瑣碎，宋明的理學很盛，而國事日趨衰弱，德行流於空泛。中國文化的委靡不振，就由於「屏棄羣言以自隘」的「斗筲者」把學術途徑弄得太仄了。學術原有「博通」「專精」兩種，是相互爲用的，必先具博通之識，始能爲專精之用，所謂「由博返約」也；又必有專精之功，纔可成博通之才，所謂「由約返博」也，這是大成的人物。其次懷一藝之長，即可稱專門之業，這是小成的人物。自然在人事愈繁，分科愈細的時候，精力有限，小成的人物也就一天一天多起來了。然而通才卓識，盱衡天下，由聖而王，畢竟是不可少的。所以古人以「小學」「大學」來分途，以「小儒」「大儒」來分才，辛稼軒所謂：「大儒學禮小儒詩」，又謂「詩禮相傳大小儒」；就可以知大儒是經世的通才，而小儒是一藝的專家了。大儒之學是博通的，綜合的，以禮爲歸，曾國藩所謂：「歷溯前代之沿革本末，衷之以仁義，歸之以簡易，其苟且者，知將

來之必敵。其至當者，知將來之必因，所謂雖百世可知也」。這不就是歷史學嗎？所以魏禧說：「經世之務，莫備於史」。曾國藩在史書方面，不僅推崇杜佑的通典，而尤推崇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他說：

竊以爲先哲經世之書，莫善於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其論古皆折衷至當，開拓心胸，如因三家分晉而論名分，因曹魏移祚而論風俗，因蜀漢而論正閏，因樊英而論名實，皆能窮物之裡，執聖之權。又好敍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脈絡分明，又好詳名公巨卿所以興家敗家之故，使士大夫恍然知戒，實六經以外不刊之典也。

由此可以看出歷史雖爲「經世」之書，而通史和專史的領域不同，則其所含的哲學義蘊也不同。在大小範圍之中，都各有其「通」「專」，也互有其「體」「用」，是相對的，不可拘泥於一成之規，必須好學深思其義，纔可以明瞭此中道理。這種學說，用近代話來說，就是歷史的政治經濟學，以歷史爲基礎，而發爲政治經濟之用途，其純粹的歷史學，亦非現代的政治經濟學也。至於小儒之專業，不過供大儒之運用，而大儒之成就，又必賴小儒

之積累，所以經世學在從前是由義理詞章訓話而匯爲一歸的，在現在是合歷史政治哲學爲一途的。經世學的體是歷史和哲學，用是政治和經濟，目的是治國平天下，步驟是格致正誠修齊；道理是「執兩而用其中於民」，精神是「守先待後，捨我其誰？」以天下爲己任，而不屑爲「一身家之謀」；以「明道救世」爲功，而不願作無益之詩文。後人把它誤解爲「功利主義」，或純粹的政治經濟學，可以說完全是不對的。

曾國藩既能發先聖先王之義蘊，以經世之禮學爲依歸，他的人格修養道德學問自有特殊的造詣，絕不是一般漢學家理學家文學家所能比擬的。後來他以「汗馬勛名，問牛相業」，兼具聖王雙層的資格，造成精神事業的領袖，時人稱爲「聖相」，真可以當之而無愧。因此我們知道：事業由學問而來，千錘百鍊，是有相當把握的；事業由天才而來，一曝十寒，是不大靠得住的。古人說：「不學無術」，其中頗有很深的道理，故以霍光寇準之功業，仍不免見譏於史家。而曾國藩一生都從經世之禮學爲出發點，所以他的道德勳名絕不是偶然的。

第三章 學術背景

爲什麼曾國藩能有那種偉大的學術成就呢？我們必需從幾方面來探討，纔可以明瞭它的底蘊，這絕不是偶然的：

第一、從中國文化的源流看：中國文化導源於孔子，孔子繼承古代文化而彙其大成。他的道理是「中庸」，他的學術是「經世」。中庸之道，是和易經配合起來的，好像現時流行的相對論和辯證法；經世之學，是和中庸配合起來的，即如大學標幟的大綱領和八條目。中庸以「執兩用中」爲解，教人應知一體之兩面——端，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萬不可執一以害事，必須要因時而制宜。孔子以狂狷爲中行之起腳（說見顧憲成歐陽竟無），又惡紫之奪朱，大罵鄉愿是德賊，原說得明明白白。易經「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一陰一陽之謂道，往來不窮之謂通」，「日月生明，寒暑成歲，屈信相感而利生焉」。結論是：「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這不是現在人所謂辯證法的最基本之「對立一致律」

嗎？中庸就是反正之合，絕不是折中之半，所以孔子能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能創「周乎萬物」的中庸之道，能集老墨法三家之大成，而為中國文化的代表人物。他既然發現了世界事物發展的總規律——真理，不是為個人來自賞，乃欲「舉而措之天下之民」，使人人都能瞭解推行，「利用出入」。換言之，就是易繫詞所謂「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所以大學由明德而新民，以至止于至善，由格物而致知，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孔子祖述六經，而志在春秋，稱先王以為後世法，有託古改制之義。故莊子說：「春秋經世，先王之志」，雖以黃老家學的司馬遷也不能不贊春秋是明王之業了。公羊闡春秋之微言大義，以張三世通三統來說明政治演進的階段，和禮運大同小康是一樣的。儒家理想的世界，是使人人各得其所。但如何纔能達到大同的境界呢？就在乎為政者了解「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的道理，一步一步的推挽上去；一般人也應該體會這種道理，以循「天地之大德」，而「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假如一有誤解，一有牴觸，則其道不明，社會自然要委靡混亂。

了。人類智識之增長，原來是要參「天地人三道」而求其「通」，倘使人類的智識，不能和天地之道相配合而促其發展，則造物小兒可以捉弄世界，那還貴乎有聖人——先知先覺嗎？經世之學，以「明道救世」爲注解，以「守先待後」爲精神，以「修己治人」爲旨趣，所謂「內聖外王」「明體達用」，正是孔子學說的真諦。要「舉而措之天下之民」，也正是學術推進社會，使達到利用厚生的目的。顧亭林說：「孔子之刪述六經，乃伊尹太公救民於水火之心」，這完全是不錯的。孔子以中庸之道，懷救民之心，張三世之義，綜老法之術，執兩用中，乃造成大一統的中國文化。倘後王能本其法則，身體力行，則中國決非現在的中國，世界也決非現在的世界，可惜孔子未得用於當時，而七十子之徒，又人各異說，正如荀子所詈爲俗儒賤儒僞儒者。自此中庸之道，經世之學，遂湮沒而不彰了。

秦漢以後，因「抱殘守闕」之故，走進了訓詁考據之「小學」；唐宋以來，因佛老影響之故，又演出了靜虛無爲的「理學」。明清以八股取士，用利祿來誘惑學者，更有截搭

卜題的「帖括學」。二千年來置中庸經世之大學而不講，中國民族文化的衰落，社會的停滯腐化，皆由於此。明末遺民懷於亡國之慘痛，大都有返本求源經世治人的思想，顧黃王顏諸大儒不用說了，就是理學家如李二曲、孫夏峰、文學家如侯朝宗、魏叔子等，又何嘗不是如此呢？李二曲說：「吾儒之學，以經世爲宗，一變訓詁，再變詞藝，而儒名存實亡矣」。可見當時的學者對於中國文化都要重新估價，雖因清朝的種族偏見，受到很大的壓迫，不得不向「漢學」去發展，但吉光片羽，炳耀千秋，又何能泯汰呢？曾國藩在衡陽讀書的時候，必熟聞其鄉先賢王船山之說，後來爲船山序刻遺書，謂：「荒山敝榻，終歲孳孳，以求所謂育物之仁，經邦之禮。窮探極論，千變而不離其宗」。又推論說：「昔仲尼好語求仁，而雅言執禮，孟氏亦仁義並稱，蓋聖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爭，內之莫大於仁，外之莫急於禮。自孔孟在時，老莊已鄙棄禮教，楊墨之指不同，而同賊於仁，厥後衆流歧出，載籍焚燒，微言中絕，人紀紊焉。漢儒掇拾遺經，小戴氏乃作記，以存禮於什一，又千餘年宋儒遠承墜緒，橫渠張氏，乃作正蒙，以討論爲仁之方。船山先生注正

家數萬言，注禮記數十萬言，幽以元民物之同原，顯以綱維萬事，弭世亂於未形，其於古昔明體達用盈科後進之旨，往往近之」。國藩講學治軍，亦時以仁禮對舉，可見他受了王船山的影響。然而影響最大的還是顧亭林。因為國藩在道光二十六年住居京師報國寺，隔壁就是顧先生祠，我們假如說孔子是經世學的鼻祖，顧亭林就是經世學的大宗。爲什麼呢？理學家講經世學都不純粹，都不顯明，李二曲，王船山尙有此弊，因爲他們說理重於述事（船山又較二曲爲高，因爲他有讀通鑑論）。黃梨洲比較好得多，他從歷史下工夫，所著明夷待訪錄，亦精闢絕倫，可以稱得起經世學家，但他不如顧亭林從正面立論，把春秋經世的意義，說得那樣清楚，如：

君子之爲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

……某至五十以後，篤志經史；……別著日知錄，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濟斯世於治古之隆，而未敢與今人道也（亭林集與人書二十五）。

孔子之刪述六經，即伊尹太公救民於水火之心，故曰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夫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謂之行事者，天下後世用以治人之書，將欲謂之空言而不可也。愚不揣有見於此，故凡文之不關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爲。而既以明道救人，則於當今之所通患，而未嘗專指其人，亦遂不敢以避也（與人書二）。

亭林的學術，完全是「引古籌今，亦吾儒經世之用」（與人書八）。所以他不肯作應酬文字，就是他頂要好的朋友李二曲請爲其母作墓誌，他始終都未作。我們看曾國藩如何的稱贊他呢？

俗儒閣閣蛙亂鳴，亭林老子初金聲，昌平山水委灰燼，可憐孤臣淚縱橫！東西南北轍迹遍，斷柯缺斧終無成。獨有文書巨眼在，北斗麗天萬古明，音聲上溯三皇始，地志欲掩國子名。丈夫立言要須爾，擊甕拊缶烏足鳴？嗟余孱退昏庸百不力，付與四海劉傳瑩（丙午初冬寓居報國寺賦詩五首之四）。

顧亭林以明季遺民，矢志革命，在「斷柯缺斧」之後，振經世之絕學，有春秋撥亂反正

之意，故「北斗巨眼，萬古金聲」，國藩頓拜而頂禮焉，其影響可知了。聖宮畫像記說：

我朝學者，以顧亭林爲宗，國史儒林傳，褒然冠首，吾讀其書，言及禮樂教化，則毅然有守先待後，捨我其誰之志，何其壯也！……吾圖國朝先正遺傳 首顧先生，……亦豈無微旨哉？

其對於亭林，可謂推崇備至，嚮往之誠，不言而喻。曾國藩的學術成就之所以偉大，由於他認清楚了中國文化的正宗，遠紹鄒魯，近接崑山，爲經世之禮學放一異彩，也不啻爲中國文化開拓了光明的境域。

第二、從當時學術的趨勢看：我們知道：清代的學術，是中國學術史倒捲纏演的時期，周秦諸子以後，只有漢學今古文兩家，宋明學程朱陸王兩派。清初由明反於唐宋，中葉由唐宋反於兩漢，訓詁考據，風靡一世，到了道光年間，就發生三種新的趨勢：

(一)今文學派 莊存與劉逢祿倡之於前，龔自珍魏源繼之於後，至清末則廖平

康有爲大張其軍，他們標榜公羊學，以微言大義爲宗，實際是從漢學「衍生而來」的，不過有東西漢之分罷了。以後龔魏由公羊而治輿地，尤究心朝章國故世情民隱，於經世學多所發揮。大概都是受了外交時局的影響。至康梁則想「託古改制」來「變法維新」了。

(二) 桐城學派 自方苞劉大櫟明法曾鞏歸有光造立所謂古文義法，姚鼐繼之，「持論闕通」。遂因周濂溪「文以載道」，歐陽修「因文見道」之言，以道統自任，與當時所謂漢學者互相輕。一般人感覺考據、訓詁的規律太嚴，聲希味淡，而誦習桐城文章者，幾滿天下。

(三) 義理學派 清學是由於宋明理學的極敝而生的，當漢學鼎盛的時候，「治理學者漸不復能成軍」。但清初的理學家還很多，「粹然純儒」，伏流未沫，因有唐鑑、倭仁、羅澤南一般學者出來，恪宗宋儒，提倡義理，造成新理學的風氣。以力行代空泛，頗瀾明末的王學不同，大抵是程朱學派的遺響。

以上三派都口口聲聲的反對漢學，說他們「破碎害道」，各有探本求源之意，但二三兩派的成就都不大，因為他們以詞章義理爲限，不能利用漢學來發明古聖賢的義蘊，只是在門戶裏兜圈子，所以沒有多大的影響。老實說：桐城派的文章，尚不如清初侯魏一般人見道深，唐鑑，倭仁的義理，尚不如清初孫李王顏一般人見道真，他們都是違反時代潮流的，因爲清學倒捲纜演，已由唐宋而達於東漢，何能再返回宋明呢？其不見重於世是當然的。惟第一派是時代潮流的產物，由東漢之古文學而逆溯至西漢之今文學，公羊春秋的微言大義，董子春秋的內聖外王，也和孔子的經世學很接近，所以龔魏諸人在當時後世都有很大的關係。

曾國藩最初受了桐城派的影響，所以在聖賢畫像裏說：

姚先生（鼐）持論閎通，國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啓之也。

其次又受了義理學派的影響，作聖賢修己的工夫，前章所述他與唐倭二人的關係，可以見之。本文學派對於他有沒有影響呢？在他的學歷中，找不出什麼證明來，好像他和今

文學家全無關係。然而他的學問却與今文學派最合緣，並由西漢上溯至孔孟。這又是什麼緣故呢？

我們看：龔自珍（定盦）是浙江杭州人，生於乾隆五十七年，比曾國藩大十九歲，卒於道光二十一年，纔五十歲。他在北京做官的時候，曾國藩的足迹還未出湖南，當然是風馬牛不相及。及國藩中進士，自珍於次年就出京了，國藩更無納交之機會。但他們有兩位共同的朋友：一何紹基（子貞），二湯鵬（海秋），二人均湖南人，與國藩有同鄉的關係，國藩在家信中說：「講詩古文而藝通於道者，則有何子貞；才氣奔放，則有湯海秋」。湯鵬比國藩大十歲，卒於道光二十四年，與國藩相交僅二三年。何紹基比國藩大十二歲，卒於同治十二年，較國藩還遲死一年，可謂終身的朋友。國藩批評他說：

何子貞之談字，其精妙處無一不合，其談詩尤最符契。子貞深喜吾詩，故吾自十月來已作詩十八首（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致弟書）。

何子敬近待我甚好，常彼此作詩唱和，蓋因其兄欽佩我詩，且談字最相合，故子

敬亦改容加禮。子貞現臨隸字，每日七八葉，今年已千葉矣。近又考訂漢書之譌，每日手不釋卷。蓋子貞之學，長於五事：一曰儀禮精，二曰漢書熟，三曰說文精，四曰各體詩好，五曰字好：此五事者渠意皆欲有所傳於後。以余觀之，上三事余不甚精，不知深淺若何，若字則必傳千古無疑矣，詩亦遠出時手之上，而能卓然成家（同年十一月十七日致弟書）。

果然不出國藩所料，何紹基僅以字傳，所謂熟於儀禮說文漢書，大約造詣不深，和湯鵬都算是文學家，自無從窺今文學之藩籬，所以不能與龔曾二人作媒介了。最奇怪的是魏源（默深）在北京作內閣中書，又是國藩的同鄉。他雖比國藩大十七歲，却比較國藩中進士晚兩科，何以國藩與之竟無往來？魏源是龔自珍的好友，二人同爲今文學家，同以奇才名天下，其研究西北輿地及西洋事蹟，注重當世之務也是一樣的。他們都標榜「經世學」，有「明體達用」的精神，完全與國藩一致，似乎國藩應該受他們的影響不少。爲什麼國藩却無一字道及？據我想：龔自珍「豪邁者奇，動觸時忌」；而魏源也「性兀傲，高自

樹，論古「成敗，國家利病，學術本末，反復辨論不少衰」（見清史列傳）。二人都有才高行峻的氣概，和當時正從事於理學的曾國藩：「力求改過，痛自刻責」的氣味不甚相投，所以國藩和魏源並無交際。道光二十一年，魏源受裕謙之聘，往佐浙江戎幕，與林則徐相處數月，因而知鴉片戰爭的內幕，又得林則徐所譯西人四洲志，據以編海國圖志，開西學之先聲，爲維新之動力，難道曾國藩能漠然無聞嗎？況且道光二十年曾國藩有覆賀耦庚中丞書，耦庚卽賀長齡，湖南善化人，道光五年作江蘇布政使，曾延魏源替他輯皇朝經世文編，這也是一種間接的關係。故國藩信裏說：「未讀書之道，博學詳說，經世之才，偏采廣詢」，其注重經世之學，雖因賀氏文編的緣故，然國藩對於當時學風之兼容並蓄，也可見一斑了。

第三、從國藩治學的經過看：曾國藩在二十五歲以前，足跡未出湖南，又沒有什麼好朋友來匡輔他，所以志趣不高，只知「尋聲逐響」，作些八股試帖，以獵取功名。自乙未入京會試，見讖略廣，纔「窮研經史，尤好昌黎韓氏之文，慨然思躡而宗之」。由時文而

入於古文，故下第後借錢買二十三史讀，不再作截搭卜題的功夫了。如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致弟書云：

兄少時天分不甚低，厥後日與庸鄙者處，全無所聞，竅被茅塞久矣。及乙未到京後，始有志學詩古文並作字之法。

又次年五月十二日書云：

吾謂六弟（國華）今年入泮固佳，萬一不入，則當盡棄前功，壹志從事於先輩大家之文。年過二十，不爲少矣，若再扶牆摩壁，役役於考卷截搭卜題之中，將來時過而業仍不精，必有悔恨於失計者，不可不早圖也。余當日實見不到此，幸而早得科名，未受其害，向使至今未嘗入泮，則數十年從事於吊渡映帶之關，仍然一無所得，豈不靦顏也哉？此中誤人終身多矣！溫甫以世家之子弟，負過人之姿質，即使終不入泮，尙不至於飢餓，奈何亦以考卷誤終身也！

這是國藩的學問第一個進境。但他仍不能放棄科第的念頭，幸而他再試中式，考取翰林，

三年散館，所聞益多，始由文學而稍進於知道。如致劉孟容書云：

僕早不自立，自庚子以來，稍事學問，涉獵於前明本朝諸大儒之書，而不克辨其得失。聞此間有工爲古文詩者，就而審之，乃桐城姚郎中鼐之緒論，其言誠有可取，於是取司馬遷班固杜甫韓愈歐陽修曾鞏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讀之，其他六代之能詩者，及李白蘇軾黃庭堅之徒，亦皆泛其流而究其歸，然後知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於文字者也，能文而不能知道者或有矣，烏有知道而不明文者乎？

這封信可以看出他的學問又進了一步，他相信桐城派標榜的「因文見道」之言，想從詩文詞中去求道，但他似乎還不甚明白道爲何物，有時尙以「無失詞臣體面」爲已足。又過了兩年，他和倭仁、唐鑑交游，然後纔知所謂「道」是一種義理之學，不必附麗於文章，義理詞章考據是各別門戶的。於是他的學問更向宋學深入一層，從「靜」「敬」「慎獨」下手，作一番修己的工夫。這時他「考信於載籍，問途於亡經，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試其效」（見雜著勸誡紳士四條中），由博反約，纔省悟出「天下之道，非兩不立」，是宇宙

間的真理。因此他要破除漢宋學的藩籬，而兼取二者之長了。我們再看他致劉孟容的信裏說：

孔子親獲麟曰吾道窮矣，畏匡曰斯文將喪，於是慨然發憤，修訂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仲尼既沒，徒人分布，轉相流衍，厥後聰明魁傑之士，或有釋解撰著，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駁，一視乎見道之多寡以爲差，見道尤多者文尤醇焉，孟軻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見少者文駁焉，尤少者尤駁焉。自荀楊莊列屈賈而下，次等差，略可指數。夫所謂見道多寡之分數何也？曰深也博也。昔者孔子贊易以明天道，作春秋以衷人事之至當，可謂深矣；孔子之門有四科，子路知兵，冉求富國，問禮於柱史，論樂於魯伶，九流之說，皆悉其源，可謂博矣。深則能研萬事微芒之幾，博則能究萬物之情狀而不窮於用。後之見道不及孔氏者，其深有差焉，其博有差焉，能深且博而屬文復不失古聖之誼者，孟氏而下，惟周子之通書，張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儔。許鄭亦能深博，而訓詁之文，或失之

碎；程朱亦且深博，而指示之語，或失之隘。其他若杜佑鄭樵馬貴與王應麟之徒，能博而不能深，則文流於蔓矣；游楊金許薛胡之儔，能深而不能博，則文傷於易矣。由是有漢學宋學之分，斷斷相角，非一朝矣，僕竊不自揆，謬欲兼取二者之長，見道既深且博，而爲文復臻於無累，區區之心，不勝奢願！

這是國藩思想將近成熟的一種見解，他把道與文，深與博二者對舉，完全是由於「非兩不立」的哲學觀念而來的。這很顯然的已超出了宋學的範圍，凌駕秦漢而直入孔氏之門，求合乎易經辯證中庸執兩的道理了。道是哲學的義理，文是詞章與考據，深就是前面所說的專精，博就是博通，非得兼綜並蓄，不能成爲大儒，大儒是明道救世，而具有聖王雙層資格的。所以國藩在致力宋學的時候，並未嘗以朱學自限，唐鑑對他有啓發之功，他却未嘗墨守唐鑑的畦徑，以理學爲依歸，在他致劉孟容的信裏就有很明白的表示：「於漢宋二家構訟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闕，於諸儒崇道貶文之說，尤不敢雷同而苟隨」。他既說：「今日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不以精研文字爲要務」。所謂文字，乃是清代風靡一世的

小學，並非桐城派所說的詞章，因此他對於小學三大宗：字形、訓詁、音韻都有相當的研
究（見同治元年十月十四日家訓）。甚至說「余觀漢人詞章，未有不精於小學者」（同治
元年五月十四日家訓）。所以他對於周濂溪「文以載道，而以虛車譏俗儒（指訓詁家）」
的說法，就要加以修正了。他說：「虛車誠不可，無車又可以行遠乎？孔孟沒而道至今
存者，賴有此行遠之車也，吾輩今日苟有所見，而欲爲行遠之計，又不可不早具堅車乎
哉？」這和經學大師戴東原所說：「宋儒之譏訓詁，輕語言文字，猶渡江河而棄舟楫也」
不是一樣的意思嗎？他這種見解，在理學家詞章家都是沒有的。究竟國藩在什麼時候纔致
力於小學呢？他自己說：「余於道光末年，始好高郵王氏之書」。然而他讀段氏說文解
字，從事小學，却始於道光二十六年，我們看他的年譜說：

道光二十六年，公三十六歲，夏秋之交，僦居城南報國寺，閉門靜坐，攜金壇段
氏所注說文解字一書，以供披覽。漢陽劉公傳瑩精考據之學，好爲深沉之思，與公尤
莫逆，每從於寺舍，兀坐相對竟日，劉公謂近代儒者，崇尚考據，疲精費日力而無當

於身心，恆以詳說反約之旨，交相勸勉。寺前有祠一所，祀崑山顧亭林先生，十月公在寺爲詩五首贈劉公，以明其志之所嚮。

其中有一首是對於漢學的批評：

去年肺熱苦吟呻，今年耳聾百不聞，吾生卅六未全老，蒲柳已與西風鄰！念我識字殊珍少，淺思詎足燔精神。忽憶軒頡初考文，羣鬼唬夜天裂晨，斯高揚馬並姦怪，召陵祭酒尤絕倫，段生晚出吾最許，勢與二徐爭嶙峋，惜哉數子琢肝腎，鑿破醇古趨罵罵，書史不是養生物，雕鑿例少牢強身，我今日飲婆婆尙不樂，嗟爾皓首魚蠹人！

道光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劉傳瑩出京）可說是曾國藩治學最重要的一個階段，這時他和漢學家劉傳瑩時常往來，受了考據學的影響；劉傳瑩也受了他的理學之影響，兩個人的思想融會貫通，纔豁然而知爲學須反本務要，義理考據詞章各有是非，非綜合起來不可，它們的長處要能利用得當，偏執其一是不成的。這是國藩對於文學理學小學一步一步都下了精深的工夫之結果。我們看他稱述劉傳瑩的學識道：

漢陽劉傳瑩椒雲實究心漢學者之說，而疾其單辭碎義，輕笮宋賢，閒嘗語余：「學以反求諸心而已，泛博胡爲？至有事於身，與家與國，則當一一詳核焉而求其是，考諸室而市可行，驗諸獨而衆可從」。又曰：「禮非考據不明，學非心得不成」。國藩則大韙之，以爲知言者也（孫芝房侍講芻論序）。

蓋椒雲之學之自得於中者，有不可襮諸文字者矣，其致功之迹，國藩實親見之而親討之，稱述以詔其子，吾之職也。……自乾隆中葉以來，世有所謂漢學云者，起自一二博聞之士，稽核名物，頗拾先賢之遺而補其闕，久之，風氣日敝，學者頗以非毀宋儒爲能，至取孔孟書中心性仁義之字，一切變更舊訓，以與朱子相攻難。附和者既不一察，而矯之者惡其恣睢，因並蔑其稽核之長，而授人以詬病之柄，皆有識者所深憫也。椒雲初從事於考據，卽已洞知二者之弊，既更憂患之餘，尤自斂仰，退然若無以辨其學術也者，默識而已矣。於是道光二十八年二月，棄其所官國子監學正，決然歸去，以從政於門內，積其謹以嚴父母之事，以達於凡事無所不嚴；積其誠以推及

父母之所愛，若所不愛，無不感悅；其又不合，則考之禮經，覈之當世之會典，以權度乎吾心自然之則。必三善焉而後已。……蓋用漢學家之能綜核於倫常日用之地，以求一得當於朱子（漢陽劉君家傳）。

君之爲學，其初熟於德清胡渭太原閻若璩二家之書，篤嗜若渴，治之正反，既與當世多聞長者游，益得盡窺國朝六七鉅儒之緒所謂方輿六書九數之學，及古號能文詩者之法，皆已規得要領。……自傷少年羸弱，又所業繁雜，無當於身心，發憤歎曰：「凡吾之所爲學者，何爲也哉。舍孝弟取與之不講，而旁鶩瑣瑣，不以慎乎？於是痛革故常，取濂洛以下切己之說，以意時其離合而反覆之。……嘗語國藩：「沒世之名不足較，君子之學，務本焉而已，吾與子敝精於校讎，費日力於文辭，以中材而謀衆人之業，傲倖於身後不可誰何者之譽，自今以往，可一切罷棄，各敦內行，沒齒無聞而誓不後悔。」國藩敬諾（漢陽劉君墓誌銘）。

以上所說劉傳瑩的爲學「致功之迹」，其實也是曾國藩的爲學「致功之迹」。在表面上

看，是劉傳瑩由漢學而入於宋學，實際上也是曾國藩由宋學而入於漢學；他們從兩端來匯合一歸，必然要產生第三種的境界，所謂：「禮非考據不明，學非心得不成」，對於身家國三者，都應詳核而求其「是」，這是他們的結論。其意義是以考據為方法，而達到義理的境界，最後折衷於禮。禮就是「求是」——真理的一種準則。他們既洞知漢宋學各有流弊，「可一切罷棄」；若從反面來講，又是一切都有長處，應該吸取，必「三善焉而後已」，這纔是「務本之學」。國藩的思想，至此始達到了成熟的時候。我們看國藩的年譜說：

公在（報國）寺爲詩五首贈劉公，以明其志之所嚮。公嘗謂：「近世所學者，不以身心切近爲務，恆視一世之風尚以爲程而趨之，不數年風尚稍變，又棄其所業，以趨於新，如漢學、宋學、詞章、經濟以及一技一藝之流，皆各有門戶，更迭爲盛衰，論其原皆聖道所存，苟一念希天下之譽，校沒世之名，則適以自喪其守，而爲害於世」。公與劉公討論務本之學，而規切友朋，勸誡後進，一以此意爲兢兢焉。

曾國藩兢兢於「務本之學」，很顯然的是和劉傳瑩的意見「對立一致」之結果。這很像

近時流行的辯證法所謂由矛盾推向前進，生出正反相成的合題來，也就是中庸「執兩用中」，易經「殊途同歸」的道理了。不管是什麼學問，甚至一技一藝之流，其中皆有道，都能「更迭爲盛衰」，但究竟是一偏而不全的，若執迷不悟，忽略整體，則適足以喪守害世。曾國藩以「知本好古，不逐乎流俗」來論荀子傳道的精神，其必爲大成之學無疑矣。

就以上三方面來觀察：曾國藩的偉大成就，是有他的學術背景的。倘無古代孔孟的傳統，則何有「中庸」「經世」的體系？而顧亭林的通儒之學，也就無所附麗了。這是中國二三千年來的文化源泉灌溉之大本。由漢宋而演爲清學的倒捲，乾嘉以後今文學家追溯而上，這也是必然的趨勢。龔氏繼之，以說明古代的社會背景：謂「自周而上，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學也，一代之學，皆一代王者開之也」。魏氏更抉出董子春秋的微義，謂「其書三科九旨，燦然大備，且宏通精森，內聖而外王，蟠天際地，遠在胡母生、何休章句之上」。二人皆有功於古學，能合乎「明體達用」的經世之旨，似已接近孔子的門牆了。這是清初二百年以來的學術潮流所歸向之地步。曾國藩生在那個時代，能把握着那個時代，

承流尋源「知本好古」，以成就他的經世之禮學，發揮中庸文化的精神，其偉大在此。

這無疑的他是有超人的天才——爲什麼別人不能有這種成就呢？然而看他治學的經過，則又知仍從困勉而來。由俗學而文學，由文學而理學，由理學而小學，都曾下過苦工，都有精深的造詣，然後成爲通博的大儒。國藩所謂「既深且博」，就是孔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的意思。也就是「由博返約」「由約返博」的歸納法和演繹法了。但他爲什麼不用經世之名而用禮學呢？經世是從目的上言，禮是從方法上言，經世稍覺有空洞之嫌，禮則是實實在在的東西，孔子就是以禮爲標榜的。況且後人對「經世」——「經濟」一辭，多有誤解，差不多把它當做政治生計的專科學名了。從國藩的話裏——義理詞章考據經濟爲聖門四科，四者缺一不可——就可以看出來，但國藩仍再三說「經世之禮」、「經世之典」和「經世之大法」；又說「古無所謂經世之學，學禮焉而已」。也可以知道禮學就是經世學了。我們現在要提倡這種學問，完全是恢復固有文化的思意。爲什麼又不用禮學而用經世呢？因爲時代變遷的緣故，禮學在舊社會中是可以賅括一切的，在新社會中則不能賅括一

切，反不如經世二字的恢闕了。曾國藩聖哲畫像記裏，除四科的專儒外，尚有「不可以一方體論」的通儒，這表示他對於學術的分類，是非常正確的，專儒即今所謂專門人才，通儒即今所謂領袖人才，沒有專門人才則一切學術不能精進，沒有領袖人才則一切事業不能配合，好像技工和工程師一樣。假如我們能明白中國文化所蘊藏的真理，則對於曾國藩的學術是不難了解的。否則，只從一枝一節來論曾國藩的學術，則必難得其要領，也看不出他的偉大之處。若謂其爲文學家或理學家或政治家，更淺之乎視國藩矣！梁任公先生說：豈惟近代，蓋有史以來不一二觀之大人也已；豈惟中國，抑全世界不一二觀之大人也已（曾文正公嘉言鈔序）。

爲什麼這樣的推崇他呢？就因爲他能紹述孔子的真道，合學術事功而爲一，「內聖外王」，「有體有用」。即論學術成就，業已爲二千年以來不可多得之人物，辦香亭林而超乎亭林。況以儒生治兵，勘平大亂，維持中國文化的傳統，改造中國社會的積習，明道救世，修己治人，在世界上不是屈指可數的偉人嗎？

第四章 思想體系

我們前面已經說過：經世之學是以中庸之道爲基礎的。中庸即「執兩用中」之謂。什麼叫做「兩」呢？蓋天地間不論任何事物，總有相反的兩方面——端，這兩方面在外表上看似乎是矛盾的、對立的；在實際上却是一個整體的發展，因爲地方不同，時間不同，人類的觀察和運用也就不同了。易經常以陰陽寒暑來解釋：譬如說一晝一夜爲一天，晝夜乃相反的兩種現象，光天化日和長夜漫漫，不是一種矛盾嗎？但不有晝夜，何能知地球自轉之一週？何得謂之一天？而且這兩方面也不是絕對的，好像中國在東半球看見日頭出來算是白天，同時美國在西半球看見月亮就謂之夜。如此，月有晦明，歲有寒暑，循環相推，往來不窮，就有了時間的觀念，古人謂之「宙」，地分東西，極分南北，山川人物各有差異，就有了空間的觀念，古人謂之「宇」。以天地爲宇宙，纔造成整個的世界。人類因宇宙之「變」「常」而有知識，易經說：「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就是這種意思。人

居天地之間，總不能不受自然律的支配，乃有所謂「天人合一說」。中國文化的哲學基礎在此，這個問題太大了，我們不願多加討論。但古哲既以天地自然的規律，推之於人事，則其中必有很大的道理。我們再從極小的事物來看，一種物件必有兩端；一椿事情，必有反正。譬如一本書總得首尾俱全，方能成帙，而書的內容好壞，編排精粗，是相對的；一次戰爭，總得勝敗分明，方能結束，而戰爭的人力強弱，武器優劣，也是相對的。推之則一切事與物，或精神與物質，都是兩端對立的，這就是所謂「兩」。

什麼叫做「中」呢？一切事物的發展，既由一體而分爲兩端，復由兩端而合爲一體，這個兩端——正反相成而生的合，必有一個接頭處來作代表，就是所謂「中」了。譬如「中天」，普通人看見日出日入，算作一晝，日入日出算作一夜，正午十二時爲今天，晚間十二時爲中夜，好像中天中夜是晝夜一半的界限。其實在曆象學上，一天的開始是從夜間十二時一秒起，至次夜十二時止，一共二十四小時，正午十二時，乃是上午下午的接頭處。假如以陽陰來代表上午下午，不是陰陽之中，又各有晝夜嗎？必需晝夜兩端對立之

合，纔有所謂陰與陽之中；必需陰陽兩端對立之合，纔有所謂天與天之中。陽始於夜間十二時一秒，陰始於下午十二時一秒，中天中夜不過是陽陰兩極由盛轉衰的接頭處，從嚴格方面來講，二十四小時，非陰即陽，並無所謂「中」，試問十二時與十二時一秒之間，豈能另有一個分界的時間嗎？因此我們知道所謂「中」，僅爲一抽象名辭，不是實在有的東西。然而它代表兩端（正反）對立一致之整體——合。却轉變爲一種新的事物。這個新的事物是第三者，同時也是另一個本體了。譬如晝夜陰陽爲兩端，合之則爲一天，天就是第三者，沒有天那裏有什麼「中天」呢？如此一而二，二而三，三復爲一，循環不窮，所以要明「中」的意義，必需先懂得兩端相合的道理。

何以謂之「執兩用中」呢？因爲「中」既非「兩」不成，猶之舍晝夜而無「天」，舍寒暑而無「歲」，我們能說「天」和「歲」只有夜寒或只有晝暑嗎？固執一端的人，好像只知有夜寒，不知有晝暑，這完全是不懂得宇宙間事物發展之總規律的。所以觀察一切事物的現象，非先認識它的兩端不可。怎麼叫作執兩呢？一切事物的發展，由矛盾而對立，

都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譬如精神與物質本爲一體之兩面，是同時存在的，並非個別存在的。換句話說：就是有物質即有精神，有精神即有物質。所以精神與物質是事物之「積」(×)，並非事物之「和」(+)。辯證法所講的原則，原來不錯，是和易經相合的。但是黑格爾以觀念——精神爲宇宙之創造者，馬克思把它倒置過來，以觀念爲物質的反映，建設辯證的唯物論，和唯物的辯證法。其實辯證法的本身也是辯證的，心物既屬一體，那有什麼本末先後之分呢？唯物論者常以地球之生成爲先有物質的證據，試問地球又何以能生成呢？倘從「原子」「以太」來說，則似屬不可捉摸的東西。猶之乎雞生蛋，蛋生雞，先有雞乎？先有蛋乎？況且宇宙之生成，即代表物質與精神兩端，先有字乎？先有宙乎？照道理上講：字先於宙固可，宙先於字亦無不可。舍字無宙，舍宙無字，舍物質而無精神，舍精神更無物質，推之動與靜，數與質亦然。必需兩端對執，然後纔能合成一個新的事物。中國哲學以「中」字代表兩端對立一致之合，——就是第三個新事物——從整體來觀察說明，使發揮「持盈保泰」的作用，不執一以害事，

須因時而制宜，這就是用中的意思，所謂中庸之道是已（庸，用也）。但是我們已經說過，「中」非「兩」不成，那麼，用中就是用兩了，爲什麼對「兩」又說「執」呢？因爲「兩」是一種事物由內在的矛盾而發展現象，如偏執其一端而用之，則不免阻礙了它的進程。所以必需把握事物對立之兩端，而用其一致之中合。合雖代表一種新的事物，新的境界，然而在事物發展的歷程裏，中非單獨存在的實體，所以「中」不能執而能用。用的意義是看兩端發展到了什麼程度，「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因勢制宜」，蓋兩端各有其中，兩端之合又有中，不知其宜，自然就不能用「中」了。譬如天和地，宇和宙是兩端對立的，而「天地」、「宇宙」卽爲一個中合的新事物。天道地道各得其宜，就是一種合理的宇宙觀，又如利用天時之自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則有晝之中；「綠酒紅燈」，「花前月下」，則有夜之中。倘能適其時地之宜，自有生活得中之樂。否則就不免乾坤顛倒，晝夜失時了。一般人把中字常常誤解爲兩端各取其半，於是成了非禽非獸的蝙蝠，不黑不白的鄉愿，這完全是錯誤的。因爲兩端各有其極，纔算完成一個發展歷程，如

各取其半，就不成東西了。譬如中天爲陽之極，中夜爲陰之極，二者綜合的交點謂之中。爲什麼不說黎明黃昏是中天中夜呢？黎明黃昏雖爲晝夜之交點，但以天言，則黎明屬陽爲朝氣，黃昏屬陰爲暮氣，都還在一體之中，而不是兩端之合。所以鄉愿是灰色的，猶之黎明黃昏之不黑不白也；似是而非的，猶之黎明黃昏像是陽陰之中，而非晝夜一天之中也。孔子惡紫之奪朱，大罵鄉愿爲德賊，就因爲它埋沒了真理，錯認了時地之宜，結果是阻礙社會的前進。論語以狂狷爲中行的起點，就是教人該狂的狂，該狷的狷，絕不是不狂不狷，更不是半狂半狷。清雍正帝有一段話說得最好：

自古爲政者一言寬嚴相濟，所謂相濟者，非方欲寬而雜之以嚴，方欲嚴而雜之以寬也。惟觀乎其時，審乎其勢，當寬則寬，當嚴則嚴而已。……總之，寬嚴適協其宜，乃爲相濟，非參雜於寬嚴之間，而爲子莫之「執中」也（見東華錄）。
可見爲政或寬或嚴，做人或狂或狷，凡一切事物相對的現象，都必需相濟而成，纔算是「執中」的道理。相濟的意思，不是參雜，——因爲舍狂狷無中行，舍寬嚴無中道——乃

是適宜，所以「時措之宜也」，是中庸的基本條件。孔子稱爲「聖之時」，這是很有意義的。朱子解中爲不偏，解庸爲不易，真是極不通的話。實在庸就是用的意思。那麼，怎樣能「措之宜」的來用呢？必需先澈底認識宇宙間變易的真理，——這些就是聖哲們創造出來的宇宙觀、認識論和方法論。不過這些學說，須得完全一致，成立一套整個的體系，然後「舉而措天下之民」。因此我們可以知道世界上唯一無二的真理，只有中庸的辯證法和辯證的中庸論了。經世學就是從它反映出來的。

爲什麼費了那麼許多的辭句來解釋中庸呢？因爲曾國藩的思想完全是以它爲基礎的，不懂得中庸的道理，就不會明白曾國藩的思想，我們且看他自己說：

蓋天下之道，非兩不立，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仁義不明則亦無所謂道者。傳曰：「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斯二氣者，自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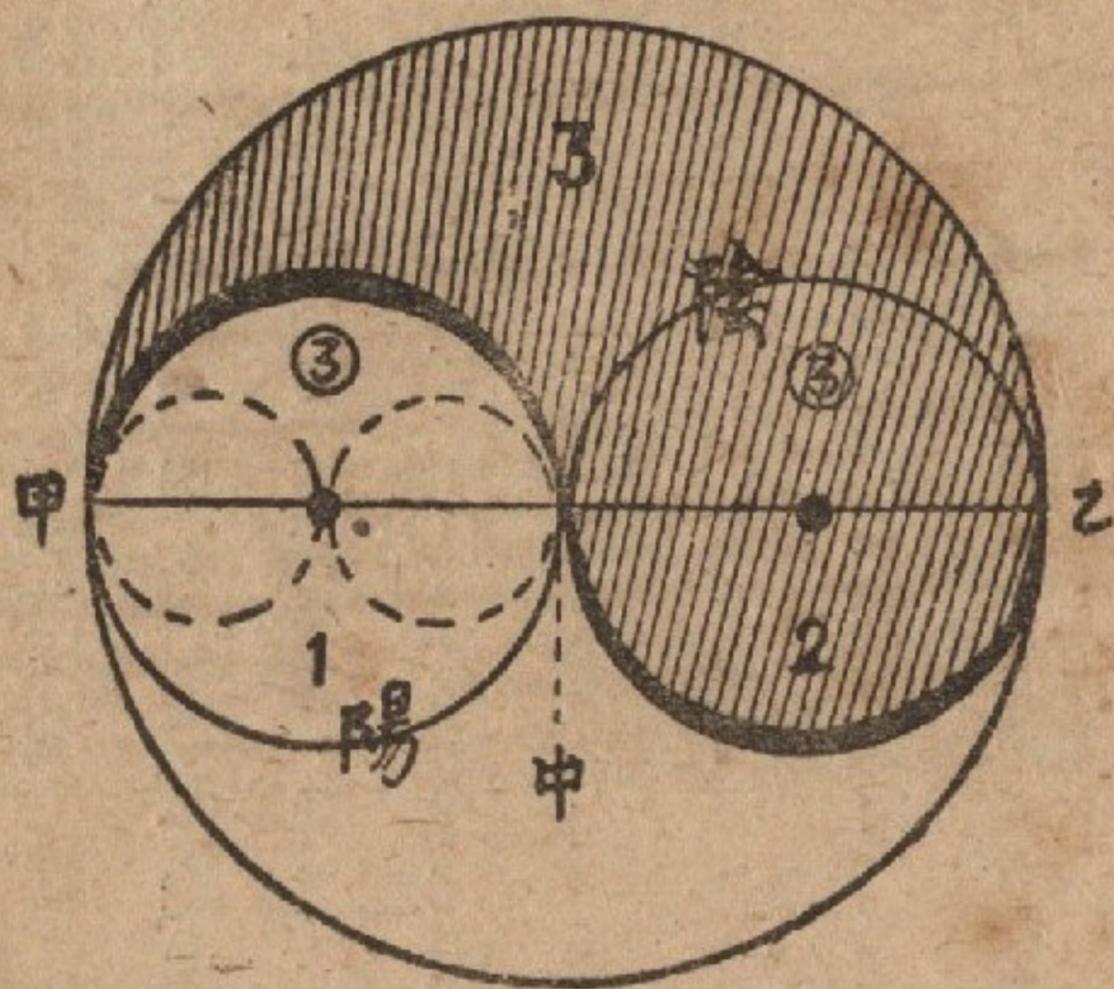
後而言之，因仁以育物，則慶賞之事起；因義以正物，則刑罰之事起。中則治，偏則亂（文集答劉孟容書）。

又說：

天地之數，以奇而生，以偶而成，一則生兩，兩則還歸於一，一奇一偶，互爲其用，是以無息焉。物無獨，必有對，太極生兩儀，倍之爲四象，重之爲八卦，此一生兩之說也。兩之所該，分而爲三，殺而爲萬，萬則幾於息矣，物不可以終息，故還歸於一。天地網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此兩而致於一之說也。一者陽之變，兩者陰之化，故曰一奇一偶者，天地之用也（送荇農南歸序）。

他解釋宇宙間的道理，凡物必有兩端相對，所謂「物無獨，必有對」也。兩歸一，一生兩，兩該爲二，是兩端對立一致的新事物，在新事物完成的時候是第三者，在前後兩個階段却又是「一」了。如此推演，變化無窮。所以「天地之道，非兩不立」；陰陽爲「兩」，則有「天道」之合，剛柔爲「兩」，則有「地道」之合；仁義爲兩，則有「人道」之合。

道就是天地人自然發展的總規律。所謂「中則治，偏則亂」，就是「用中」纔合乎真「道」。偏執則不合乎真「道」。這和我們前面所說的中庸之道不是一樣的嗎？爲讀者澈底明瞭起見，我們不妨利用太極圖再來說明一下：



如圖小圓陽（1）而陰（2），則「兩之所該（合）分而爲（3）」，（3）就是大圓了，復「還歸於一」。推之，則陽（1）陰（2）的小圓中又各有兩個小圓（如虛線），代表兩端，等於大圓之「3」。故「兩」和「三」均「還歸於一」也。

所謂「中」，非有該兩爲三的新事物，新境界不可。因爲「中」是陰陽的接頭處，非陰即陽，並沒有一點地位可尋，而且它是隨時代變動的，如陽（1）有中，陰（2）亦有中，該而爲（3）更有中；「3」是兩端對立一致之合，係就新事物完成時候而言的，在前後兩個階段又都變爲「一」了。爲什麼「用中」非「執兩」不可，又非「時措之宜」不可呢？因爲無兩即無中，非把握着小圓陽陰甲乙之兩極而知其演進之歷程，何能認識大圓（3）之中乎？譬如陽極而有中天，陰極而有中夜，陰陽兩極，合爲一天，纔有午時之正中，中夜就不是正中而是極端了。但合兩天而言，一奇一偶，則中夜又爲奇偶之中。所以中是有它的對象的，一中兩端，互相爲用，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要看它用那一個作對象罷了！好像圖中陽陰兩個小圓裏各有中，合起來的大圓也有中，究竟用那一個中呢？自

然在陽（1）的階段，要用「1」之中，在陰（2）的階段，要用「2」之中，在陰陽相合的階段要用「3」之中，倘使在（1）（2）小圓裏用大圓（3）之中，在大圓（3）裏用（1）（2）小圓之中，不是就偏了嗎？所以「用中」要以「時宜」為條件。曾國藩所謂「不知其分而妄施焉，過乎仁，其流為墨，過乎義，其流為楊，生於心，害於政，其極皆可以亂天下，不至率獸食人不止」（亦見復劉孟容書）。所謂「分」就是「宜」了，故言：「中則治，偏則亂」。猶之乎說：「當嚴則嚴，當寬則寬」，用違其宜，雜參不中，是不合乎真理的，豈能沒有流弊嗎？

曾國藩的思想體系既明，我們可以從事實上來證明它。如前章所說的「道」與「文」，「博」與「深」，即兩端對立而欲求其一致之合，所以他纔能用中庸的辯證法，以發揮綜合的經世學，現無庸多贅。當再就其寫字、治學、立身、處世四點來解說：

一、寫字 國藩對寫字很用功，就是在軍中也不間斷。其論寫字之法，說：「作字之道，剛健婀娜，二者闕一不可。余既奉歐陽率更李北海黃山谷三家，以為剛健之宗；又當

參以褚河南董思白婀娜之致，庶爲成書之體」（見日記文藝門）。剛健婀娜爲對立之兩端，必參而合之，始能成書，也就是執中的意思了。他又和何紹基講字說：「天下萬事萬理，皆出於乾坤二卦，卽以作字論之：純以神行，大氣鼓盪，脈絡周通，潛心內轉，此乾道也。結構精巧，向背有法，修短合度，此坤道也。凡乾以神氣言，凡坤以形質言；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卽此道也。樂本於乾，禮本於坤，作字而優游自得，真力彌滿者，卽樂之意也；絲絲入扣，轉折合法者，卽禮之意也」（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致諸弟書）。何紹基說他「真知大源」，因爲他能從寫字而認眞道；也可以說他既知眞道，所以能引用此理來論寫字和禮樂了。

二、治學 他治學的方法，「由博返約」，「由約返博」，兼歸納演繹而爲一，就是所謂中庸的辯證法。至於他治學的態度，我們先看梁任公先生的曾文正公嘉言鈔序說：

文正固非有超羣絕倫之天才，在並時諸賢傑中，稱最鈍拙。其所遭值時會，亦終身任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並不朽，所成就震古鑠今而莫與京者，其

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於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歷百千艱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銖積寸累，受之以虛，將之以勤，植之以剛，貞之以恆，帥之以誠，勇猛精進，堅苦卓絕，如斯而已，如斯而已。

再看龍夢孫先生曾文正公學案序也說：

曾文正爲近世之大人物，德業文章，炳耀寰宇，雖婦孺亦知欽佩其爲人。彼果何所得力而成就如斯之盛哉？吾嘗讀其遺集，按其行事，反覆推求，始知其得力所在，蓋由強毅謙謹而來也。惟其強毅也，故困知勉行，力追前哲，特立獨行，自拔流俗，雖極人世艱苦之境，而曾不少易其心；雖遇千挫百折之阻，亦不足以奪其志。真者必信，而不爲外界所移；妄者必不信，而不爲古人所欺。惟其謙謹也，故嘗以事理無盡，不敢以才智自矜。其接物也，則小心翼翼，無一人之敢慢；其赴公也，則兢兢業業，恐一事之或忽；以世務莫測，所推之或誤也，則時思以博訪於人；以國事萬端，才力之未逮也，則舉賢共圖如不及。其學問之所以增進，道德之所以高尚，功業文章

之所以炳耀寰宇，誠所謂日就月將，有本有源者矣。

由上可知，藩一生的成就。純由「強毅」「謙謹」兩種對立的態度而來。強毅爲剛，謙謹爲虛，一則表示「爲善固執」的求是精神；一則表示「虛懷若谷」的寬容精神；二者似矛盾而非矛盾，乃觀點不同耳。必二者合一，乃得剛柔互濟之效，這又是中庸的道理。

三、立身 其實國藩不僅在治學的態度方面，是剛柔互濟，即立身處世，無一不是剛柔互濟。他說：

作人之道，聖賢千言萬語，大抵不外「敬」「恕」二字。仲弓問仁一章，言敬恕最爲親切。自此而外，如「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爲泰而不驕」。「正其衣冠，儼然人望而畏，斯爲威而不猛」。是皆言敬之最好之下手者。孔言「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孟言「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是皆言恕之最好下手者（家訓）。

敬恕二字，可以看出國藩一生做人的要訣。敬是「內而專靜純一，外而整齊嚴肅」（日課），合篤恭二者而言之，篤恭斂於內，則有信心，有虛心，所以國藩說：「人苟能立志，則聖賢豪傑，何事不可爲，何必借助於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爲孔孟，則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學，人誰得而禦我哉？」此其自信爲何如乎？但同時他又說：「吾人爲學，最要虛心」。一總以除傲字爲第一義。唐虞之惡人：曰丹朱傲，曰象傲；桀紂之無道，曰強足以拒諫，辨足以飾非；曰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皆傲也。大約軍事之敗，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巨家之敗，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均見家書）。故「君子之道，莫善於下，莫不善於矜」（雜著氣節）。此其謙謹爲何如乎？這就是所謂「泰而不驕」。篤恭發於外，則尙忠誠，尙和氣。我們看庸齋筆記有一段故事說：

「傅相（李鴻章）入居幕中，文正（國藩）每日黎明必有幕僚會食，而江南北風氣，與湖南不同，日食稍宴，傅相遂不欲往。一日，以頭痛辭，頃之差弁絡繹而來，頃之，巡捕又來，曰：「必待幕僚到齊乃食」。傅相披衣踉蹌而往。文正終食無言，

食畢，舍奪正色謂傅相曰：「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處所向，惟一誠字而已」。遂無他言而散，傅相爲之悚然」。

這種板起面孔來教訓學生的態度，有多麼嚴肅呵！後來李元度失徽州，國藩具疏劾之。李鴻章以元度嘗與國藩同患難，乃率一幕人往爭，且說：「果必奏劾，門生不敢擬稿」。國藩說：「我自屬稿」。鴻章說：「若此，門生亦將告辭，不能留待矣」。國藩說：「聽君之便」。於以李鴻章離開幕府，閒居一年。這又是何等鄭重呢！可見曾國藩是以忠誠爲敬之主的。然而他對人的態度並不是「道貌岸然」，裝做那一種理學的臭架子，令人望着又怕又厭，有時候他却非常談諧，趣味雋永。如庚子西狩叢談中，李鴻章述國藩之日常生活說：

在營中我老師總要等我輩大家一同吃飯。飯罷後，卽圍坐談論。他老人家又最愛講笑話，惹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個個東歪西倒的，他自家偏一些不笑，以五個指頭作把，只管捋鬚，穆然端坐，若無其事。

「愛講笑話」而「穆然端坐」，正象徵着一團煦煦的和氣，真有一「萬物自育，四靈畢集」之樂。曾國藩制行謹嚴，秉性方正，其善於調侃的遺事還很多。如與劉孟容書說：「吾弟能來此一存視否？吾不願聞弟譚宿腐之義理，不願聽弟論膚泛之軍政，但願朝挹容暉，暮親臭味，吾心自適，吾魂自安，筠老雖深藏洞中，亦當強之一行，天下紛紛，鳥亂於上，魚亂於下，而容筠獨得晏然乎？」這够幽默的風趣了。又如在祁門危困的時候，衆人皆爲逃避計，國藩忽傳令說：「賊勢如此，有欲暫歸者，支給三月薪水，事平仍來營，吾不介意」。大家聽說，都感激慚愧，再也肯走了。這不是既莊且和的一種妙用嗎？所謂「威而不猛」是也。合篤、溫恭而爲敬，則更有「勤儉謹信」或「勤廉信慎」四字提出來，他所說的修己作人之道，大抵不外乎此。但只修己作人還不行，更要「立立人，欲達達人」，用「恕」字來和「敬」字配合而爲一，則是「成己成物」的中庸之道。恕是什麼呢？所謂「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與禮之合就是恕，仁者博愛，禮者循分，博愛則無倫，循分則有等，所以「取人爲善，與人爲善」和「以禮自治，以禮治人」，乃是仁

禮相對的作用。國藩在日課四條述求仁道：

至於尊官厚祿，高居人上，則有拯民溺救民飢之責；讀書學古，粗知大義，卽有覺後知覺後覺之責。若但知自了，而不知教養庶彙，是於天之所以厚我者，辜負甚大矣。孔門教人，莫大於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於「欲立立人，欲達達人」數語。立者自立不懼，如富戶百物有餘，不假外求；達者四達不悖，如貴人登高一呼，羣山四應。人孰不欲己立己達，若能推以立人達人，則與物同春矣。

可見求仁是讀書爲政的真正目的，要以此立志，纔能有明道救世的思想。所以他說：「蓋人不讀書則已，亦既自名爲讀書人，則必從事於大學。大學之綱領有三：明德，親民，止於至善，皆我分內事也。若讀書不能體貼到身上去，謂此三項與我了不相涉，則讀書何用？雖便能文能詩，博雅自詡，亦只算得識字之牧豬奴耳。豈得謂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致諸弟書）。自了漢，牧豬奴，那些自私自利的傢伙，就像劉獻廷所說的：「人苟不能斡旋氣運，利濟天下，徒以其智能爲一身家之謀，則不得謂之人

（王源劉處士墓表）。還能希望他們去求仁嗎？孟子所謂「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又是什麼意思呢？曾國藩說：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生，不愧爲大地之完人。故其爲憂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爲憂也，以德不修學不講爲憂也，是故頑民梗化則憂之，蠻夷猾夏則憂之，小人在位賢才否閉則憂之，匹夫匹婦不被己澤則憂之，所謂悲天命而憫人窮，此君子之所憂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飢飽，世俗之榮辱、得失、貴賤、毀譽，君子固不暇憂及此也（同上致諸弟書）。

可見以仁存心是應該有民胞物與之量，內聖外王之業，不忝父母之生，不愧天地完人，這就是先王經世的精神。何以又說：「以禮存心」呢？因爲「萬物之生，其理本同一源，乃若其分，則紛然而殊矣。親親與民殊，仁民與物殊，親有殺，賢有等，或相倍蓰，或相什佰，或相千萬，如此其不齊也。不知其分而妄施焉，過乎仁，其流爲墨」（曾國藩答劉孟容書）。當然不是中庸之道了。所以要以禮定分。禮者，秩序也。換句話說：就是人類在

道德、政治、法律、學術的範圍內，一切都應有它本來的地位和功能，誰也不要侵犯誰，循序發展，社會自然就不混亂了。即以學術而論，原是為推進社會指導人生的，而「俗儒閣閣蛙亂鳴」，究竟幹的些什麼事呢？我們看國藩在感春詩裏說：

男兒讀書良不惡，乃用文章自束縛！何（子貞）吳（南屏）朱（伯韓）邵（蕙西）不知羞，排日肝腎困鎚鑿。河西別駕酸到骨，作者立談三距躍。老湯（海秋）語言更支離，萬兀千搖仍述作。丈夫求志勸涓辛，蟲魚篆刻安足塵，賈馬杜韓一無用，豈況吾輩輕薄人？

這把同輩的文人乃至最要好的朋友都挖苦透了，國藩豈輕薄詩書者哉？他既主張禮學，立志救世，不能不為漢宋下一針砭，使學術切回復它原有的地位。我們再看他的十月戎行圖說：

生世不能學夔皋，裁量帝載踏甄陶；猶當下同郭與李，手提兩京還天子。三年海國困長鯨，百萬民膏餒封豕，諸公密勿既不臧，吾徒迂疏尤可恥。

這和顧亭林所謂：「於當今之通患，而未嘗專指其人，亦遂不敢以辟也」。都是一樣的意思。國藩既要「以禮自治，以禮治人」，自不能爲姑息之仁，君子當愛人以德。學術是一切事業的原動力，所以他不惜大聲疾呼，用激烈的口吻說：「文風不是救時物，揚雄司馬烏足驕！」（酬李生），此種一掃而空的態度，大有學術革命的意味，以破壞爲建設，乃仁禮相對之分，所以說是「分內事」。總之，合內外篤恭之敬，參仁禮立達之恕，消極與積極對立，修己治人，就是中庸之道，聖王之業了。 藩嘗說：「立身之道，以禹墨之勤儉，兼老莊之靜虛，庶於修己治人之術，兩得之矣」。又說：「不爲聖賢，便爲禽獸」。可見他認識兩端，相互爲用，絕不肯作鄉愿折中的論調。

四、處世 國藩對於正人心，維風俗，常舉「厚」「實」兩點，這是就存心而言的。至於他處世的態度，完全是剛柔互濟，絕不偏執於一端。如云：

作人之道，以剛介爲自立之基，以敬恕爲養心之要（與葛翠山書）。

志節之軒昂，與情之纏綿，二者不可偏廢（與李希菴中丞書）。

所謂「敬恕」，所謂「纏綿」，似乎都是柔道，但以「剛介」「軒昂」爲骨子，剛以剛濟柔矣。所以他有一「養活一團春意思，撐起兩根窮骨頭」的聯語。他的兒子曾紀澤，稟氣清淡，恐流柔弱，特字之曰「劬剛」。都可以看出剛對柔並重的意思。同治元年五月二十八日致九弟季弟信說：

從古帝王將相，無人不由自強自立做出，卽爲聖賢者，亦各有自立自強之道，故能獨立不懼，確乎不拔。余往年在京，好與有大名大位者爲仇，亦未始無挺然特立，不畏強禦之意。

近來見得天地之道，剛柔互用，不用偏廢，太柔則靡，太剛則折。剛非暴虐之謂也，強矯而已；柔非卑弱之謂也，謙退而已。趨事赴公，則當強矯；爭名逐利，則當謙退；開創家業，則當強矯；守成安樂，則當謙退；出與人物應接，則當強矯；入與妻孥享受，則當謙退。若一面建功立業，外享大名，一面求田問舍，內圖厚實；二者皆有盈滿之象，全無謙退之意，則斷不能久。此余所深信，而弟宜默默體驗者也。

這把他的處世哲學，說得明明白白，就把一生的行事來體察，在京官時代，辦團時代，都是強矯一流的人物，——雖然他也很謙退。如覆黃子春書云：

國藩從宦有年，飽閱京洛風塵，達官貴人，優容養望，與在下者輒熟和同之象，蓋已稔知之而慣嘗之，積不能平，乃變而有慷慨激烈軒爽骯髒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來不白不黑不痛不癢牢不可破之習，而矯枉過正，或不免流於意氣之偏，是以屢蹈愆尤，叢譏取戾。而仁人君子，固不當責以中庸之道，且當憐其有所激而爲之之苦衷也。

又與劉孟容書說：

國藩人世已深，厭閱一種寬厚論說，模稜氣象，養成不黑不白不痛不癢之世界，誤人家國，已非一日，偶有所觸，則輪困肝膽，又欲掀振一番。非吾弟亦無以發吾之狂言！

可見他對於輒熟和同不黑不白的社會，是多麼「痛恨刺骨」！在京任「六曹」，「目擊此等風

味」，則與達官貴人爲仇。在鄉辦「團務」，「見一二當軸者，自藩彌善，若惟恐人之攘臂而與其間也者，欲固執謙德，則於事無濟，而於心亦多不可耐，於是攘臂越俎，誅斬匪徒，處分軍案，不復以相關白」（見嘉言鈔）。這種嚴厲的態度，是不是矯枉過正呢？他說：不治以嚴刑峻法，則鼠子紛起，將來無復措手之處，是以壹意殘忍，冀回頽風於萬一。書生豈解好殺，要以時勢所迫，非是則無以鋤強暴而安我孱弱之民（嘉言鈔引）。

所以他「用法嚴，非漫無條件，要以精微之意，行吾威厲之事」，求合乎「時勢」之宜，自然仍是中庸了。可是他這種作風能否得一般人的諒解呢？那是不會的。我們看他與劉霞仙書說：

近日友朋致書規我，多疑我近於妬功嫉能伎薄險狠者之所爲，遂使我憤恨無已。虹貫荆卿之心，而見者以爲淫氛而薄之；碧化長宏之血，而覽者以爲頑石而棄之；古今同慨，我豈伊殊！屈纍之所以一沈而萬世不復返顧者，良有以也。僕之不能推誠與

人，豈有歲年，今欲矯揉而姍姍向人，是再僞耳。

當時是「彼此塗飾，聊以自保，泄泄成風，阿同駭異」的社會，要在「積翫之後，振之以猛」（見禮賀 庚書），直如冰炭不容；結果，「推誠與人」而人反疑之，雖國藩也不能「憤恨無已」了！難道就應該效屈子之自沈嗎？這又不然，他始終是持之以恆，絕不灰心泄氣，絕不矯揉造作，一本直道而行。然而在功名漸盛地位漸高的時候，則其勢不同，就需要持盈保泰，恬退謙謹了。韓昌黎詩：「中朝大官老於事，詎肯感激徒姍姍」。國藩是姍姍嗎？這更不然，他雖說：「亦漸老於事，鋒鏑鈍矣」，實則故示謙德，「喜聞迂直之言」，而以貞固自守。同治六年正月初三日致九弟書云：

兄自問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訣。兄昔年自負本領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見得人家不是。自從丁巳（咸豐七年）戊午大悔大悟之後，乃知自己全無本領，凡事都見得人家「幾分是處，故自戊午至今九載，與四十歲以前，迥不相同，大約以能立能達為體，以不怨不尤為用。立者發奮自強，站得住也；達者，辦事圓融，行得

通也。

又同年三月初二日書云：

弟當此百端拂逆之時，想心緒益覺難堪，然事已如此，亦只有逆來順受之法。仍不外悔字訣、硬字訣而已。……弟當此艱危之際，若能以硬字法冬藏之德（貞），以悔字啓春生之機（元），庶幾可挽回一二乎？

「悔」「硬」二字訣，是國藩立身處世的思想之化境。照一般的解釋，總以為國藩悔悟其往日強矯之非，而務以柔道行之了。其實是他「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和「取人爲善，與人爲善」的對立一致之台。悔是覺悟的意思，覺悟出真道的微妙處，知「自己全無本領」，正見得自己「本領甚大」。「能立」、「能達」、「不怨不尤」乃剛柔體用之極致。國藩還指他兄弟不明白悔字的奧窔而趨於消極，乃用一硬字訣來救濟。梁任公先生所謂：「貞之 恆，帥之以誠，勇猛精進，堅苦卓絕」；龍夢孫先生所謂：「雖極人世艱苦之境，而曾不少易其心，雖遇千挫百折之阻，亦不足以奪其志」；都見出一個硬字來。故國藩晚

年，仍謂：「『倔強』二字，卻不可少，功業文章，皆須此二字貫注其中，否則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謂『至剛』，孔子所謂『貞固』，皆從『倔強』二字做出」。又說他兄弟習稟母德居多，好處正在「倔強」。他雖衰老，「亦勃常有不可遏之候」。這正是以剛（強硬）爲體，以柔（謙悔）爲用，合禹墨老莊爲一途，以成中庸之道了。一般人都明白這種道理，所以對於國藩的思想常有不甚正確的推論。如水窗春說：

文正一生凡三變：書字初學柳誠懸；中年學黃山谷；晚年學李北海，而參以劉石菴，故挺健之中，愈饒嫵媚。其學問初爲翰林詞賦；既與唐鏡海太常遊，究心先儒語錄；後又爲六書之學，博覽乾嘉朝訓詁諸書，而不以宋人註經爲然。在京宦時，以程朱爲依歸，至出而辦理團練軍務，又變而爲申韓，嘗自稱欲著挺經，言其剛也。咸豐七年在江西軍中丁外艱，聞訃奏報後，而奔喪回籍，朝議頗不謂然，左恪靖在駱文忠幕中，肆以詆毀，一時譁然和之，文正亦內疚於心，得不寐之疾。曹鏡初診之，言岐黃可醫身病，黃老可醫心病，蓋欲以黃老諷之也。……此次出山後，一以柔道行之，

以至成此巨功，毫無沾沾自喜之色。嘗戲謂予曰：「他日有為吾作墓誌者，銘文吾已撰：『不信書，信運氣，公之言，告萬世』數語」。故輓聯中有「將汗馬勛名，問牛相業，都看作糝糠塵垢」云云，道出此老心事。蓋文正嘗言：「吾學以禹墨爲體，莊老爲用」。可知其所趨向矣。

後人根據此說，也認爲他的思想有好幾次轉變。老實講：他的思想，始終沒有轉變，所謂「三變」者，乃其寫字治學立身處世因時世而措之宜，所謂執兩用中而已。他的思想中心總不離乎孔子的「中庸」之道，「經世」之學，所以能合道文而爲一，盡博學之能事，剛柔相濟，老墨並用，綜爲大成之禮學，兼具聖王之事業，這種偉大的成就，豈是偶然的！倘使不明他的思想體系，則枝節浮蔓之論，那能够「道出此老心事」呢？

第五章 天才與志氣

曾國藩的學術是「經世」，思想是「中庸」，成就如此偉大，究竟怎樣得來的呢？一般都認爲「困知勉行，立志自拔於流俗」，是他一生成功的最大原因。換句話說，就是勤懇力學。有人比之爲鄉下務正業的小農民，他「道文章學問道德功業，只有汗血才能換得來，正如小農民要一粒一顆稻麥都非出汗不可，這是不錯的。但梁任公先生謂其：「非有超羣軼倫之天才，在並時諸賢傑中，稱最鈍拙」。國藩自己也說：「自以秉質愚柔，舍困勉二字，別無人處」（覆夏弢甫書）。又說：「吾生平短於才，愛者或謬以德器相許，實則謬會任艱鉅，自問僅一愚人，幸不以私智詭譎鑿其愚，尚可告後昆耳」（筆記才德條）。難道你真是一個鈍拙愚柔短才的人嗎？實在說起來，這又不盡然了。一個人的成就有小有大，小者或可從困勉銖積寸累得來，若大成的學問，聖王的德業，只靠辛苦強學還是不行，尤必有超人的領悟天才，纔能相濟爲用。國藩的李忠武公神道碑銘說：「器有洪纖，

因材而就，次者學成，大者天授」。可見一斑。我們再看他論才德說：

司馬溫公曰：「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余謂德與才不可偏重。譬之於水，德在潤下，才卽其載物；溉田之用；譬之於木，德在曲直，才卽其舟楫棟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卽其波瀾；德若木之根，才卽其枝葉。德而無才以輔之，則近於愚人；才而無德以立之，則近於小人。……二者既不可兼，與其無德而近於小人，毋寧無才而近於愚人。自修之方，觀人之術，皆以此爲衡可矣。

由上可見國藩並不漠視才與德的相對作用。何以他反自稱無才呢？這不過是國藩的一種謙德。因爲才是靠不住的，如果恃才傲物，就容易泛濫橫流，近於小人了。這完全都是勉人爲學的意思，所以他勸戒紳士四條說：

天下無現成之人才，亦無生知之卓識，大抵皆由勉強磨鍊而出耳。淮南子曰：「功可強成，名可強立」。董子曰：「強勉學問，則聞見博；強勉行道，則德日起」。

中庸所謂：「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即勉強工夫也。今士人皆思見用於世，而乏用世之具，誠能考信於載籍，問途於已經，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試其效，勉之又勉，則識可漸進，才亦漸充，才識足以濟世，何患世莫已知哉！

蓋學爲格物之事，才爲致知之事，國藩初宗程朱，力排陽明，要由格物而致知，其注重學問是當然的。但他於「考信載籍，問途已經」以後，爲什麼又說：「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試其效，識可漸進，才可漸充」呢？思就是才，通就是識，才學識三者原有其連環性和一貫性的。學與才對立一致爲識，非學無以成才，非才無以濟學，「不可偏重」，才能獲得真實的知識。孔子所謂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也是這種意思。國藩勸戒委員四條有「勤學問以廣才」一條，又應詔陳言疏，引諸葛亮「才須學，學須識」的話，亦可見學與才的關係。因此我們知道：國藩的學問既深且博，國藩的才思也非常明通，不能就其表面的謙而遽謂之「鈍拙」。若然，就不合乎中庸辯證的道理了。

我們拿事實來證明吧：國藩不是注重學問二字嗎？但他在復劉孟容的信裏說：「國藩

之愚，以爲學功之成否，人力居其三，天命居其七，苟爲無命，雖大聖畢生皇皇而無濟於世。文章之成否，學問居其三，天資居其七，秉質之清濁厚薄，亦命也。前世好文之士，不可億計，成者百一，傳者千一，彼各有命焉。命也者，彼蒼尸之，吾之所無如何者也；學也者人心主之，吾之所能自勉者也」。家信中對子弟的賢否，也有六分天生，四分家教的話。何以又這樣重視天命天才呢？好像是他的一種矛盾思想，其實不然，這正是中庸相反相成的道理。俗所謂「天定勝人，人定勝天」，「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不是一樣的道理嗎？倘不明乎此，則讀曾國藩的書籍，直如隔靴搔癢，處處都覺得矛盾了。譬如國藩自稱愚柔，而致九弟書云：「古來豪傑，吾家祖父教人，以懦弱無剛四字爲大恥，故男兒自立，必須有倔強之氣。弟能受數萬人之剛氣而久不銷損，此是過人之處，更宜從此加功！」你說他沒有天才嗎？可是他的祖父告訴他說：「爾的官是做不盡的，爾的才是好的，滿招損，謙受益，爾若不做，更好全了」。可見國藩只是在不傲上做工夫，頗有大智若愚之意。他常說：「吾兄弟天分均不甚高明」，而却謂國華「蓋是「上等之資」。他常

說從唐鑑交遊以後，始粗識學問指歸，而又說：「僕學無師承，冥行臆斷，所辛苦而僅得之者」（復許孝廉振緯書）。「生平工夫，全未用火猛煮過，雖略有見識，乃是從悟境得來」（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致弟書）。悟境不就是天才嗎？我們先看看他的悟境：

靜中細思：古今億萬年，無有窮期；人生其間，數十寒暑，僅須臾耳！大地數萬里，不可紀極，人於其中，寢處遊息，晝僅一室耳！夜僅一榻耳！古人書籍，近人著述，浩如煙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過九牛之一毛耳！事變萬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辦者，不過太倉一粟耳！知天之長，而吾所歷者短，則遇患橫逆之來，當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則遇榮利爭奪之境，當退讓以守其雌；知書籍之多，而吾所見者寡，則不敢以一得自喜，而當思擇善而約守之；知事變之多，而吾所辦之者少，則不敢以功名自矜，而當思舉賢而共圖之。夫如是則自私自滿之見，可漸漸蠲除矣（壬戌二月日記）。

這是何等高明的見解！芸芸衆生，「不知天多高，地多厚」，只曉得有一個「我」，則一

切相害相悖矣。倘能覺悟到此種境界，自然可以除去自私自滿之見，往大道上邁進。否則坐井觀天，畫地自限，沒有偉大的人生觀，焉能有偉大的學術事業？所以覺悟是做人的始基，也是做人的歸宿；由於天才而來，也由於學問而得。如國藩書贈仲弟有云：

「三達德之首曰智，智即明也，明有二端：人見其近，我見其遠，曰高明；人見其粗，我見其細，曰精明。高明者譬如室中所見有限，登樓則所見遠矣，登山則所見更遠矣；精明者譬如至微之物，以顯微鏡照之，則加大一倍十倍百倍矣；又如粗糙之米，再舂則粗糙全去，三舂四舂則精白絕倫矣。高明由於天分，精明由於學問。吾兄弟天分均不甚高明，專賴學問以求精明。能明而斷，謂之英斷，不明而斷，謂之武斷，惟謙退而不肯輕斷，最足養福」。

果真國藩的「天分不甚高明嗎」？他是守「以才自足，以才自矜，則爲小人所忌，亦爲君子所薄」之戒，而拳拳服膺莊生「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的教條的（見格言四幅書贈李芋仙）。從謙退養福之言，就可知他爲什麼「粥粥若無能」的道理了。

不但才與學相濟的道理是如此，卽如發舒到志氣方面，屈伸行藏，也是一樣的。他在初入北京會試的時候，就抱有澄清天下之志，如乙未歲暮雜感詩道：

去年此際賦長征，豪氣思屠大海鯨，湖上三更邀月飲，天邊萬嶺挾舟行。竟將雲夢吞如芥，未信君山剗不平！偏是東皇來去易，又吹草綠滿蓬瀛。

紛紛節候儘平常，西舍東家底事忙，十二萬年都小劫，七千餘歲亦中殤，蜉蝣身世知何極，胡蝶夢魂又一場。少昊笑儂情太寡，故堆錦繡富春光。

韶華彈指總悠悠，我到人間廿五秋，自愧望洋迷學海，更無清福住糟邱。尊前瓦注曾千局，脚底紅塵卽九州。自笑此身何處著？笙歌叢裏合閒遊。

爲感爲否兩蹉跎，搔首乾坤踏踏歌，萬事拚同駢拇視，浮生無奈繭絲多！頻年蹤迹隨波謫，大半光陰被墨磨。匣裏唾泉吟不住，問予何日斫蛟鼉？

在這幾首詩裏可以看出他的志氣來，以一個二十五歲的青年，就有氣吞雲夢，剗平君山問何日研蛟屠鯨的豪情，這不是他後來事業的一種預言嗎？鴉片戰爭初起之年，他抱有一早

絕天驕盪海氛」(寄郭筠仙詩)的胸懷，但他只是一個窮翰林，正在預備作事的時期，又有什麼力量呢？所以一方面要盡力修養，說：「龔龔挈瓶嗟器小」(三十二初度詩)，而以「百圍梁棟藉輪囷」自況，深怕學問不行；一方面又急於問世，說：「陳平宰國無消息」(聞客話里中近事)，「蒼生竟奈此人何？誰憐寂寞揚雄宅，獨抱繁憂臥薜蘿」(元戎)，真是情見乎詞了。王闓運湘綺樓日記戊寅二月十一日云：「繙曾滌丈文集，見其少時汲汲皇皇有俠動之志。因思諸葛孔明自比管樂；殊非淡靜者，而兩人陳義皆以恬爲宗，蓋補其不足耶？」王氏不懂得有爲無爲的道理，所以纔妄作「補其不足」的猜想。其實才氣奔放與沖懷淡遠，是可以並行不悖的。在他過了翰林院幾年的清苦生活以後，思想時常發生這樣的矛盾：「微官冷似支牀石，去國情如失乳兒」(漫興)，心緒如繭，報國無力，多少有些心灰意懶，於是乎說：「時猶憂世事，此志固荒唐！」(歲暮雜感)，「補天儻無術，不如且荷鋤！」(秋懷詩)，遂不免有「憾我不學山中人，少小從耕拾束薪，世事癡雙百不識，笑置詩書如埃塵」(送凌十一歸長沙)的消極思想了。文章憎命，一般士大夫總

要發點牢騷，國藩又何能例外？有時他還自怨自艾的說：「胸中不辨管與樂，囊中嘗少使與耆，朝唏夕噫不自得，俛首長誦鵜梁詩！」（酬李生）甚至以非驢非馬自笑：

老劉偃蹇不稱意，酸寒一衿初受裁，我雖置身霄漢上，器小僅儕餅與壘。立朝本非汲黯節，媚世又無張禹才，似驢非驢馬非馬，自憎形影良可哈（答李生）。

可是小雅怨誹而不亂，國藩的詩中是有這種意味的。壯懷莫展，則思田園之樂；國步方艱，則有澄清之志；消極與積極的觀念之衝突，自憎與自尊的情感之對立，曾國藩究竟怎樣來統一呢？他既了解中庸的道理，無論如何，對於環境的應付，尚覺裕如。「百變不離其宗」，他的中心思想，總離不開經世之禮學，有時候發點牢騷算什麼？我們一看他的感春詩就可以知道他畢竟是非常之人，而有非常的吐屬了：

蕩蕩青天不可上，天門雙螭勢吞象，豺狼虎豹守九關，厲齒磨牙誰敢仰？羣鳥啞啞叫紫宸，借哉翅短難長往！一朝孤鳳鳴雲中，震斷九州無凡響，丹心爛漫開瑤池，碧血淋漓染仙仗，要全惡鳥變音聲，坐看哀鴻同長養。上有日月照精誠，旁有鬼神瞰高朗。

太華山頂一虬松，萬齡千代無人蹤，夜半霹靂從天下，巨木飛送清渭東。橫臥江干徑十里，盤坳上有層雲封，長安梓人誠一見，天子正造咸陽宮，大斧長繩立挽致，來牛去馬填坑硤。虹梁百圍飾玉帶，螭柱萬石樅金鐘。草言儒生終齷齪，萬一雉卵變蛟龍。這樣的蒼茫獨立，慷慨悲歌，自謂不讓陳臥子，真有豪氣縱橫不可一世之概，生生是國藩自己的寫照，完全把他在北京做官時代的心情都表現出來了。這不又是他後來事業的一種預言嗎？可見他是有自知之明的。青天難上，螭虎守關，象徵着朝廷的政治舞臺之仰不可及，被親貴權要把持着，啞啞羣鳥，翅短情急，有什麼辦法長往紫宸呢？袞袞百官，可以休矣！一日鳳鳴臺中，震斷九州，松生太華，飛送清渭，丹心瑤池，螭柱金鐘，這纔是儒生非常的事業，雉卵變龍的機會。他似乎很清楚的看出他的治國經綸，在滿清政治的場合中，絕不容易實現，只有像孤鳳虬松一樣的待時而動了。果然晴天霹靂，太平天國發難金田，清朝如摧枯拉朽，行將不能支持，而國藩屠鯨斫蛟嗜鳳變龍的機會到了。我們能說他這是一種誇大的偶合嗎？

第六章 京官時代的政論

曾國藩在北京做官的時代，本來負經世之志，欲「大有爲以膏澤斯民」。無奈清明的政治，到了道光年間，已經腐敗不堪，人心玩愒，社會頹靡，大有其勢莫挽的樣子。加以異族統治，成見甚深，漢人想執政，差不多是不可能的。所以國藩有「蕩蕩青天不可上」之感。經過幾年的奮鬥嘗試，他感覺着失望了。然而就作官一方面來講，他總算是少年得志的。一個新進的詞臣，想着登用，有什麼辦法呢？只得憑自己的考試工夫和運氣。要不然的話就得靠權貴們的提攜。國藩的考試本領很好，但只能得考差或翰林升級，若補授實官，就非有門路不可。這時當國者大學士穆彰阿，恰巧是國藩的座師（戊戌會議大總裁），對於國藩非常器重，盡力幫助，因此他的官運很亨通，湘軍志王闔連答門生之言，說國藩發跡由於穆彰阿是不錯的。道光二十七年，他居然由從四品的侍講學士，升到從二品的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內閣學士等於現在行政院的秘書參事處長之類，侍郎就等於現在各

部的次長。這時他僅三十七歲。其致弟書云：

六月二日，蒙皇上天恩及祖父德澤，予得超升內閣學士，顧影捫心，實深慚悚。

湖南三十七歲至二品者，本朝尚無一人。予之德薄才劣，何以堪此！近來中進七十年得閣學者，惟壬辰季仙九師，乙未張小浦，及予三人。而予之才地，實不及彼二人遠甚，以是尤深愧仄！

話雖如此說，其實他心裏是很得意的。以後雖未能「扶搖直上」，但從二十九年補授禮部右侍郎，直到咸豐二年。他兼任過兵工刑吏四部的侍郎，也算是第二等要了。六年實際政治的工作，自和翰林不同，他究竟有些什麼貢獻呢？值班召見，到署辦事，勤於供職，得到皇帝的嘉勉，員司的欽服，說他條理精密，這不過是一個好事務官，那能談得上政治呢？他的知己朋友，雖都承認他的文章道德是特出的，但不知道他有大政治家的才能。所以有人說：恐怕連他自己也不知道。但我們看他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初四給諸弟信說：

吾近於官場，頗厭其繁俗而無補於國計民生。惟勢之所處，求退不能。但願諸弟

稍有進步，家中略有仰事之資，即思決志歸養，以行吾素。

我知道他有政治上的抱負，而以國計民生爲念的。因爲官場的習氣太壞，他感覺着厭惡，纔有決志歸養的念頭。所不能實行的緣故，據他說是經濟的關係。他在北京做官，雖然對家庭有些接濟，可是欠了一千兩銀子的債，回家又需幾百兩的路費，「甚難措辦」。再說他的年齡並不大，拿什麼理由來請假歸籍呢？因此他打算得一個學差，或外省主考，借辭出京，溜之大吉。這種內心的煩悶，就因感覺政治的清明無望，穆彰阿不是作大事業的人，自己不得已而一時依附，總有些不安。他其始作了三年的二品官，實際上是毫無展佈的。

道光三十年正月清宣宗逝世，殊諭遺命四條，其中無庸郊配，無庸廟祔二條，文宗即位，令臣工詳議具奏。國藩是體部侍郎，這種有關儀禮的事情，自然要他貢獻意見了。他就上了一個有名的遵議大禮疏，其大意說：

諸臣皆以大行皇帝功德懿懌，郊配既斷不可易，廟祔尤在所必行，直道不泯，此

天下之公論也。臣亦欲隨從衆議，退而細思大行皇帝諄諄誥誡，必有精意存乎其中，臣下鑽仰高深，苟窺見萬分之一，亦當各獻其說，備聖主之博采。竊以爲遺命無庸廟耐一條，考古準今，萬難遵從，無庸郊廟一條，則不敢從者二，不敢從者有三焉。

他引經據典洋洋灑灑的一篇大文，果然蒙咸豐帝贊許，說「曾國藩所奏頗有是處，其餘殊少折衷」。這件事在表面上看不過是一種儀文，無關政要。實則是當時政治上的一大暗潮。穆彰阿是道光帝的權臣，假如不尊崇宣宗，自己的地位也難看了，所以不願遵遺命，講：「列聖皆配，今子不尊父，無以示天下大孝，遺詔謙讓，皇帝孝敬，禮可並行」。可是「羣臣」都主張「奉遺詔」。只有一個內閣中書李仁元贊成穆彰阿的意見，大家都罵李：「依權相希驟進用」。曾國藩是禮部侍郎，穆彰阿的門生，又頗有清望，在職責上，感情上，道理上都非常難處。結果他找出禮文的論據，作了個折衷的建議，在兩方面都說得過去，他替咸豐帝解決了一層困難，無怪乎要受賞識了。

這是「藩初露頭角的時候，不久咸豐帝下詔「博采讜言」，他更鼓起勇氣，陳述用人

之道說：

竊維用人行政二者，自古相提並論，獨自我朝，則凡諸庶政，皆已著有成憲，既詳且備，未可輕議，今日所當講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人才不乏，欲作育而激揚之，則賴皇上之妙用。有轉移之道，有培養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廢一。臣觀今日京官辦事通病有二：曰退縮，曰瑣屑；外官辦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顛預。習俗相沿，但求苟安無過，不肯振作有爲，將來一遇艱鉅，國家必有乏才之患。今遽求振作之才，又恐躁競者因而倖進，臣愚以爲欲令有用之才，不出範圍之中，莫若使從事於學術，又必皇上以身作則，乃能操轉移風化之本。臣考聖祖登極後，勤於學問，儒臣逐日進講，寒暑不輟；召見廷臣，輒與往復討論，當時人才濟濟，好學者多，康熙末年，博學偉才，大半皆聖祖教諭成就之。皇上春秋鼎盛，正符聖祖講學之年，臣請俟二十七月後，舉逐日進講例，四海傳播，人人向風。召見臣工，從容論難，見無才者，則勸之以學，以痛懲模稜罷輒之習；見有才者，則愈勸之以學，以化其剛愎刻

薄之偏；十年以後，人才必大有起色，此轉移之道也。內閣六部，翰林院爲人才薈萃之地，內而卿相，外而督撫，率出於此，皇上不能一一周知也，培養之權，不得不責成堂官，所謂培養有數端：曰教誨，曰甄別，曰保舉，曰超擢，堂官於司員，一言嘉獎，則感而圖功，片語責懲，則畏而改過，此教誨不可緩也；榛棘不除，則蘭蕙減色，害馬不去，則騏驥短氣，此甄別不可緩也；嘉慶四年、十八年兩次令部院各保司員，此保舉成案也；雍正間，甘汝以主事而買人葭，放知府，嘉慶間，黃鉞以主事而充翰林，入南齋，此超擢成案也。蓋嘗論之，人才譬若禾稼，堂官之教誨，猶種植芸耔也，甄別，猶去稂莠；保舉，猶灌溉也；皇上超擢，譬之甘雨時降，苗淳然興也。堂官時常到署，猶農夫日在田間，乃熟穡事，今各衙門堂官多內廷行走之員，或累月不到署，自掌印主稿外，司員半不識面，譬之嘉禾稂莠，聽其同生同落於畎畝之中，而農夫不問，教誨之法無聞，甄別之例亦廢；近奉明詔保舉，又但及外官，不及京秩，培養之道不尙未有盡者哉？頃歲以來，六部人數日多，或二十年不得補缺，終身不得

主稿，內閣翰林院人數，亦三倍於前，往往十年不得一差，不遷一秩；而堂官多置內廷，本難分身入署，又或兼攝兩部，管理數處，縱有才德俱優者，曾不能邀堂官之顧，又烏能達天子之知，以數千人才，近在眼前，不能加意培養，甚可惜也。臣愚欲請皇上稍爲酌量：每部有二三堂官不入內廷者，令日日到署，與司員相砥礪，翰林掌院，亦須有不直內廷者，與編檢相濡染，務使屬官之性情心術，長官一一周知，皇上不時詢問，某也才，某也直，某也小知，某也大受，不特屬官優劣燦呈，卽長官深淺，亦可互見，旁考參稽，而八衙門之人才，同往來主之胸中。彼屬官者，但令姓名達於九重，不必陞官遷秩，而已感激無地，然後保舉之法，甄別之例，次第舉行舊章，皇上偶有超擢，則梗柵一墜，而草木之精神皆振，此培養之方也。古者詢事考言，二者兼重，近來各衙門辦事，小者循例，大者請旨，本無才猷可見，莫若於言考之，而召對臣言，天威咫尺，不宜喋喋便佞，則莫若於奏摺考之。國家定例，內而九卿科道，外而督撫藩臬，皆有言事之責，各省道員，亦許專摺言事，乃十餘年間，九

卿無一人陳時政得失，司道無一摺言地方利病，科道奏疏，無一言及主德隆替，無一摺彈大臣過失，一時風氣，不解其所以然。本朝以來，匡言主德者，如孫嘉淦以自是規高宗，高銑以寡慾規宣宗，皆優旨嘉納；糾彈大臣者，如李之芳劾魏裔介，彭鵬劾李光地，後四人皆爲名臣，至今傳爲美談；直言不諱，未有盛於我朝者也。皇上御極之初，特詔求言，而褒答倭仁之諭，臣讀之至爲抃舞感泣！然猶有過慮者，誠見皇上求言甚切，諸臣紛紛入奏，或條陳庶政，頗多雷同，或彈劾大臣，懼長攻訐，臣愚願皇上堅持聖意，借奏摺爲考覈人才之具，永不生厭斁之心，涉於雷同者，不必交議而已，過於攻訐者，不必發鈔而已，此外則但見有益，不見有損。今考九卿賢否，憑心見應對；考科道賢否，憑二年京察；考司道賢否，憑督撫考語；若人人建言，參互質證，豈不更爲覈實乎？臣所謂考察之法，其略如此，二者相需爲用，並行不悖。臣本愚陋，頃以講禮一疏，荷蒙皇上天語褒嘉，感激思所以報，但憾識見淺薄，無補萬一，伏求訓示。

國藩開始發表他的政論，完全是站在人本主義的立場。中國的政治哲學，如大學中庸，原建築在這一套理論上面的。所謂「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人存政舉，人亡政息」（哀公問政）；係就人爲政治的主體而言，政治不就是「管理衆人的事」（國父語）嗎？但如何培植瞭解政治原理的人，使他們能够運用實行呢？這可以說是政治上第一要義，所以中國古聖把政與教合爲一體，不能說沒有道理。曾國藩對於此點雖未曾加說明，但要知這是一種建議的奏疏呵！他所謂「轉移之道」，「培養之方」，都不是帶有教育的意味嗎？要政治的領袖以身作則，轉移天下的風化；要負責的長官獎懲兼施，培養天下的人才；而以「考察之法」貫徹之，使人人都有表現的機會，君不失臣，臣不失君，自然就可以糾正當時「退縮」、「瑣屑」、「敷衍」、「顛預」的毛病而一歸於公誠了。他雖不敢顯然的攻擊程彰阿，但對於程彰阿執政時代的吏治之不滿，也可以窺見一二。咸豐帝自己也說：「方今天下，因循墜廢，可謂極矣，吏治日壞，人心日澆」。所以對國藩的奏疏，批說「剴切明辨，切中事情，着百日後舉行日講」。於是國藩又條陳日

講事宜。惟以所畫之圖太陋，九卿無人不笑，國藩引爲四慚之一。這或者是大家看他出風頭有些嫉妒的意思，權貴們也唾罵他，以爲他向用情急；可見政治的場合是很難容許有作爲的人才的。

宣宗殯葬以後，咸豐帝以「保位貪榮，妨賢病國，小忠小信，陰柔以售其奸；僞學僞才，揣摩以逢主意」的罪名，把穆彰阿罷黜了。起用林則徐等，政局爲之一變。國藩雖受穆彰阿的知遇，但政見不同，不能算是穆黨，所以對他毫無影響，他從前還有點情面上的顧忌，這時反覺得更自由了。於是又上第二個有名的汰兵疏，他說道：

天下之大患，蓋有 端：一曰 用不足，一曰 兵伍不精。兵伍之情狀，各省不一，漳泉悍卒，以千百械鬥爲常；黔蜀冗兵，以勾結盜賊爲業；其他吸食鴉片，聚開賭場，各省皆然。大抵無事 游手恣睢，有事則雇無賴之人代充，見賊則望風奔潰，賊去則殺民以邀功，章奏屢陳，諭旨屢飭，不能稍變錮習。至於財用之不足，內外臣工，人人憂慮，自庚子以至甲辰，五年之間，一耗於夷務，再耗於庫案，三耗於河

決，固已不勝其浩繁矣。乙巳以後，秦豫兩年之旱，東南六省之水，計每歲歉收，恆在千萬以外，又發帑數百萬以賑救之，天下財產安得不絀，宣宗成皇帝每與臣下言及開捐一事，未嘗不咨嗟太息，減宦途之濫雜，悔取財之非計也。

國藩認爲財政與軍政很有關係。乾隆四十七年增兵之案，實爲兵餉贏絀一大樞紐。因爲四十七年以前，綠營兵名爲四十六萬，其實有六七萬的缺額，這種缺額就是帶兵官的「空名坐糧」，作爲養廉公費賞卹用的。乾隆帝把這些空名，都全挑補實額，另發養廉公費賞卹銀兩，每年增加了近三百萬兩的開支。所以庫藏就缺少了。嘉慶道光兩次裁減僅一萬六千，無補於事。他引證歷史上的許多憑據，說：「自古開國之初，恆兵少而國強，其後兵愈多則力愈弱，餉愈多則國愈貧」。他主張「缺出不補」，把外省的營伍，選擇十餘鎮，分布天下要害之地，練十幾萬人就可作長城。訓練先從京營起，舉行大閱之典，則「天子之精神一振，山澤之猛士雲興」。總之，他覺得裁兵省銀，專備救荒，寒捐以清仕途，政治和財政都纔有辦法。兵在精不在多，如咸豐光緒金華兵三千，蕩平倭寇，則軍事上也有

把握了。主要的還是精神訓練。這是咸豐元年三月間的事，他的政治理論，就着重在人才、財用、兵力三點上。所以在給胡蓮舫的信裏說：

國藩嘗私慮以爲天下有三大患：一曰人才，二曰財用，三曰兵力。人才之不振，曾于去歲具疏略陳大指，財用、兵力二者，昨又具疏言之。

我們若把曾國藩的意見，用現代話來疏解一下，就等於蔣主席所說的：「教育與經濟軍事三者，同爲國力之要素，同爲建國之急務」，「三者之中，教育尤爲首要」（見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其實行政序）。國藩後來身當大任，都是按照這種政論來實行的。

曾國藩雖然把他的治國經綸貢獻出來了，咸豐帝如何能照辦呢？不過召見他一次，敷衍着說：「你的奏疏，很切中時弊，等廣西亂事平定再辦吧！」這時太平軍已如荼如火的在廣西高舉革命的義旗，清廷命大學士賽尚阿督師，仍是用滿人專征，控制漢族的政策，中外都很驚疑。國藩平素是痛惡諸媚嫻熟的人，大亂暴發，竟無一人指摘缺失，他要挽回風氣，所以盡忠直言，上敬陳聖德預防流弊一疏，略言：

皇上美德約有三端，亦各有其流弊：跬步必謹，推求精到，此敬慎之美德；其流弊爲瑣碎。於小者謹其所不必謹，則於國家之大計，必有疏漏而不暇深求者矣。願情典籍，藝法前賢，此好古之美德；其流弊徒尙文飾。自去歲求言，豈無一二嘉謨，大抵皆以「無庸議」三字了之。是鮮察言之實意，徒飾納諫之虛文。自道光中葉以來，朝士風氣，專尙浮華，小楷則求工，試律則求巧。御製詩文集，若稍遲數年刊刻，亦足昭聖度之謙冲，且明示天下以敦崇實政不尙虛文之意。

這封奏疏裏最重要而且最厲害的話，要算第三端：所謂「娛神淡遠，恭己自怡，此廣大之美德，亦恐厭薄恆俗，而長驕矜之氣，尤不可不防」一段了。我把它仔細錄出來：

近來兩次諭旨，皆曰「黜陟大權，朕自持之」。在皇上之意，以爲中無纖毫之私，則一章一服，皆若奉天以命德，初非自執己見，豈容臣下更參末議；而不知天視自民視，天聽自民聽，國家設立科道，正民視民聽之所寄也。皇上偶舉一人，軍機大臣以爲當，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臣等九卿以爲當，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必科道百僚

以爲當，然後爲國人皆曰賢。黜陟者，天子一人持之，是非者，天子與普天下人共之，宸衷無纖毫之私，可以謂之公，未可謂之明也；必國人皆曰賢，乃合天下之明以爲明矣。古今人情，不甚相遠，大率嚮直者少，緘默者多，皇上再三誘之使言，尙且顧忌，濡忍，敢輕發，苟見皇上一言拒之，誰復肯干犯天威，如禧恩之貪黷，曹履泰之汙鄙，前聞物論紛紛，久之竟寂無彈章，安知非畏雷霆之威，而莫敢先發以取罪哉？自古之重直臣，非特使彼成名而已，蓋將借其藥石以折人主驕侈之萌，培其風骨，養其威稜，以備有事折衝之用，所謂「疾風知勁草」也。若不取此等，則必專取一種諧媚輒熟之人，料其斷不敢出一言以逆耳而拂心，而稍有鋒鋸者，必盡挫其勁節而銷鑠剛氣，一旦有事，則滿廷皆疲沓沓泄，相與袖手，一籌莫展而後已。今日皇上之所以使賽尙阿視師者，豈不知千金之弩，輕於一發哉，蓋亦見在廷他無可恃之人也。夫平日不儲剛正之士，以培其風骨而養其威稜，臨事安所得人才而用之哉？目今軍務警報，運籌於一人，取決於俄頃，皇上獨任其勞，而臣等莫分其憂，使廣西而不

邊平，固中外所同慮也；然使廣西邊平，而皇上意中或遂謂天下無難辦之事，眼前無助我之八，此則一念驕矜之萌，尤微臣區區所大懼也。

第一他指出遺大務小的流弊，對於廣西方面的軍事佈置和用人，都有很具體的批評，可見他非常注意時事，絕不是膚泛的議論。第二他指出虛飾不實的流弊，對於咸豐帝用人拘於時弊，「但觀其舉止便捷，語言圓妙，而不深究其真學真識」，也指摘不遺餘力。第三他指出驕矜的流弊，對於用人之權，說是一點陟自朕持之，不見得就是明，應該顧及國人的輿論，社會的是非。若不重直臣，專取諧媚，稍有鋒鏢者，必盡挫其勁氣，滿廷皆疲沓沓泄，相與袖手，一籌莫展，流弊將靡所底止。這是多麼大膽的諫言啊！在專制時代，帝王權威，大有生殺予奪，但憑喜怒的神氣，國藩能夠割陳君主的過失，要他分黜陟於國人，分憂勞於才智，假如沒有大仁大勇的精神，真不敢道隻字！所以他的家信說：「摺奏雖多，斷無有似此之激直者，恐犯不測之威，業將得失禍福置之度外」了。幸而咸豐帝雖未採納，亦未譴責，僅說：「語涉過激，未能持平；或僅見偏端，拘執太甚，迂腐欠通，

意向可取。至所論人君一念自矜，必至喜諛惡直，頗爲切要。君臣交相敬惕，坐言起行，庶國家可收實效」。何嘗迂腐欠通，都是至理名言！不過國藩冒死犯顏，未受斥責，自然感激咸豐帝的優容，而以「公而忘私，國而忘家」來「盡忠圖報」了。

國藩盱衡天下，不僅要對統治階級灌輸一種政治的學術，使之能夠繼續維持下去，而且要對被統治階級解除他們的痛苦，使社會得以安定。因此他最後上了一個備陳民間疾苦疏，說是：

國貧不足患，惟民心渙散，則爲患甚大。我皇上愛民之誠，足以遠紹前徽，特外間守令，或玩視民瘼，致聖主之德意不能達於民，而民間之疾苦不能訴於上。臣敢一縷陳之：一曰銀價太昂錢糧難納也。石米三千，昔日兩銀換錢一千，得銀三兩，今日換錢二千，僅得一兩五錢，朝廷自守歲取之常，小民暗加一倍之賦。吏役四出，晝夜追比，鞭扑滿堂，血肉狼藉，真有日不聊生之勢。二曰盜賊太衆良民難安也。白日劫淫，捉人勒贖，發兵會捕，而兵役平日皆與盜通，臨時賣放，泯然無迹。或反借盜

名，以恐嚇村愚，要索重賄。否則指爲竊夥，火其居而械繫之。或責成族鄰，縛盜來獻，索收押之費，索縛解之費，不獨事主焦頭爛額，卽最疏之戚，最遠之鄰，大者蕩產，小者株繫，比比然也。三曰冤獄太多民氣難伸也。京控上控之件，大率皆坐原告以虛誣之罪，被告反得脫然無事。民人京控，概交督撫審辦，督撫發委首府，首府爲同寅彌縫，不問事之輕重，一概磨折恫喝，必使原告認誣而後已。一家久訟，十家破產，一人沈冤，百人含痛，累年不結，顛倒黑白，老死囹圄，令人髮指！

這都是當時的實情，人民和官府的關係，只有納糧與訟二事，乃一則逼之破產，一則使之沈冤，而盜賊縱橫滿野，官吏因循諱飾，老百姓還能安居樂業嗎？一旦涎而走險，自然有土崩瓦解的可能了。太平軍北上所以有破竹之勢，不就是這種原因嗎？他的顧慮完全是不錯的。可惜清廷已至快要崩潰的時候，癰疽腐爛，麻痺不仁，這些好的建議，一概都沒有實行。一般士大夫在官場鬼混，反笑他多事，「謗議橫生」。國藩真感覺絕望，不得不作歸隱的打算，借江西主考的差使，悄然南下，走到太湖小油驛，聽說母親去世，星夜奔

喪，更有理由回家了。

第七章 編練湘軍及其特點

咸豐二年八月十三日，曾國藩走到武昌，湖北巡撫常大醇來弔唁，告訴他長沙正被太平軍圍攻，這纔知道大亂蔓延到湖南了。次日起程回湘，又走了十天，從湘陰、寧鄉，繞道抵家。他離家鄉十幾年，祖父母的墳上「已有宿草」了。這時湘鄉正在謠言四起，人心惶惶，都想挈家逃難。國藩就作保守平安歌三首，各處傳播，第一「莫逃走」，歌辭道：

衆人謠言雖滿口，我境切莫亂逃走！我境僻處萬山中，四方大路皆不通，我走天下一大半，惟有此處可避亂，走盡九州并四海，惟有此處最自在。別處紛紛多擾動，此處却是桃源洞。若嫌此地不安靜，別處更難逃性命！只怕你們太膽小，一聞謠言便慌了，一人倉忙四山逃，一家大小泣嗷嗷。男子縱然逃得脫，婦女豈免受煎熬，壯丁縱然逃得脫，老幼難免哭號咷。文契縱然帶着走，錢財不能帶分毫，衣服縱然帶着走，豬牛難帶一根毛。走出門來無室住，躲在山中北風號，夜無被鋪牀板凳，日無鍋

飢切菜刀，受盡辛苦破盡財，其實賊匪並未來，祇爲謠言自驚慌，惹起土匪吵一場，茶陵道州遭土匪，皆因驚慌先走徒，其餘各縣逃走人，多因謠言嚇斷魂。我境大家要保全，切記不可聽謠言，任憑謠言風浪起，我們穩坐釣魚船。一家安穩不吃驚，十家太平不躲兵，一人當事不害怕，百人心中有柄橈。本鄉本土總不離，立定主意不改移，地方公事齊心辦，大家吃碗安樂飯。

第二「要齊心」，第三「操武藝」，是勸人民團練自衛的意思。國藩是很有名的達官學者，湖南的士大夫都承認他的領袖地位，登高一呼，羣山響應，果然許多人都起來擁護他，作出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

曾國藩的事業基礎，是由鄉團編練成爲一種軍隊，叫作「湘軍」，居然把太平天國打平了。但最初召募鄉勇的却不是他。現在我們要插敘幾個有關係的人。第一是江忠源：字岷樵，湖南新寧舉人，大挑二等，在北京時，郭嵩燾介紹他往見國藩。忠源以「任俠自喜，不事繩檢」，國藩和他談些市井瑣屑的事情，酣笑移時，忠源辭出，國藩目送之，回

頭向郭嵩燾說：「京師求如此人才不可得」。既而說：「是人必立功名於天下，然當以節義死」。當時承平日久，聞者都很驚疑。從此二人交誼甚好。有一天，忠源告訴國藩說：「新寧有青蓮教匪，天下將大亂了」。過了二年，忠源又到北京，國藩問他：「你說教匪要肇亂，爲什麼現在沒有動作呢？」忠源就說：「我在家的時候，曾經把親友丁壯都組織起來了，一旦有事，可以防禦」。道光二十七年，青蓮教首領雷再浩果聚衆起事，忠源率領鄉人一戰就把他撲滅了，因功授知縣，揀發浙江。二十九年，忠源方在秀水縣任上，天地會黨人李沅發又在新寧舉事，國藩寫信去勸他棄官保家。但不久李沅發竄往廣西境內活動，成了太平軍起義的前驅者。咸豐帝即位，曾國藩應詔保舉賢才，忠源爲其中之一，疏上說他：「忠義耿耿，愛民如子」。可見忠源是怎樣的一個人物了。忠源在被舉引見後，丁憂回籍。不久，太平軍攻桂林，賽尚阿奉命督師往剿，奏調忠源赴營差委。他募集鄉兵五百人，叫做「楚勇」，在桂林打了一次勝仗。但賽尚阿不能採用他的戰略，他就告病回家了。第二年，太平軍由永安潰圍，又攻桂林，他增募一千人赴援，又打了幾次勝仗。尤

以蓑衣渡一役，把太平天國的南王馮雲山打死了。太平軍圍攻長沙，他從郴州往援，逼營督戰，城得保全，太平軍引而北去。這時他的楚勇已加到二千人，在長沙是很得力的隊伍。他們不僅保衛鄉里，而且出援鄰省，就成爲湘軍的先導了。

第二是羅澤南：字仲嶽，號羅山，與國藩爲同縣人。廩生舉孝廉方正，平時假館四方，賴教書度日，他的道德學問，確實是有數的人物。他研究濂洛關閩之學，標榜宋儒，而其歸宿則以「天地萬物，本吾一體，量不周於六合，澤不被於匹夫，虧辱莫大焉」。他的家境貧寒，歲饑常不能具食，母親哥哥都病死了，夫人又因連哭三子喪明。他「不憂門庭多故，而憂所學不能拔俗而入聖；不恥生事之艱，而恥無術以濟天下」（均見曾國藩雜忠節公神道碑銘）。這不是明道救世的精神嗎？後來湘中書生，起兵拯難，立勳名於天下，大半都是他的學生，而且都是湘鄉人。如：王鏜、李續賓、李續宜、蔣益澧、劉騰鴻、鍾近衡、鍾近濂、易良幹、羅信東、羅振南、羅邦翰、羅信南、楊昌濬等，只此一點，就值得我們贊佩了。何況他老先生又親自領着出馬，大小二百餘戰，克城二十，最後還是戰死

的呢？當咸豐二年太平軍圍攻長沙的時候，曾國藩尚在回湘途中。湘鄉知縣朱孫貽就採納王鑫的建議，請羅澤南等募鄉勇千人，由羅、王及羅信南各統帶一營，駐紮縣北馬坵埔，防護縣城，號爲「湘勇」。國藩對於澤南，在北京時，早就欽慕得很。如致弟書云：「羅羅山兄讀膏明大義，極所欽仰，惜不能會面暢談」（道光二十四年三月二十日）。「陳堯農、羅羅山皆可謂名師，而六弟九弟又不善求益」（二十五年二月十一日）。國華和國荃曾從澤南學習過文章，似乎領會都少。國藩回到家，當然要和他「會面暢談」了。不久，湖南巡撫張亮基調澤南等赴長沙。這一枝鄉勇，就成爲國藩最初的基本幹部了。

第三是王鑫：字璞山，湘勇是由他倡導起來的。曾國藩奉命辦理團練以後，當然他也歸節制了。但他和國藩的意見不合，後來竟自召自練，受駱秉章的指揮，其實是左宗棠左右他。這就是所謂「老湘營」。這件事在湘軍本身上是一種破裂，直至王鑫死後，其軍始歸國藩節制。國藩令他們隨左宗棠以立功，始終是若合若離的。因此在湖南也有很多人不滿意國藩，左宗棠罵得他最兇。但他們爲什麼不能合作呢？最初的經過是這樣的：王鑫帶

湘勇三百人，曾合楚勇勦平衡山一帶土匪，就很自負的說：「若令我勇三千，必將粵匪掃蕩！」巡撫駱秉章聽信他的話，令其招募，與以糧餉火藥。王鑫回湘鄉，出入鳴鑼，擺執事，湘鄉人大不滿意，都向國藩處說他的壞話，國藩也因為他回省城領款，簡直不是護師，而是官勇了。特致齊規勸，王鑫也「痛自懲艾」，照說可以無事。後來國藩規定營制，安排人事，王鑫都未能遵守一律，兩個人纔決裂了。我們看國藩致羅羅山書說：

弟與樸山見解不符，止有數端：樸欲率師即行，專由陸路；弟欲明春始發，水陸並備；一也。樸欲統帶三千，一手經理；弟欲畫開數營，各立營官；二也。弟疑新招之卒，多有可汰；樸慮業經親選，無可再揀；三也。樸欲因援鄂之行，乘勢東下，一氣呵成；弟則以援鄂之暫局，與此後之長征，截分兩事；四也。

又覆駱中丞書說：

王樸山本是侍所器倚之人，今年於各處大曝其賢，蓋亦口疲於贊揚，手倦於書寫，其寄我一函，曾抄示師友至十餘處。近時人有向余譏彈樸山者，亦與之剖雪爭

辯，而樸山不諒我心，頗生猜嫌。侍所與之札飭言撤勇事者概不回答，既無公牘，亦無私書。曾未同涉風波之險。已有不受節制之意，同舟而樹敵國，肝膽而變楚越。將來侍若外出，恐不能不另外招募。

又覆朱石樵書說：

樸山不願從吾營制，弟比與霞仙細商，亦嫌其帳下幫手過少，恐二千餘人者非一二人所難訓御。且此時斷斷不合，將來進止參差，亦難得力，弟決計不帶之東下。方今世亂需才，如樸山者，弟即不能用，自有他人能用之者，勉於求合，乃所以愈離也。

從這三封信裏，可以看出王鏗「不受節制」，是他們破裂的最大原因。王鏗所以不受節制，蓋與招足三千人很有關係。這時他的力量算最大，又得巡撫的信任，餉械不愁，就不把會同藩耑在眼內，國藩只好「棄之如遺」了。王鏗自成營制，自定陣法，自爲訓練，後來也立了不少的戰功，確是「血性過人」「氣鄰盈溢」的一流人物。但老湘營幫助左宗棠平閩越，平甘陝，平新疆，究不失爲湘軍的後勁呵！

江羅王三人，都可謂湘軍的發起人，尤以江忠源倡議最早，立功最速，死事亦最烈。在咸豐三年，隨張亮基赴湖北，勦平土匪，清廷調赴江南大營，幫辦軍務，轉戰江西、安徽，不到九個月，升任安徽巡撫，十二月就在廬州殉難了。曾國藩練湘軍遠征，本爲援助忠源（如與彭筱房會香海書云：「岷樵勳望日隆，全握兵柄，是意中事，鄙意欲練勇萬人，概交岷老統帶，以爲掃蕩澄清之具」）。不料忠源「成名以去」，大任就落在他的肩膀上。

可是再進一步講：如果沒有曾國藩來主持，湘軍也許不會變成有組織有訓練有主義的軍隊。我們先分析一下湘軍的特點：

在素質上 曾國藩立定一個簡單的標準，不要游卒滑弁，只擇「鄉民壯健樸實者，練一人收一人之益，練一日有一日之效」（奏疏語）。如與彭筱房會香海書所云：「無取浮華之輩，而求土作之類」是已。這些人都是鄉間的農民，保存了我國鄉民固有的誠實和勇敢，未曾沾染軍營浮華的習氣，所以比較容易訓練。此其一。

在編制上，鄉勇原是民間自衛的武力，是務正業的農民團結起來，抵抗不務正業的游民土匪，所以沒有什麼編制。及國藩出辦團練，乃頒訂營制，以三百六十人爲營，後添爲五百人。營分四哨，哨分八隊，有劈山礮、擡槍、小槍、刀、矛諸隊。合親兵六隊，共三十八隊，每隊正勇十名或十二名，什（隊）長伙勇各一名。每營長夫一百八十名。數營或數十營設統領一員。水師每營三百八十八人，船長、炮手、篙、柁、槳，各有定制。這比較綠營將帥「莫知營制」，自然好得多了。此其二。

在訓練上，國藩仿戚繼光束伍成法，逐日操練，陣法技擊，無不演習。至少操練兩個月。凡體弱者，藝低者，油滑者，都陸續淘汰。最重要的還是精神訓練。國藩說：「恐民心一去，不可挽回，誓欲練成一旅，秋毫無犯，以挽民心而塞民口，每逢三八操演，集藉勇而教之，反復開說至千百語，但令其無擾百姓。自四月以後，間令塔將傳喚營官，一同操演，亦不過令弁妾前來，聽我教語。每次與諸弁兵講說至一時數刻之久，雖不敢云說法點頭石之頭，亦誠欲以苦口滴杜鵑之血。練者其名，訓者其實，聽者甚逸，講者甚勞。今

各弁固在，具有天良，可覆按而一一詢也。國藩之爲此，蓋欲感動一二，冀其不擾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賊匪之恥，而稍變武弁漫無紀律之態」（與張石卿制軍書）。苦口滴杜鵑之血，這種精神的訓練，慢慢就成爲有主義的軍隊了。此其三。

在精神上 國藩選擇營官是非常慎重的。他說：「帶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四者似過於求備，而苟闕其一，則萬不可以帶勇。帶勇須智深勇沈之士，文經武緯之才」（與彭後勇曾香海書）。又說：「欲練鄉勇萬人，概求吾黨質直曉軍事之君子將之，以忠義之氣爲主，而輔之以訓練之勤，相激相觸，而後可以言戰也」（致江岷樵書）。實在說曉軍事的君子有多少呢？不得已只要是「書生以忠誠相期獎」者就行。因爲書生是孔孟的信徒，國藩的同志，義氣所感，「能爭奮搏」，大有「我不知戰，但知無走，平生久要，臨難不苟」（林君殉難碑記）的精神。就是「忠義血性」的人，也都被這種精神所感化了。此其四。

在糧餉上 只有精神還不够，物質的條件，國藩也是特別顧慮周到的。他起始辦團的

時候就規定口糧：操演日給予一錢；出征本省土匪，每日一錢四分；征外省粵匪，每日一錢五分。隊長哨長以次而加。養傷銀上等三十，中等二十，下等十兩。陣亡卹銀六十兩。征土匪減半。比綠營的餉差不多加了一倍。他知道綠營待遇太薄，又不按時發放，是不能打仗的。後來規定陸勇每月發餉四兩二錢，水勇三兩六錢。又因錢銀少，行對放之法，每兩多給五百文，一個人暗中就有千錢以上的津貼，生活上全然不成問題。其餉最初由捐募而來，後則仰給於湖南北的稅收。此其五。

在團結上 國藩說：「湘勇佳處有二：一則性質尙馴，可以理解情感；一則齊心相顧，不肯輕棄伴侶。其不佳處亦有二：一則鄉思極切，無長征久戰之志；一則體質薄脆，不耐勞苦，動多疾病」。這是就湘（鄉）勇而說的，其他各勇——如邵陽勇、平江勇、道州勇、新化勇亦然。每一營內都是同縣人，合起來又都是湖南人，他們「呼朋引類」有同鄉同里同族的關係，所以能「齊心相顧」。這種團結互助的精神，真有「人懷忠憤，如報私仇，千磨百折，有進無休」（江忠烈公神道碑銘）的氣概，因而「盡復名城」了。此其

六。

以上六點，都是湘軍的特色。在那時的官軍，不但沒有精神，沒有主義，就連組織訓練也沒有，軍紀更不用說了。「東調一百，西撥五十，將與將不和，卒與卒不習，勝則相忌，敗不相救」（與彭筱房會香海書）。他們和太平軍打仗固不行，就連鄉下的土匪也不能對付，只知私門搶掠。如湘軍志說：

兵妒勇益甚，所屯則私門，戰敗固不救，反陷亡。潮勇橫恣罷遣，歸乃益道掠，公奸良民婦衢市，所至毀殺。愚民以爲官兵不如寇，則倡僞議，謀通賊，及結盟拜會相涎起矣。

國藩致張石卿制軍書也說：「近日官兵在鄉，不無騷擾，而去歲潮勇有奸淫擄掠之事，民間僞爲謠言，反謂兵勇不如賊匪之安靜。國藩痛恨斯言」。又與王樸山書說：

蓋近世之兵，屛怯極矣，而偏善妒功忌能，懦於禦賊，而勇於擾民，仁心以媚殺己之逆賊，而狠心以仇勝己之兵勇。其仇勇也，又復勝於仇兵。曩者己酉新軍李沅發

之變，鄉勇一躍登城，將攻破矣，諸兵以鳥槍擊勇墜死，遂不能入。近者兵丁殺害壯勇之案，尤層見疊出，且無論其公相仇殺，即各勇與賊事殷之際，而各兵一不相救，此區區之勇，欲求成功，豈可得耶？不特勇也，即兵與兵相遇，豈聞有此營已敗，而彼營冒險往救者乎？豈聞有此軍餓死，而彼軍肯分一粒往哺者乎？

當時號稱官軍最精銳的江南大營，金和秋聽吟館詩鈔有兵聞云：

何知汝身在，身在心死久！烟床鳩毒甘，博局梟采負，帳下畜村童，路上詭村婦，村民米與衣，結隊惡聲取。縱免將軍誅，可告汝家否？

兵則吸鴉片，嗜賭博，畜變童，詭民婦，縱劫掠；而將則老師糜餉，畏葸不前，在金氏詩中，描寫尙多。最妙的是有一隊赴援東壩的官兵，「九日行自此，將五十里也」。又有因強姦而凡關的兩部軍隊：「從來攻城時，未見今日武！」所以人民有「避官迎賊」之議。清廷也知道官兵不中用，遂獎勵人民自辦團練，「堅守鄉里，以免土匪乘機搶掠」。每省都派幾個在籍的大臣，督辦團防，會國藩不過負湖南一省的责任，爲什麼却只有他成大

功呢？就因爲他在辦理之初，就立定一種主義，如云：

僕於二月間復魁太守書有云：「岳王復生，或可換孱兵之筋骨；孔子復生，難遽變營伍之習氣」，雖語涉諧謔，實痛切言之也。今欲圖謀大局，萬衆一心，自須別開生面，斬新日月，專用新招之勇，求忠義之士將之，不雜入營稍久之兵，不用守備以上之將，國藩之意，蓋與閣下若符契耳（覆江岷樵中丞書）。

今日將欲滅賊，必先諸將一心，萬衆一氣，而後可以言戰，而以今日營伍之習氣，與今日調遣之成法，雖聖者不能使之一心一氣，自非別樹一幟，改絃更張，斷不能辦此賊也。鄙意欲練鄉勇萬人，概求吾黨質直而曉軍事之君子將之，以忠義之氣爲主，而輔之以訓練之勤，相激相勵，以庶幾於所謂諸將一心、萬衆一氣者，或可馳驅中原，漸望澄清（與王樸山書）。

諸將一心，萬衆一氣，曾國藩欲練成這個樣子的軍隊，自非別樹一幟不可，因此他就把心力全注重在湘軍的訓練上，而成爲異軍突起的勁旅了。

在湘軍初成的時候，不過三千人（楚勇二千湘勇一千），曾國藩又添募一千人。江忠源帶二千人援南昌，國藩又派羅澤南等帶一千人援忠源，這一戰澤南的弟子謝邦翰、羅振南、易良幹、羅信東四人戰死。國藩以爲湘勇果可用，雖敗敢深入，因議增募六千人，合成萬數。偏偏王錕又一「不遵節制」，國藩遂另外物色將才，選用參將塔齊布、守備周鳳山等，這兩個都是一「膽勇過人，亦知大義」，「頗曉軍事」的。可是引起提督鮑起豹、副將清德的忌恨，他們嗾使兵變，公然圍國藩的公館，刀矛親入，刺傷隨丁。駱秉章對於曾國藩也不甚滿意，覺得他和別省的團練大臣都不一樣，有點多事。因爲國藩的作法是「純用重典以除強暴，卽良民有安生之日，雖得殘忍嚴酷之名，所不敢辭」。他痛恨官場的「掩飾彌縫，苟且一日之安，積數十年應辦不辦之案而任其延宕，積數十年應殺不殺之人而任其橫行」（見嚴辦土匪以靖地方摺）。所以自立審案局，「匪類解到，重則立決，輕則斃之杖下，又輕則鞭之千百，止此三科，巨案自行彙奏，小者惟吾專之，期於立辦，無所罣礙牽掣於其間」（復歐陽曉岑書）。「強半皆冒侵官越俎之嫌，只以時事孔艱，苟利於國，

或益於民，卽不惜攘臂爲之，冀以補瘡痍於萬一，而扶正氣於將歇」（與張石卿中丞書）。但曾國藩是奉朝廷的命令而行的，駱秉章亦無可如何。「兵譁之變出」，國藩不願「與人相競禦」，卽日移駐衡州，避免衝突，此外還另有一種遠大的用意。

當江忠源初到湖北的時候，和國藩討論江皖大局，他建議造船數百，先清江西。稍後郭嵩燾隨忠源在南昌，看見太平軍都在船上活動，就主張「東南皆水鄉，敵據有江路，而我以陸擊之，勢常不及。必與敵爭長江之險，而後可以言戰」。因爲忠源草奏，請飭粵湖四川造船數十艘，自廣東購砲千尊配之，並交曾國藩管帶部署。清廷答應了。所以國藩要到衡州去銳意起造船砲。他覆江忠源的信說：

添勇六千之說，昨因令弟達川帶勇一千進省，卽令其先將此勇趕緊赴皖，以備閩下爪牙之需。其餘五千須俟船砲辦齊，水陸並進，乃可有濟。省中諸友及璞山之意，皆欲急急成軍以出，國藩思此次由楚省召勇東下，一以爲四省合防之計，一以助關下澄清之用，必須選百練之卒，備精堅之械，舟師則船砲並富，陸路則將卒並憤，作三

年不歸之想，爲百戰艱難之行，豈可兒戲成軍，倉卒一出，人盡烏合，器多罅漏，船不滿二百，砲不滿五百，如大海簸豆，黑子著面，縱能迅達皖省，究竟於事何補！是以鄙人愚見，總須備戰艦二百號，又輔以民船載貨者七八百，大小砲千餘位，水勇四千，陸勇六千，夾江而下，明年成行，與麾下相遇於九江小孤之間，方可略成氣候。否則名爲大興義旅，實等倭人觀場，不直方家一晒耳。明知閣下盼望此勇甚切，然速而無益，不如遲而有備。

這種超越恆流的見解，畢竟大功非國藩莫屬！他不僅要「簡練慎出」，而且要「水陸並進」，除陸軍六千外，又加四千水師，「精選久練」，方可言戰。後來太平軍失敗，即因無精練的水師，只有些小艇，被湘軍握有江上的優勢的緣故。他要以「百練之卒」，幫助忠源作「澄清之用」，這就是國藩的過人處，所以他雖以申韓治匪類，直道對官場，而仍以黃老的仁心謙德對國家、對朋友，仍不出中庸之道呵！

當時有很多人懷疑他：爲什麼老不出去打仗？他說：「今敵往來陽邏湖南北，所費殆

二十萬，彼縱橫江湖，非舟楫無與爭利害，且成師以出，當爲東征不歸之計。九江以上，千里如洗，奈何以倉卒召募之衆，執蠱臈之器，徒步三千里，以當虎狼百萬之強寇乎？」湖廣總督吳文鎔是國藩的座師，雖待援甚急，却很贊同他的見解，致書說：

吾意堅守待君東下，自是正辦。今爲人所逼，以一死報國，無復他望。君所練水陸各軍，必俟稍有把握，然後可以出而應敵，不可以吾故，率爾東下，東南大局，特君一人，務以持重爲意，恐此後無有繼者，吾與君所處固不同也。

糊涂蟲的清廷，却天天催他出兵，並且有點開玩笑的問他：

今觀汝奏，直以數省軍務，一身克當，試問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時漫自矜詡，以爲無出己之右者，及至臨事，果能皆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張皇，豈不貽笑於天下？著設法趕緊赴援，能早一步，卽得一步之力，汝能自擔重任，迥非畏葸者比，言既出諸汝口，必須盡如所言，辦與朕看！

國藩本其所學，對軍事雖無十分把握，却不能不先爲此種佈置，倘倉卒而出，豈不和江忠

源一搏的銳進輕死嗎！於大局何補？當時只吳文鎔一個人能了解他，知道大局必靠他來挽救。他對於清廷似莊似諧的上諭，却極嚴重的回答道：

我必等到船砲造齊才能出兵，出兵的方略是先清湖北江西，力保武昌，然後進勦。目前餉之兵單，誰能擔保有什麼成效？我只有不怕死的實幹就是了。你們問我要把握嗎？那我老實的告訴你：「與其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受畏葸不前之罪！」你們看着辦吧！

清廷有什麼辦法？只好認罪式的安慰他：「成敗利鈍，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質天日，非獨朕知！」請你照計劃從速進行好了。這一幕滑稽劇正在扮演的時候，江忠源戰死廬州，不久吳文鎔也戰死黃州了。清廷只有靠他出擊，他也覺得「事機顛危，不能十全」，只得建旗東下。誰知道不特「三年不歸」，簡直花了十二年的時間；不特「萬人」不夠，簡直動員了「三十萬人，金甲貔貅，死者半之，白骨嵩邱」，纔得成功，可見天下那有那麼容易的事！要不是曾國藩的老謀深算，則清政府只有瓦解一途了。

會國錄

150

第八章 太平天國的平定

那時的中國，又是怎樣的情形呢？我國原是文明古國，在東方向來居於領導的地位。明末清初西洋人東來以後，我們沒有明瞭他們的文化和實際的狀況，還把他們當做「朝貢國」看待。他們也摸不透中國的內容，只好將就着作買賣。但是到了十九世紀的時代，就大不相同了。西洋各國，已經具備了所謂近代文化——民主政治和科學，加以民族主義勃興，都一致向東方來擴張殖民地，尋取銷貨的市場，我們這個落後的國家，竟被英國人的優越武器首先把門戶打開了。鴉片戰爭以後，外國貨品，源源輸入，罌粟流毒，遍於海內，不僅中國開始受帝國主義的壓迫，清廷也失去了統制的能力。因為嘉慶時代的教匪倭寇，已給清朝以致命的打擊，道光時代，更是內外交迫，政治社會的種種弱點，都完全暴露出來，像要到了腐爛不堪的田地。水旱天災，官吏貪黷，人口增多，生產減少，一般農民憔悴呻吟，簡直無法過生活，這不是大革命爆發的絕好機會嗎？

太平天國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高舉民族革命的義旗，於道光末年，發難廣西桂平縣之金田村。領袖洪秀全原是廣東花縣的童生，比曾國藩小兩歲，四次考不中秀才，憤恨致疾，纔胸懷大志，他和馮雲山在廣西從事宗教宣傳，幾年後把潯州府一帶的礦工貧農，都組織起來，叫做拜上帝會。他竊取一點基督教的教義，自稱天父耶和華第二子，耶穌爲天兄，奉天父天兄命誅妖救世，孔佛道三教，都是妖術，崇拜偶像，就是迷信。所以他禁讀孔孟之書，到處破壞廟宇。咸豐元年閏八月初一日，太平軍攻破永安（今蒙山縣），建號太平天國，秀全稱天王，封楊秀清爲東王，馮雲山爲南王，蕭朝貴爲西王，韋昌輝爲北王，石達開爲翼王，其餘侯丞相有差。他們的動，頗像一種宗教革命，其實他們是繼承天地會的思想，實行種族革命的。在他們發布的檄文上說道：

夫天下者，中國之天下，非滿洲之天下也；寶位者，中國之寶位，非滿洲之寶位也；子女玉帛者，中國之子女玉帛，非滿洲之子女玉帛也。慨自明季凌夷，滿洲肆逆，乘釁竊入中國，盜竊神器，而當時官兵人民，未能共憤義勇，驅逐出境，掃清羶

穢，反致低首下心，爲其臣僕，迄一二百餘年，濁亂中國，鉗制兵民，刑禁法維，無所不至。而一切英雄豪傑，莫不爲之制而甘爲之用，是則令人惡之痛心，恨之刺骨者矣。……故滿虜之世仇，在所必報，其憤義怒，殲此醜夷，恢復舊疆，不留餘孽，是則天理之公，好惡之正。何反含毒忍恥，爲之奴隸，違背天朝，不思歸附？嗟嗟，可恨也已！

又一檄文上說道：

慨自滿洲肆毒，混亂中國，而中國以六合之大，九州之衆，一任其胡行，而恬不爲怪，中國尙得爲有人乎？妖胡虐燄燔蒼穹，淫毒穢宸極，腥風播於四海，妖氛慘於五胡，中國之人反低首下心，甘爲婢僕，甚矣中國之無人也。夫中國，首也，胡虜，足也；中國，神州也，胡虜，妖人也；奈何足反加首，妖人反盜神州，驅我中國悉變妖魔？……今幸天道好還，中國有復興之理；人心思治，胡虜有必滅之數，三七之妖運告終，九五之真人已出，胡罪貫盈，皇天震怒，命我天王肅將天威，創建義旗，掃

除妖孽，廓清中夏，……上爲上帝報瞞天之讎，下爲中國解倒懸之苦，務期肅清胡氛，同享太平之樂！

就這兩次宣傳品中，都可以看出他們是要以民族主義來做排滿運動的，不過利用基督教作爲團結人心的工具而已。可是後來積習難返，弄假成真，洪秀全真的迷信起上帝來了，這是他們失敗的最大原因，也是曾國藩出師勸亂的唯一口實。

咸豐二年二月，太平軍從永安潰圍，犯桂林，不克，遂進攻湖南。七月間，蕭朝貴率領前鋒部隊，圍攻長沙，不幸中礮而死，洪秀全的大隊人馬繼續進攻，還是沒有攻破。十月，乃亟趨而北，破岳州，得吳三桂舊藏的砲位，並奪得民船五千餘，聲勢增大，直逼武昌，清巡撫常大醇死難了。這時他已有五十萬羣衆，數萬艘船隻，取得武昌漢陽，不曾設守，就一直向長江下游進兵，沿途破九江安慶蕪湖。咸豐二年二月，打進南京，就定都於此，號曰天京。以前的行蹤隱忽無常，類似流寇，到南京纔開始做一些建國工作。

洪秀全除種族革命以外，又想實行社會革命，頒布天朝田畝制度，沒收土地，平均分

配。他所謂「有田同耕，有飯同吃，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的原則，很像現代的社會主義。但他佔據的地方不多，又正在軍事時期，似乎並沒有實行，只是在軍隊和政府的人員，實行了配給制，不許蓄有私財。這種思想，雖然是一般貧農的要求，可以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但住二千多年私有制度的習慣下，能不引起人民的懷疑嗎？這又是曾國藩反對他的一種理由。

講起民族主義來，自從滿清入關，南明三王和閩海義帥失敗以後，漢人雖暫受鉗制，但「反清復明」的口號，仍埋藏在下級社會中間，天地會就是最顯著的一個民族革命集團。康熙時張念一、朱一貴，乾隆時林爽文，嘉慶時胡秉燿、鍾體剛等都借此來發難的，結果因為組織不很健全，都未能成事。道光末年洪大全以天地會首領的資格，假稱天德皇帝，在廣東舉義，被廣西總督葉名琛的濫殺政策鎮壓下去。洪秀全原和天地會黨人有聯絡，他的部下也吸收了不少的天地會分子，洪大全在廣東失敗，就退到廣西，和他聯合起來，二人在永安還「並稱萬歲」哩？潰圍時，他們把大全陷入清軍，讓饒尚阿擒獲解北京

殺害了。洪秀全從此不再譚天地會的事，真有些數典忘祖。這是什麼緣故呢？就因他怕天地會要反清復明，自己當不成皇帝。上帝曾本是他要脫離天地會的一種煙幕，說他的思想進步也好，說他的思想陳腐也好。可是他的民族主義不免就有些灰色了。要不然的話，曾國藩是漢人，他有什麼理由，反對太平天國，效忠滿清？那不成一個甘為異族臣僕的漢奸了嗎？呂晚村說：「此曹豈云不讀書，真是未明大義耳」。胡秉耀說：「能解春秋有幾人，漫將劉備作黃巾！」曾國藩又何以自解呢？清末的革命黨人，全都對他有微辭，甚至章炳麟說：「曾國藩者，譽之則為聖相，讞之則為元凶」（檢論），皆本民族觀念的立場而言的。但是洪秀全既以宗教迷信埋沒了種族主義，曾國藩為擁護民族文化而反對他，不僅在道理上可以說得過去，而且也是合乎一般民衆的心理的。據傳說：洪秀全圍攻長沙時，左宗棠曾去見過他，勸他放棄基督教，仍標幟孔教，以春秋攘夷之義來宣傳。洪秀全沒有聽從。可見士大夫對於漢族的恥辱，並非不知道，誰願意作民族的罪人呢？只是洪秀全學識太差，又不懂得社會心理，裝模作樣，滿嘴神話，弄得老百姓都看不慣，士大夫還

能寄以同情嗎？我們對於這一點要相當的原諒曾國藩，何況兵的結果，在實際上已不啻把滿清政權轉移在漢人手中，爲後來民族革命莫大的助力呢？咸豐四年，即公元一八五四年，曾國藩四十四歲，這是他的大事業正式發動的一年。正月二十八日，他由衡州起程，把軍隊集中到湘潭，檢閱一過：共有陸軍五千餘人，編爲十三營（五百人爲大營，不滿五百人者爲小營），以塔齊布、周鳳山、儲坎躬、林源恩、鄒世琦、楊名聲、曾國葆統之，派塔齊布作先鋒；水師五千人，編爲十營，以成名標、諸殿元、楊載福（後改岳斌）、彭玉麟、鄒漢章、龍獻琛、褚汝航、夏鑾、胡嘉垣、胡作霖統之，派褚汝航作總統。拖罟、快蟹、長龍、三板諸戰艦二百四十一號，都仿照廣東的船式起造的。又改造釣鉤船一百二十號，輜重船百餘號。配礮五六百門，帶米一萬二千石，煤一萬八千石，鹽四萬斤，油三萬斤，加上工匠長夫水手丁役，全軍一萬七千人。人數雖不算多，軍容却非常整齊。他又設立文案、內銀錢、外銀錢、軍械、火器、偵探、發審、採編八所。等於現在的祕書、軍需、軍械、兵工、軍法及調查統計處。浩浩蕩蕩，夾湘而下，首先發佈討粵匪檄，以表示

他對於洪楊的態度，其文曰：

爲傳檄事，逆賊洪秀全、楊秀清稱亂以來，於今五年矣。荼毒生靈數百餘萬，蹂躪州縣五千餘里，所過之境，船隻無論大小，人民無論貧富，一概搶掠罄盡，寸草不留。其擄賊中者，剝取衣服，搜括銀錢，銀滿五兩而不獻賊者，卽行斬首，男子日給米一合，驅之臨陣向前，驅之築城浚濠，婦人日給米一合，驅之登陴守夜，驅之運米挑煤，婦女而不肯解脚者，則立斬其足，以示衆婦；船戶而陰謀逃歸者，則倒抬其屍，以示衆船。粵匪自處於安富尊榮，而視我兩湖三江被脅之人，曾犬豕牛馬之不如！此其殘忍酷，凡有血氣者，未有聞之而不痛憾者也。自唐虞三代以來，歷世聖人，扶持名教，敦敍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自其僞君僞相，下逮兵卒賤役，皆以兄弟稱之，謂惟天可稱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農不罷自耕以納賦，而謂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賈以取息，而謂貨皆天王之貨；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

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爲之所也！自古生有功德，沒則爲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雖亂臣賊子，窮凶極醜，亦往往敬畏神祇：李自成至曲阜，不犯聖廟；張獻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粵匪焚郴州之學宮，毀宣聖之木主，十營兩廡，狼藉滿地，嗣是所過郡縣，先燬廟宇，卽忠臣義士，如關帝岳王之凜凜，亦皆汚其宮室，殘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壇，無廟不焚，無像不滅，斯又鬼神所共憤怒，欲一雪此憾於冥冥之中者也。本部堂奉天子之命，統師二萬，水陸並進，誓將臥薪嘗膽，殄此凶逆，救我被擄之船隻，拔出被脅之民人，不特紓君父宵旰之勤勞，而且慰孔孟人倫之隱痛，不特爲百萬生靈報枉殺之仇，而且爲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是用傳檄遠近，咸使聞知。倘有血性男子，號召義旅，助我征勦者，本部堂引爲心腹，酌給口糧；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橫行中原，赫然奮怒，以衛吾道者，本部堂禮之幕府，待以賓師；倘有仗義

仁人，捐銀助餉者，千金以內，給予實收部照，千金以上，專摺奏請優敘；倘有久陷賊中，自拔來歸，殺其頭目，以城來降者，本部堂收之帳下，奏授官爵；倘有被曾經年，髮長數寸，臨陣棄械，徒手歸誠者，一概免死，資遣回籍。在昔漢唐元明之末，羣盜如毛，皆由主昏政亂，莫能削平，今天子憂勤惕厲，敬天恤民，田不加賦，戶不抽丁，以列聖深厚之仁，討暴虐無賴之賊，無論遲速，終歸滅亡，不待智者而明矣。若爾被脅之人，甘心從逆，抗拒天誅，大兵一壓，玉石俱焚，亦不能更爲分別也。本部堂德薄能鮮，獨仗忠信二字，爲行軍之本，上有日月，下有鬼神，明有浩浩長江之水，幽有前此殉難各忠臣烈士之魂，實鑒吾心，咸聽吾言，檄到如律令，無忽！

他的檄文關於種族君臣之義，絕不提及，只暴露洪秀全的罪狀，是：（一）視我兩湖三江被脅之人，曾犬豕牛馬之不若！（二）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三）毀宣聖之木主，污闕岳之宮室，無廟不焚，無像不滅，斯又鬼神所共憤怒。（四）農不能自耕以納賦，商不能自賈以取息，人民無論貧富，

一概搶掠罄盡，寸草不留。他自己的意思是：「慰孔孟人倫之隱痛，爲百萬生靈報枉殺之仇，爲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日月幽明，實鑒吾心！」這是多麼動人的辭句呵！湘軍的分子，不外士子和農民，他們都是崇拜孔孟關岳的，無怪乎「人懷忠憤，如報私仇，千磨百折，有進無休」了。洪秀全雖不是純粹的宗教革命，而曾國藩却是爲宗教而戰爭，好像歐洲的十字軍。

這時太平軍分兩路向滿清進攻：（一）林鳳祥、李開芳的北伐軍，由安徽河南山西轉戰到直隸的天津，和清軍相持。（二）胡以晃、秦日綱的西征軍，由南京上溯，先克安慶，繼圍南昌。楊秀清、石貞祥又力趨上游，進攻武漢，結果石忠源戰死廬州，吳文鎔殉難黃州，太平軍彌漫兩湖。清廷所派的大軍都集中在南京揚州，由向榮、張國樑率領者號爲「江南大營」；由琦善、陳金綬率領者爲「江北大營」；其實是頓兵堅城，毫無作用。眼看着清廷的天下，已有岌岌可危之勢，只得靠曾國藩來挽救了。國藩的戰略是：「能保武昌，則能扼金陵之上游，能固荆襄之門戶，能通兩廣四川之餉道；若武昌不保，則恐成割據之

勢」（瀝凍現辦情形摺）。所以他要先援武昌。不料他方到長沙，太平軍就席捲而來了，儲玖躬先戰死於寧鄉，王鑫、曾國葆、鄒壽璋、楊名聲又敗潰於岳州。國藩首攻靖港，軍復大潰，一出馬就打敗仗，這是十分丟臉的事，因而憤恨自投於水，被左右救起來。幸虧塔齊布的陸軍，彭玉麟、楊載福的水師，在「湘潭大捷」，替湘軍振作很大的士氣。國藩「益知兵貴精不貴多」，乃加意淘汰，增募新勇，調羅澤南、李孟羣、陳輝龍回來帶兵，又把胡林翼所帶的黔兵，收歸部下。塔齊布以功升湖南提督，提標兵全歸管轄，勢力更增強了。遂克復岳州，保固湖南，進圖湖北。以八月克武昌，清廷命他作巡撫，他以母喪未除堅辭。然湘軍在出師不到一年的工夫，就把湖南北平定了，太平軍的北伐同時也失敗了。清廷真是喜出望外，就把「討賊」的責任交給他。他也很以此自負，銳意遠征，去攻打九江湖口。這一下子可又失算了。他沒有把湖北的基礎打穩固，就輕率前進，而這時太平軍的主將石達開又是個了不起的人物，兩次襲擊，把他的水師截為兩段，他的船也毀了，不得已跑到羅澤南的陸營，又要自殺，澤南極力勸阻，遂自往南昌南康整理水陸軍。太平

軍又沿江上溯，三克武昌（咸豐五年二月），塔齊布也因九江不下，患氣脫而死，一軍皆短氣（七月）。國藩坐困江西，四面被圍，不能不打開一條出路，乃派羅澤南回援武昌，會合湖北巡撫胡林翼的隊伍去反攻。澤南想着趕快攻下來，再往救國藩，日夜督戰，竟爲礮傷而死（六年二月），一連損失兩位大將，這是國藩最困難的時候。他弟弟國荃這纔從家中出來，募軍往援，先攻吉安，統領各部約二萬人，後來就成爲一枝勁旅。幸而胡林翼接任巡撫以後，竭力經營，不久把武漢克復（十一月），和總督官文合作施治，替國藩佈置一個堅固的後方。李續賓統率澤南舊部，和楊載福的水師，鮑超的陸軍，都到了九江，國藩親至勞軍，湘軍纔大有起色。這固然是他們的戰略關係，實則也因太平軍內亂，楊秀清、韋昌輝被殺，石達開脫離天王的控制。原起五王，死逃一空，政治上起了大變化，軍事上自然要受影響了。

曾國藩經過這次挫折，他的戰略，更加慎重。他原是主張打仗要爭取主動地位的。如云：「僕於用兵，深以主客二字爲重，撲營則以營盤爲主，撲者爲客。野戰則以先到戰地

者爲主，後到戰地者爲客；臨陳則以先吶喊放槍者爲客，後吶喊放槍者爲主」。最忌「久頓城下」，「將卒矜慢」；所以「行軍以來，每介疑勝疑敗之際，戰兢恐懼，上下忱惕」，「不宜有歡欣之象」，「常存有餘不盡之氣」。就像老子所說的「哀兵」。他常以「紮硬寨，打死仗」勸勉部下，不尙詭謀奇計，力求穩慎。國荃也有「穩紮穩打，機動則發」之言。他猶以爲不易作到。所以特寫一副對聯說：

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穩當，次求變化；

辦事無聲無臭，既要精到，又要簡捷。

但他這種謹慎的態度是不爲時人所諒解的。譬如王闓運作湘軍志，對國藩時有微辭，主要的原因，就是認爲他太慎重了。湘綺樓日記戊寅四月十二日云：

夜看曾書札，於危苦時不廢學，亦可取；而大要爲謹守所誤，使萬民塗炭，猶自以心無愧，則儒者之罪也。似張浚矣。

其實國藩的態度是對的。因爲他所處的環境，雖是督師，實居客寄的地位，籌兵籌餉，一

無實權，州縣官都不聽他的話，各省督撫又常常的窘諱他。只有胡林翼是誠心幫他的忙，湘軍將士也擁戴他，可是他們的官級，有的比他還高，他好像一個道義上的統帥，當然是經不起敗仗的。他的苦衷，一般人那能明瞭？我們看他寫給弟弟們的信說：

兵勇搶劫糧臺，此近年最壞風氣，兄奏明將萬瑞書即行正法。聞駱中丞不欲殺之。近日意見不合，辦事之難如此（咸豐五年三月廿六日）。

陳竹伯中丞辦理軍務，不愜人心，與余諸事亦多齟齬，凡共事和衷最不易易，澄弟尙在外辦公事否？宜以余爲戒！杜門不出，謝却一切。余食祿已久，不詭不以國家之憂爲憂，諸弟則盡可理亂不聞也（同年六月十六日）。

帶軍之事，千難萬難，澄弟溫弟嗣後總以不帶勇爲妙。吾閱歷二年，知此中構怨之事，造孽之端，不一而足。恨不得與諸弟當面一一縷述之也（同年七月初八日）。這樣艱苦的境遇，使得他在咸豐七年二月聽到父親死去的噩耗，立刻就率國華國荃奔喪，籍，大有急流勇退的意思。濟廷雖不允他終制，勉以「抒忠卽爲全孝」；但他立志守禮

也不得不將就他。因此他竟在家住了一年零四個月。使他有空餘時間，把自己的經驗與學識互相印證，對於他的晚年治事是很有裨益的。國荃因為事實需要，早又出來帶兵了。

咸豐八年，太平軍又攻浙江，清廷感覺江南大營的力量不夠分援，強起曾國藩辦理浙江軍務。國藩趕到江西（八年十月），不久，李續賓、曾國華戰死三河（八年十月），清廷又讓他援皖。他主張先把江西肅清再說。及國荃把景鎮攻下（九年六月），他纔到黃州會合胡林翼及多隆阿（蒙古人）、鮑超（四川人）、李續宜（續賓弟）的軍隊，四路進攻安徽。咸豐十年，江南大營完全失敗，兩江總督逃走治罪，太平軍後起的名將忠王李秀成攻蘇州、杭州，英王陳玉成也縱橫皖南北。清廷始任命曾國藩作兩江總督，加兵部尚書銜，從此他纔有固定的地盤，不再作客軍了。咸豐帝原想調胡林翼去的，協辦大學士肅順說：「不如讓曾國藩幹吧！那麼，上下游都得人了」。這一着對國藩的事業成功，却很有關係。胡林翼建議分軍出淮揚，攻杭州，鼓行而前，佈置遠勢。國藩仍是非常持重的，必無後顧而後動。因令國荃圍攻安慶，自己督師祁門，李秀成從無州回師，把祁門圍困起來，欲解安

慶之圍。這時皖南北十室九空，自南京至徽州八百餘里，無處沒有敵人，無一日不打仗。徽州失陷以後，他的部下都勸他移營別處。他說：「我初次進兵，遇險即退，後事還能說嗎？我離此一步，無死所也」。他艱苦支持了幾個月，手書遺囑，帳懸佩刀，從容佈置，不改常度。太平軍環攻多日，幾乎攻破，他抱一死報國的決心，竟又把難關渡過了。國荃勸他「不要株守偏隅，宜出大江規全局」。等到安慶克復（十年八月），他纔把大本營移到安慶，而以江西湖北爲後路。不料胡林翼積勞病死，又失掉一隻勝臂。可是清廷把東南一切軍政的責任，都交給他，事權總算專一了。

洪秀全對於軍事本沒有好的計劃，這時在宮中養病處，更不理朝事，李秀成、陳玉成東西奔馳，處處受湘軍的打擊，也不能有什麼方略。然而曾國藩成竹在胸，步步爲營，命國荃由安慶向南京。又薦左宗棠巡撫浙江，沈葆楨巡撫江西，李續宜巡撫安徽，李鴻章巡撫江蘇，用四面合圍的辦法，漸逼漸緊。同治元年，國荃帶陸軍會合彭玉麟、湯載福的水師進攻南京。適逢江南瀉疫大行，軍士染疾而死的很多，「朝笑夕僵」「炊爨寥寥」。

天王召李秀成乘機破圍師，曾國荃孤軍奮鬥，戰守四十六日，傷亡五千人，曾國葆亦以病後過勞致死。太平軍將領驕佚，軍無鬥志，國荃殊死戰，打了大勝仗，秀成始解圍去。陳玉成在皖北爲多隆阿所逼，向練匪苗沛霖乞援，被苗誘執，解勝保營殺之。秀成守蘇州，形勢愈孤，天王困處南京，也一籌莫展了。

同治二年，李鴻章的淮軍和戈登（英國人）的常勝軍從上海逐漸開展，圍攻蘇州，太平軍殺守將投降，進克常州。李秀成先數日回南京，勸天王突圍赴江西，秀全不從。同治三年，左宗棠也把杭州克復，浙江除湖州外，都平定了。鮑超原在皖南，因病不能成軍，及病愈，由寧國進至丹陽，南京如處甕中。國荃圍攻益力，掘地轟城。四月，秀全眼看大勢已去，乃吞金自殺。六月，南京攻破了，秀成被擒獲，只幼主洪福逸去。太平軍十餘萬人，聚衆自焚，無一降者。曾國藩到南京，紅旗報捷，大功告成，朝野動色相慶。清廷封國藩一等侯爵，封國荃一等伯爵。李鴻章、左宗棠均封一等伯爵。這時國藩五十四歲，宗棠五十三歲，國荃、鴻章均四十一歲。洪福逃到湖州，爲左宗棠、李鴻章合軍攻破，又逃

江西，爲沈葆楨的軍隊搜獲，殺於南昌。太平天國建國十五年，完全消滅，他們雖管民族革命開出一朵燦爛的奇花，爲社會主義產生一點茁嫩的萌芽，但被湘軍這一陣暴風雨摧殘了。

然而曾國藩的特長，還不盡在乎這一點，他能於功成名就之際，善保他的人格，全始全終，最爲難能可貴，這纔是真正的學識。我們看他的家信說：

聲聞之美，可恃而不恃。兄昔在京中頗著清望。近在軍營亦獲虛譽，善始者不必善終，行百里者半九十，譽望一損，遠近滋疑。弟目下名譽正隆，務宜力持不懈，有始有卒。

處大位大權而兼享大名，自古能有幾人能善其末路者？總須設法將權位二字，推讓少許，減去幾成，則晚節漸可以收場耳。

來信「亂世功名之際尤爲難處」十字，實獲我心。本日余有一片，亦請將欽篆督篆二者分出一席，另簡大員。吾兄弟常存此兢兢業業之心，將來還有樹綠，即便抽身

引退，庶幾善始善終，免蹈大戾乎？

金陵之克，千古之大名，全憑天意主張，豈盡關乎人力！天於大名吝之惜之，千磨百折，艱難拂亂而後予之，老氏所謂不敢爲天下先者，卽不敢居第一等大名之意。弟前歲初進金陵，余屢信多危悚儆戒之辭，亦深知大名之不可強求。今少荃二年以來，屢建奇功，肅清全蘇，吾兄弟名望雖減，尙不致身敗名裂，便是家門之福。老師雖久，而朝廷無貶辭，大局無他變，卽爲吾兄弟之幸。只可畏天知命，不可怨大尤人，所以養身卻病在此，所以持盈保泰亦在此。千囑萬囑，無煎迫而深疾也。

世局日變，物論日淆，吾兄弟高爵顯官，爲天下第一指目之家，總須於奏疏中加意檢點，不求獲福，但求免禍。

宦途險巇，在官一日，卽一日在風波之中，能妥貼登岸者，實不易易！

爲什麼會國藩這樣的「兢兢慄慄」？他曉得宦途「有夷必有險，有興必有衰」，「富貴常蹈危機」，要「盈保泰」，是極不容易的，社會的風氣太壞了，一般人妒嫉能，在上

者亦所不免。苟有一絲一毫的不謹，就可像年羹堯召殺身之禍（年奏摺把朝乾夕惕書作夕惕朝乾因而獲罪）；何況有功者又易流於驕溢呢？當金陵攻下的時候，國藩兄弟，功名蓋天下，而謗亦隨之，因幼主逃亡，他根據報告業已焚死，就和左宗棠、沈葆楨打了不少的筆墨官司，甚至於絕交！歷年以來，中外紛傳，洪秀全佔據南京十餘年，金銀如海，則實全無所得。又倉卒把李秀成殺了。於是羣言囂囂，都說曾國荃有毛病。國荃憤恨致疾，告假回家，把所部湘軍二萬五千人，全都遣散。因此李鴻章的淮軍纔得出風頭。國藩所謂「好事未必見九弟之功，壞事必專指九弟之過」者也。但他抱定郭子儀「招之未嘗不來，麾之未嘗不去」的態度，「置禍福毀譽於度外，坦然做去」，「見可而留，知難而退，但不得罪東家，好去好來，即無不可耳」。所以他勸國荃：「弟何必鬱鬱！從古有大勳勞者，不過本身一爵耳，吾弟於國事家事，可謂有志必成，有謀必就，何鬱鬱之有？」並爲沅甫弟四十一初度詩說：

九載艱難下百城，漫天箕口復縱橫，今朝一酌黃花酒，始與阿連慶更生。

河山策命冠時髦，魯衛同封異數叨，刮骨筋癢天鑒否？可憐叔子獨賢勞！

左列鐘銘右謗書，人間隨處有乘除，低頭一拜屠羊說，萬事浮雲過太虛！

亦絕胸襟，這種態度，殊非一般英雄豪傑所能作到，假如不是深切體會中庸易經的道理，這種不知「人間隨處有乘除」也。

第九章 改造舊社會與建設新事業

會國藩拚命把滿清的命運挽救了，中國的舊文化也算保持着了，這就是他的經世事業嗎？其實不然。他壯年立志：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要做一個天地之完人，可見他的宗旨是治世，是救人，所以他說：

治世之道，專以致賢養民爲本，其風氣之正與否，則絲毫皆推本於一己之身與心，一舉一動，一語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風氣，故爲人上者，專重修身，以下效之者，速而且廣也（辛酉十一月日記）。

他所標榜的：「拚命報國，側身修行」八字，也注重以身化人，可見他是以軍事政治作爲轉移風氣的過程。何嘗要爲一姓一家效愚忠呢？何以謂之轉移風氣？就是改造社會的意思。他常引顧亭林日知錄上的話：「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來勸勉屬員。何以謂之保天下？就是不要使「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

人將相食」。換句話說：就是不要使人慾橫流，獸性高張，道德淪喪，禮法蕩然，社會沒有法子來維繫，這纔是人世間最危險的事情，好像是「人吃人」了。所以他把功名富貴滿不當一回事。常常教訓兒子說：「予不願大官，但願爲讀書明理之君子，富貴功名，皆有命定；學爲聖賢，全由自己作主」。他認爲事業的成功是不可捉摸的，屬之天命；學問道德是可以因勉而得的，要靠自己。以學問來治世，以道德來化人，改造社會的風氣，使人們皆循正道而行，國運自然就好了。作官也應該以此爲目的的，所以他說：

爲督撫之道，卽與師道無異，其訓飭屬員般般之意，卽與人爲善之意，孔子所謂誨人不倦也。其廣諮忠益，以身作則，卽取人爲善之意，孔子所謂爲之不厭也。爲將帥者之於偏裨，此皆以君道而兼師道，故曰：「作之君，作之師」；又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皆此義爾（壬戌三月日記）。

這不就是經世學的道理嗎？所謂作君作師，卽精神領袖和事業領袖合一，以事業表現精神，以精神貫注事業。不僅注意在一方面，必須兼有雙層資格的。他一生側重此義，所以

能把「汗馬助名，問牛相業」都看作糝糠塵垢」了。

他說治世的道理，不外「致賢」「養民」和「正風氣」三端：風氣如何能正呢？必須先培養人才，使之各得其用，讓他們發生一種領導作用，這就是所謂致賢了。同時把人民的生活改善，使之安居樂業，「倉廩實而後知禮義，衣食足而後知榮辱」，這就是所謂養民了。總之：是教養兼施，讓治者與被治者，或士大夫階級與農工商階級，都發展他們的技能，配合一致，殊途同歸。然後風氣可轉，社會自然就欣欣向榮了。所以他對於人才是極端重視的，我們看他的原才說：

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賢且智者，則衆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衆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義，則衆人與之赴義；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則衆人與之赴利；衆人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
力，莫之敢逆，故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風俗之於人之心，始乎微而終乎不可禦者
也。先王之治天下，使賢者皆當路在勢，其風民也皆以義，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

衰，所謂一二人者不盡在位，彼其心之所嚮，勢不能不騰爲口說，播爲聲氣，而衆人者，勢不能不聽命而蒸爲習尙，於是徒黨蔚起，而一時之人才出焉。有以仁義倡者，其徒黨亦死仁義而不顧；有以功利倡者，其徒黨亦死功利而不返；水流溼，火就燥，無感不讎，所從來久矣。今之君子之在勢者，輒曰天下無才，彼自尸於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嚮，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而翻謝曰無才，謂之不誣可乎？否也！十室之邑，有好義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中之尤者而材之；然則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非特處高明之拙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與有責焉者也。有國家者，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慎擇與共天位之人；士大夫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惴惴乎謹其心之所嚮，恐一不當而壞風俗而賊人才。循是爲之，數十年之後，萬有一收其效者乎？非所逆睹已！

這一篇文章，可以說是國藩的治世意見書，他把人分爲三等：一、戢戢之民，二、賢且智者，三、尤智者。這就等於國父所說的「先知先覺」、「後知後覺」、「不知不覺」。

「衆人君之而受命」的「有國家者」，就是所謂政治領袖；「不盡在位」的「士大夫」，「一二人」，就是所謂社會領袖。最開明的時代，是「賢者皆當路在勢」，政教合一。假如能「知事變之多，而吾所辦之者少，則不敢以功名自矜，而當思舉賢而共圖之」，就要「慎擇與其天位之人」了。「一二士大夫謹其心之所嚮，也可以轉移習俗，其效果雖有大小不同，「非所逆睹」，但總是「匹夫之賤，與有責焉」。所以他認爲人才的培養，風俗的轉移，是治世爲政的第一着，對清廷的建議如此，他自己的作法也是如此。

在辦團練的時候，他時時譟府縣，託朋友，「招致賢俊」，「山野材智之士，感其誠，雖或不往見，皆以會公可與言事。而闕藩途鄉里士來謁，輒溫語禮下之，有所陳，務畢其說，言可用，則斟酌施行；即不可行，亦不加詰責。有異等者雖卑幼與之抗禮，故人人爭磨濯，求自效，一時中興人才，皆出其門」（湘軍志）。後來羅致一般人才在幕府中，軍事、政治、道學、名士無所不有，每日同食論道，加以長期的考察和訓練，用當其才，不循所私。即所謂「得人不外四事：曰廣收、慎用、勤教、嚴繩」。譬如李鴻章是他

的門生，在幕府數年，國藩盡力折磨、陶鑄，然後以「才大心細，勁氣內斂」薦之爲江蘇巡撫。左宗棠是他的朋友，原在駱秉章幕中，爲湘軍籌餉，幫了很大的忙，但與國藩意見不合，常常罵他。他先薦宗棠「幫辦軍務」，後又薦其「取勢甚遠，審機甚微」，「才可獨當一面」，因而做浙江巡撫。又薦在籍道員沈葆楨任江西巡撫。這三個人，在資格上可以說都不够，——李沈是進士授知縣，洊升道員，左則僅係舉人。但用人惟才，國藩是要以此幹旋氣運的。其餘如彭玉麟、楊載福則拔之於微末之時，塔齊布、鮑超則拔之於軍旅之中，讓功與江忠源、胡林翼，推誠待羅澤南、李續賓，巨眼卓識，徒黨蔚起，所以纔能有同治中興的盛業。

可是他這種汲汲求才的態度，還常欲然若有所不足，如致胡林翼書云：

莊子云：「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逃」，閣下以一省爲籠，又網羅鄰封賢俊，尙有之才之嘆。鄙人僅以燈盤爲籠，則雀且遠引高翔矣。

他們真是慨嘆乏才嗎？不是。國藩說過：「彼自尸於高明之地，不克陶鑄一世之人，而翻

謝曰無才，謂之不誣可乎？」胡林翼也說：「才者無求於天下，天下當自求之」；「世有伯樂，而後有千里馬；顧吾才智，不足有為，賢者終不我應耳」（見碑傳集胡文忠公傳）。這都是他們的謙德，和辛稼軒的詩：「人才常與世相疏，若謂無才原厚誣，方朔長身無飯吃，人間飽死幾侏儒！」是一樣的想法。他們都兢兢業業，恐怕自己不能陶鑄一世之才，並不是說天下無才。胡林翼常比「國之求才，如魚之求水，人之求氣，無則即亡」（見致劉冰如書）。曾國藩說：「善觀國者，觀賢者在位，則卜其將興；見冗員浮雜，則知其將替；善觀宙者亦然」（見嘉言鈔）。可見他們是如何的重視「賢者在位」了。假如不能使「賢者在位」，自然就有「乏才之嘆」了；這是「彼自尸高明之地」的大人先生們所應時刻猛省的！

曾胡如此重視人才、汲引人才、培植人才，王闓運還向左宗棠說：「闓運行天下，見王公大人衆矣，皆無能求賢者，滌丈（指曾）收人材不求人材，節下（指左）用人材不求人材，其餘皆不足論此。以胡文忠之明果向道，尙不足知人材，何從收之用之？故今世真

能求賢者，闖運是也，而又在下賤，不與世事，性懶求進，力不能推薦豪傑，以此知天下必不治也」。闖運自負有「縱橫霸才」，嘗謁國藩，不得一申其志，故多怨謗之辭。我們能說曾國藩不知人才、不用人才、不求人才嗎？

至於人才和風俗的關係，在他作直隸總督的時候，曾寫「勸學篇示直隸士子」一文，說道：「人才隨士風爲轉移，信乎？曰是不盡然，然大較莫能外也。……豪俠之質，可與入聖人之道者，……烏可以不致力乎哉？……爲學之術有四：曰義理，曰考據，曰詞章，曰經濟。……其文經史百家，其業學問思辨，其事始於修身，終於濟世，百川異派，同達於海而已矣。若夫風氣無常，隨人事而變遷，有一二人好學，則數輩皆思力追前哲；有一二人好仁，則數輩皆思康濟斯民；倡者啓其緒，和者衍其波，倡者可傳諸同志，和者又可嬗諸無窮，倡者如有本之泉，放乎川瀆，和者如支河濫漚，交匯旁流。先覺後覺，互相勸誘，……不過數年，必有體用兼備之才，彬彬而四出，泉湧而雲興」。這還是一種原則的說法，至於具體的辦法呢？在他頒佈「直隸清訟事宜」十條中，最後一條論獎借人才變易

風俗說：

正氣不伸，則風俗仍難挽回，風俗之美惡，主持在縣官，轉移則在紳士。欲厚風俗，不得不培養人才，古者鄉大夫賓興賢能，考其六德六行六藝而登進之，後世風教日頹，所謂六德者不可得而見矣；至於六行，曰孝友睦婣任卹，孝友則宗族敬服，睦婣則親黨敬服，今世未嘗無此等人也。任則出力以救急，卹則出財以濟窮，今世亦未嘗無此等人也。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今世取士，用文字詩賦經策，其事雖異，其名曰藝則一也。今之牧令，即古鄉大夫之職，本有興賢舉能之責。本部堂分立三科，以求賢士：凡孝友爲宗族所信，睦婣爲親黨所信者，是爲有德之科；凡出力以擔當難事，出財以襄成善舉者，是爲有才之科；凡工於文字詩賦，長於經解策論者，是爲有學之科。仰各州縣採訪保舉，一縣之中，多者五六人，少者一二人，其全無所舉，及舉而不實者，該牧令皆予記過。教官如確有所見，亦可隨時稟報。舉有德者，本部堂或寄匾額，以旌其宅；或延致來省，賜之酒食，餽之儀物。舉有才者，本部堂或飭屬

派充團長，酌給薪水；或調省一見，札令幫辦捕務。舉有學者，本部堂或薦諸學使，疊加獎掖；或召之來省肄業，優給膏火。每州每縣皆有數人，爲大吏所知，則正氣可以漸伸，奸宄因而斂迹，端本善俗，尤在於此。用一方之賢士，化一方之莠民，芳草成林，荆棘不除而自悴；鸞鳳在境，鴟梟不逐而自逃。諸良吏無以爲迂而忽之！

獎善卽所以除惡，興教卽所以化俗，國藩始終認爲政治的改革，必須先有精神的改革，要改造社會，必須先改造教育，他的精神教育，是他一生事業的基礎，作官治軍，用人行政，無一不本此原則而行。他對於當時「變亂是非」，「不黑不白不痛不癢」的社會，是非常痛恨的！他罵「軟熟和同」的鄉愿，是「人間桔槔故態」，先用「矯枉過正」，「慷慨激烈」的豪俠精神來打倒它。後來知道牢不可破的積習太深了，惡勢力的阻礙太大了，只是直道而行還不夠，遂又想從精神教育做起。他的精神教育內容是什麼呢？仔細的分析起來，不外「公」「誠」二字。我們看他的湘鄉昭忠祠記說：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誠爲天下倡。世之亂也，上下縱於亡等之欲，姦僞相吞，

變詐相角，自圖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難避害，曾不肯捐絲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誠者起而矯之，克己而愛人，去偽而崇拙，躬履艱難而不責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遠遊之還鄉而無所顧悸，由是衆人效其所爲，亦皆以苟活爲羞，以避爭爲恥。嗚呼！吾鄉數君子，所以鼓舞羣倫，歷九州而勘大亂，非拙且誠者之效歟？

所謂「克己而愛人，去偽而崇拙」的忠誠之道，很顯然的就是公誠了。所謂「姦偽相吞，變詐相角」的亂世，也就是「率獸食人，人將相食」的「人吃人」世界了，他嘗論君子小人的分野說：

陳宏有言：「仁義豈有常？蹈之則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大哉言乎！仁者，物我無間之謂也，一有自私之心，則小人矣；義者，無所謂而爲之謂也，一有自利之心，則小人矣。同一日也，朝而公正，則爲君子，夕而私利，則爲小人；同一事也，初念公正，則爲君子，轉念私利，則爲小人。……所謂小人者，識見小耳，度量小耳，井底之蛙，所窺幾何，而自以爲絕倫之學；遼東之豕，所異幾何，而自以爲蓋世

之動。推之以子子爲義，以經經爲信，以齷齪爲廉，此皆識淺而易以自足者也。君臣之知，須積誠以相感，而動疑主恩之過薄；朋友之交，貴積漸以相孚，而動怨知己之罕觀；其或兄弟不相容，夫婦不相信，父子不相亮，此皆量褊而易以滋疑者也。君子則不然，廣其識，則天下之大，棄若敝屣，堯舜之業，視若浮雲；宏其度，則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烏有所謂自私自利者哉？不此之求，而詡詡然鬻於衆曰，「吾君子也」，當其自詡君子深信不疑之時，識者已嗤其爲小人矣。

可見仁義的君子，是有公誠之心；不仁不義的小人，只有私利之心。公誠則識廣度宏，不公誠則識淺量褊，倘使把這種意義擴充到政治社會上，自然就成了「大道之行，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的大同世界了。

爲什麼要特別提出一個「誠」來？這在「中庸」「經世」的道理上，有它的哲學根據。因爲誠是一切事業的原動力。中庸說：「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誠

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曾國藩的解釋是：

蓋嘗抉剔平生之病源，養癰藏瘤，百孔雜出，而其要在不誠而已矣。竊以爲天地之所以不息，國之所以立，賢人德業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誠爲之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今之學者言考據則稱爲騁辨之柄，講經濟則據爲獵名之津，言之者不怍，信之者瞶耳，轉相欺謾，不以爲恥！至如仕途積習，益尙虛文，奸弊所在，蹈之而不怪，知之而不言，彼此塗飾，聊以自保，泄泄成風，阿同駭異。故每私發狂議，謂今日而言治術，則莫如綜核名實，今日而言學術，則莫如取篤實踐履之士。物窮則變，救浮華者莫如質，積斲之後，振之以猛，意在斯乎（覆賀耦庚中丞書）。

這把當時政治學術的病源，說得非常透闢，而其要就在於不誠。不誠則天道人道均無可言，所謂「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就是一切事業都沒有本體和原動力，那還成什麼東西呢？因爲天道誠則有渾噩之體，人道誠則有渾噩之性，鴻濛開鑿，知識啓滯，可以睹日月之明，可以具仁義之心。倘使把本體障蔽了，原動力湮沒了，一切的進程也都完了。孟子

教人「不失赤子之心」，就是保存誠之體；孔子教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就是發揮誠之用。我們再說質直一點，一個人要沒有誠，根本上就「不得謂之人」；那裏還能談什麼政治學術呢？機權作用，最易壞人心術，必須特別慎重。國藩一生，不尚機權，惟務質實，就是這種道理。中庸說：「惟天下至誠爲能盡性」，「至誠無息，悠久無疆」。就是說先有一個赤裸裸的本體，纔能顯出人類的「感情」「理智」「覺悟」之性能，而前進無已；雖然這種性能不盡合乎道，也可用教育的力量，「改變氣質」，猶之乎日月之蝕和明鏡塵埃一樣。倘使以詐偽汨沒了本性，好像陰霾蔽天，總不得明；裝假睡熟，永喚不醒；教育也沒有辦法了。所以從來講學術政治的先知先覺，沒有不以「誠」爲基本要素的。國父所說的「八德」，最後貫之以「誠」；蔣主席所說的「政治的道理」，也以誠爲「修身治人的根本」；皆可與國藩的精神教育互相發明的。

曾國藩是不是只重精神而不重物質呢？那又不盡然了。他所說的「治世之道專以致賢養民爲本」，養民不就要靠物質嗎？中庸成己成物未曾偏重，他又何嘗不關心民瘼，獎勵

生產呢？他治家注意耕讀二字，治世注意教養二字，皆有深意。我們看他寫給 荃的信：
吾所過之處，千里蕭條，民不聊生，當亂世，處大位，而爲軍民之司命者，殆人生之不幸耳。弟信云：「英氣爲之一阻」，若兄則不特氣阻而已，直覺無處不痛心，無日不懼禍也。

可見他如何的重視民生了。爲軍民之司命者，如不能使人民安居樂業，還講什麼經世之學！在勸誡州縣的回條中，最要緊的一條，是重農事以厚生。他說道：

軍興以來，士與工商，生計或未盡絕，惟農夫則無一人不苦，無一處不苦。農夫受苦太久，則必荒田不耕，軍無糧則必亂民，民無糧則必從賊，賊無糧則必變流氓，而大亂無了日矣。故今日之州縣，以重農爲第一要務！

中國是農業社會，重農厚生，則養民之道盡矣。在南京攻克以後，他極力的救災恤患，減租召墾，使人民恢復其固有的生產力。整飭鹽務，疏通商運，甚至把秦淮河的畫舫都讓它繁榮起來。當時都「得此老「風流」不礙，猶增韻事，或說是點綴昇平的意思。其實他是

照顧人生，要使「無一夫不獲其所」呵！

曾國藩這樣努力於舊文化的維持，舊社會的改造，他就能挽回當時國家民族的厄運了嗎？那更不盡然了。他救了滿清是毫無疑問的，但是滿清並不能救中國。倘若他客觀的、誠實的研究滿清在嘉慶、道光、咸豐三朝的施政，他應該知道滿清是不可救藥的。他未嘗全不知道此中實情，爲什麼他還要救滿清呢？平心而論，他要救清朝是很自然的，可原諒的。第一，中國的舊禮教既是他的立場，而且士大夫階段是他的憑依，他不能不忠君。第二，他想清廷經過大患難之後，必有相當覺悟。在事實上，同治初年的北京，因爲有恭親王奕訢及文祥二人主政，對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疆吏，也信任不疑，似乎景象一新，頗有些中興的樣子。第三，他怕滿清的滅亡，要引起長期的內亂。他是深知中國歷史的，我國幾千年來，每換一次朝代，總要經過長期的割據和內戰，然後天下纔得一統太平。在閉關自守無外人干涉的時代，內亂雖給人民無窮的痛苦，尙不至於亡國。到了十九世紀，有帝國主義者環繞着，長期內戰就能引起亡國之禍。曾國藩所以要維持滿清，最大

的理由在此。可見他在平定太平天國以後，深深的感覺着：社會的改造，既非一朝一夕之功，清廷的施政，總是那樣的敷衍現狀，一點都不澈底，而帝國主義者，又像「海鯨波山」一般的洶洶而來，他自己沒有真實的領導權，所以他的態度反趨於消極了。其家信說：

余近年在外，問心無愧，死生禍福，不甚介意。推接到英法美各國通商條款，大局已壞，令人灰心！時事日非，吾家子姪輩總以謙勤二字為主，戒傲戒惰，保家之道也。

相傳胡林翼在安慶的時候，看見洋船上駛，疾如飄風，馬上就變色不語，中途嘔血，因而不起。他知平定太平軍是不成問題的，只有「洋務」，簡直沒有好辦法，所謂「膏肓之疾，醫治為難」。這和曾國藩都有同樣的感想。但國藩的主張是「大局糜爛至此，能盡一分力，必須拚命效此一分，成敗利鈍，付之不問」的，所以他在維持滿清作為政治中心的大前驅之下，仍舊努力不懈，雖然他確乎有些「灰心」了。

他的救國方案，是分作兩方面進行：一方面要守舊，那就是說：恢復民族固有的美

德，以「公」「誠」的精神教育來改造舊社會；另一方面要革新，那就是說：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分，以「砲」「船」的科學機械來建設新事業。革新守舊同時進行。這是經世學的必然道理，也是曾國藩對我國近代史的大貢獻。徒然恢復我國的舊禮教，而不接受西洋文化，我們還不能打破民族的大難關，因為我們不能以「忠信爲甲冑，禮義爲干櫓」，來抵抗帝國主義者的機械軍器和機械製造。何況舊禮教本身就有它的不健全的地方，不應完全恢復，也不能完全恢復呢！同時徒然接受西洋文化而不恢復我國固有的美德，我們也不能救國家救民族，因為腐化的舊官僚舊社會根本不能舉辦事業，無論這個事業是新的或是舊的。何況舍棄了自己民族的立場，根本上又是不可能的事呢？我們佩服曾文正公，就因為他有這種遠大的眼光，一直到現在，我們要救國家救民族還離不開這種原則。國父的民族主義就可以完全證明了。

曾國藩的守舊事業，我們前面已經說過；他的革新事業，也是從英法聯軍之役外國人的砲船所給予他的刺激而來的。當時奕訢、文祥主持朝政，倡爲自強運動，「自強以練兵

爲要，練兵又以製造爲先」。但實際上讓那一個去作呢？就全靠着會國藩了。國藩在咸豐十一年七月覆陳購買外洋船礮摺中說：

購買外洋船礮，爲今日救時之第一要務。凡恃己之所有，誇人以所無者，世之常情也；忽於所習見，震於所罕見者，亦世之常情也。輪船之速，洋礮之遠，在英法則誇其所獨有，在中華則震於所罕見，若能陸續購買，據爲己物，在中華則見慣而不驚，在英法亦漸失其所恃。……購成之後，訪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習，繼而製造，不過一二年，火輪船必爲中外官民通行之物。

可見他不僅要購買，而且要製造。同治元二年，他在安慶設的軍械所，試造輪船，即「隱隱有爭雄海上之志」。他派中國第一個留學生容闈（字純甫廣東人著有西學東漸記）出洋購買機器，漸有擴充之意。李鴻章到上海以後，天天和外國人接觸，曾致書國藩：「深以中國軍器遠遜外洋爲恥」。就極力「資取西洋人長技」。同治四年他們在上海設立江南機器製造局，附設譯書局，這是中國維新運動的第一件大專業，以後西洋文化的輸入，都以此

爲張本。同治十一年，他又和李鴻章聯銜會奏派遣學生出洋，以容閱爲副委員，每年選送三十人。可惜他已屆垂暮之年，一切的事業都不能不讓李鴻章代辦了。

總之，曾國藩是以安內攘外爲政策的。要安內就必須先改造社會，徐圖自強。其弟子張裕釗作曾劄剛侍郎五十壽序一文，說：「咸豐之初，海內俶擾，太傅文正公蘊偉抱，起湖湘，周幹一代之全局，更新乾坤。而是時海疆事變，亦乘間並作，上下憂危，羣議紛紜。文正公以爲不量彼己而輕挑強敵，是以其國爲注也。不修備而媮久無事，是自削也。是以戢銳養威，外整務爲懷柔，而內自憤發，以徐圖自強之術，日夜與在事數鉅公，通變吏俗，興起諸務（見濂亭遺文卷二）。這把國藩安內攘外的主張，敘述至詳。劄剛就是國藩的兒子紀澤，後來出使外國，是世界有名的外交家，其主張維新，猶承家教。在國藩死後，李鴻章以辦洋務而著名，實則他對於洋務的知識，還不如紀澤和郭嵩燾澈底。郭嵩燾又是國藩最要好的朋友，且係親家。這兩人以後皆不甚得意，鬱鬱而終，固因舊社會的阻力太大，亦可見李鴻章不能汲引人才，沒有他老師那樣的學問見識，而國事也就不堪問了。

第十章 湘淮軍代興的關係

李鴻章繼續會國藩的事業，淮軍代替湘軍而興起，在近代史上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對中國的全局，很有關係，我們不能不特別提出來說：淮軍和外人接觸最早，改用新式武器，比「暮氣已深」的湘軍戰鬥力強，這一點是淮軍的特長。但湘軍如不散，依舊可以仿效的。李鴻章「師事國藩近三十年」，平生治軍持事，榮悴顯晦，不易常度，都得力於國藩的陶冶；而習術機警，識時善變，勇於任事不畏艱險，血氣比較高強。不像會國藩兢兢業業，守知足知止之戒，懷急流勇退之心，常帶有消極的性質。左宗棠時常罵國藩偽道學，這是國藩所最痛心的。我們看國藩一生公誠任事，毫無虛偽的表現，其所以受宗棠的批評，就是因為他的修養較深，謹慎太過，勇氣似乎稍差了。他臨死的前三天還說：「通籍三十餘年，官至極品，而學業一無所成，德行一無可許，老大徒傷，不勝悚惶慚報！」這是國藩「學爲聖賢」的謙沖之德，在國藩是很自然的，但一般人看起來，以他的

學問事業，還能說「老大徒傷」嗎？左宗棠幼年題家塾聯語：「身無半畝，心憂天下；讀破萬卷，神交古人」。晚年以諸葛亮自比，並說：「今亮或勝於古亮」。他自己解釋道：「作語自夸，不免漸報，然志趣固不妨高也。安得以德薄能鮮，謂子弟不可學老夫少年之狂哉？」這和曾國藩的性情態度，迥然不同，所以後來二人交惡。但亦「內相傾服」，絕未以私害公。曾謂左「西陲之任，天下第一」，「橫覽七十二州，更無才出其右者」。左輓曾「知人之明，謀國之忠，我愧不如元輔；攻金以礪，錯玉以石，相期無負平生」。李鴻章的「志大才高」，有類於左：「勁氣內斂」，受教於曾；但他的道德學問都不如國藩，因而生出許多的流弊。

湘軍是代替綠營而興的，綠營雖極端腐敗，不能打仗，但它也有一種好處，「官皆選補，兵皆土著」，遣將調發，權操兵部，是國家的統一的軍隊。湘軍原係私人召募的軍隊，「將卒親睦，各盡其長，其將死，其軍散；其將存，其軍完」（湘軍志）。所以指揮訓練都很靈活，「能用人之死力」。但兵士祇知道直接的上級長官，不知道有最高統帥，更

不知道有國家，軍隊就變成私人的勢力了。湘軍原來有三派：一是江忠源的楚軍，忠源初募鄉勇五百人，率赴廣西，獨能搏戰。後扼截蓑衣渡，助守長沙，轉戰江西安徽，均有殊勳。授安徽巡撫，殉難廬州。其弟忠濟、忠信、忠義等統之，楚軍遂弱。然「一門忠烈」，爲湘軍開風氣之先。二是羅澤南（羅山）的湘軍，澤南以諸生講學，宗法程朱，倡率生徒，辦理團練，轉戰湖南北江西，克城二十，大小二百餘戰，佐曾國藩、胡林翼立功。湘軍將領，大半是他的弟子。而李續賓、李續宜、王鑫、蔣益澧、劉騰鴻等尤爲傑出。及澤南戰死武昌，續賓戰死三河，安慶既克，軍始不振，然始終是湘軍的中堅。三是王鑫的楚軍，鑫與文正同縣，澤南弟子，其營制不用國藩成法，自成一隊，左宗棠常左右之。死，王開化、張運蘭分統其衆，所謂老湘營是也。宗棠援浙，卽用其力。自募五千人，亦參用王鑫遺制，號楚軍。後劉松山接統，從文正勦捻，又隨宗棠西征，開至三十餘營，立功邊陲，爲湘軍之後勁。這三派都和曾國藩有統屬的關係，但不盡惟國藩之馬首是瞻。他們之間，只以道義相維繫，可去可留，雖有獨樹一幟的志願，而無割據自雄的企圖。卽如國

藩的弟弟國荃所帶的湘軍，有時也不盡聽國藩的號令。但金陵攻克後，國藩要解散就解散了。到了李鴻章的淮軍就大不同了。曾國藩曾向李鴻章說：

淮勇各軍既歸敵處統轄，則閣下當一切付之不管。凡向尊處私有請求者，批令概由敵處核奪，則號令一切驅使較靈。以後鄙人於淮軍除遣撤營頭，必先商左右外，其餘或進或止，或分或合，或保或參，或添募，或休息假歸，皆敵處徑自主持。如有不妥，請閣下密函見告，自問衰年氣弱，但恐失之過寬，斷無失之過嚴，常存爲父爲師之心腸，或責之，或激之，無非望子弟成一令名，作一好人耳。昔麻衣道者論易云：「學者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無於周孔腳根下盤旋」。前此湘軍如羅羅山、王樸山、李希菴、楊厚菴輩，皆思自立門戶，不肯寄人籬下，不願在鄙人及胡駱等腳下盤旋。淮軍如劉潘等氣莽不盛，而無自闢乾坤之志，多在台從腳下盤旋。豈閣下善於制馭，不令人有出藍勝藍者耶？

淮軍本是湘軍的支派，用湘軍的營制，國藩並派湘軍郭松林等三營改歸編制，以資觀摩。

何以後來國藩尙不能指揮如意，而不得不請鴻章兄弟出來幫忙？他說：「區區微忱，非強賢昆仲以所難，實見捻匪非淮勇不能滅，淮勇非君家不能督率」。可見李鴻章開始就把淮勇造成他的勢力，與湘軍「自立門戶」國藩「擴然大公」的精神，已迥然不同，所以湘軍雖是私有軍隊的起源，而淮軍纔構成私有軍隊的形態。後來袁世凱以淮軍子弟，傳其衣鉢，就變成清末民初時代的北洋軍閥，割據國家，阻礙統一，貽禍不淺。

但這事於湘淮軍的將領之出身很有關係。湘軍將領幾全係儒生，雖有少數行伍出身的大將，如塔齊布、多隆阿、鮑超、劉松山等，但在曾胡左的駕馭之中，不能「自立門戶」。能「自立門戶」的羅、王、李、楊，大半都是理學家，只楊岳斌（載福）一人是行伍，而專領水師，與彭玉麟共事，彭是一個純粹的學者，節行均高，岳斌受他的薰染，早非武人氣概了。他們帶勇都守國藩之法：「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禮，待弁勇如待子弟，持之以敬，臨之以莊，泰而不驕，威而不猛」。所以湘軍是含有儒教色彩的軍隊，他們以維護名教爲主義，衛鄉衛國，必忠必信。將領都沒有功名富貴的念頭，曾國藩把高爵厚賞，「都

看作糝糠塵垢」，固不用說；彭玉麟始終不肯做官，辭安徽巡撫，兵部侍郎，漕運總督，兩江總督，乃至兵部尚書，有人劾他「抗旨鳴高，開功臣驕蹇之漸」。他說：

臣素無室家之樂，安逸之志，治軍十餘年，未嘗營一瓦之覆，一畝之殖。受傷積勞，未嘗請一日之假，終年風濤矢石之中，未嘗移居岸上，求一日之安。誠以親服未終，出從戎旅，既難免不孝之罪，豈復爲身家之圖。臣嘗聞士大夫出處進退，關繫風俗之盛衰，臣之從戎，志滅賊也，賊已滅而不歸，近於貪位；長江既設提鎮，責有攸司，臣猶在軍，近於戀權；改易初心，貪戀權位，則前此辭官，疑於作僞；三年之制，賢愚所同，軍事已終，仍不補行終制，涉於忘親；四者有一焉，皆足傷風收俗。夫天下之亂，不徒在盜賊之未平，而在士大夫之進無禮，退無讓，伏惟皇上中興大業，正宜扶樹名教，整肅綱紀，以振起人心。臣豈敢稍犯不韙，以傷朝廷之雅化！

彭玉麟真不愧爲湘軍表率人物，國藩忠實的同志。羅李王雖以節烈早死，而勵志清苦與玉麟同，都只有事業心而無功名心。淮軍的將領，只一個潘鼎新是舉人，其餘程學啓是降

將，劉銘傳是鹽梟，周盛波、周盛傳、張樹珊是團練，吳長慶是守備，開始就以「鼎」「銘」「慶」「樹」「盛」「開」「程」「松」諸字名軍，私人的色彩，非常濃厚。李鴻章以翰苑薦至大帥，這些人都是投效而來，所以容易節制。湘軍將領各自招募成營，國藩僅以在籍侍郎憑道義相號召，常居客寄地位，頗似一種道義上的領袖，而非軍制上的統帥。故湘軍各有「自闢乾坤之志」，而淮軍只有在鴻章「脚根下盤旋」了。那是鴻章「善於制馭，出藍勝藍」的緣故呢！況且淮軍將領，都出身微賤，根本談不上學術，豈能有羅李王彭的氣概？以他們來替湘軍支撐大局，無怪乎袁世凱以一文武都不成材的人而可以傳淮軍之緒，這不能不說是國家的不幸。

我們再看湘淮軍的餉制，更大有不同：湘軍初賴湖南接濟，及胡林翼巡撫湖北，理財籌餉，不遺餘力，大致全靠著釐金。釐金者，自咸豐三年雷以誠治軍揚州，用錢江議試行於仙女鎮，值百抽一，行商曰活釐，即通過稅與貿易稅。那時清廷正苦錢糧減少，庫藏竭蹶，捐輸緩不及急，軍興數載，兵餉無着。咸豐四年，始逐漸推行於各省。湘軍全靠這筆

收入來維持。因爲清廷指定「悉數解充軍餉，不准地方擅自挪移」，所以軍權與財權合一。而帶兵將帥，又往往因事實方便，兼理民政，打破了軍民財二權分立的局面，爲後來地方政權擴大之張本。按嚴清明的制度，總督治軍，巡撫理民，布政使管財，三方互相牽制，誰也沒有擁兵自重與朝廷對抗的資格。不料太平天國內亂以後，湘淮軍開私有軍隊的先例，而釐金又有「與虎添翼」的結果，以致清末疆吏在亂時可以獨立自保，這纔造成軍閥割據的形勢。不過一件事在開始時「機括甚微」，曾國藩已有外重內輕之慮。胡林翼更公忠體國，志在平亂，他收入用庫平，而發餉用湘平，每百兩有三兩六錢的贏餘，積少成多，另儲備撥，是以行兌放之法，每兩多給錢五白文，藉以津貼，不虞匱乏。又除月計食用外，餘則分哨記注，存於公所。或因事裁革，或有放假歸，核其所存，配付川資，別由糧臺給一印票，至後路給清。這有三種利益：一、營哨官不能私侵暗蝕；二、兵勇不能任意開銷，出營流落；三、回籍餘資，尙可營生。原來湘軍初出征時，只有陸軍十三營，水師十營，不過一萬多人，加以員弁丁夫共一萬七千人，國藩最初的計劃很周密，精神紀

律均好。後來擴充到幾十萬人（曾國荃初統吉軍即有二萬八千人），自然人數多，分子就複雜，軍紀也退化了。國藩自承「暮氣已深」，又恐遭時謗，遂毅然遣散很多。大概林翼死後，湘軍的餉制也不像從前那樣充裕和嚴密了。所以失業流落的人，都加入會黨。淮軍勇無宿儲，官多揮霍，歲支九關（次數之謂），餘目爲欠餉。裁撤時，酌發三五關不等，或歷年過久，通計成數報效，爲本籍增文武學額，士卒却也能相安。因爲他們餉項匱乏，每按仗克城，「人人有獲」，「金釧銀寶，堆案數尺」，所以遇發餉，多寡不較。各軍克城，封存太平軍的囤米，據爲私有。而李鴻章反出示收買，幾成爲例案。所以淮軍將領，往往以此致富。這樣的紀律，這樣的貪私，要和彭玉麟捐養廉給軍餉、散公費佐義舉的作風一比較，簡直判若天淵了。其實李鴻章本人就不廉潔，所以淮軍的風氣很壞。況且他又有些貪戀權位，不能進退淡如，而曾國藩的精神教育，可謂掃地無餘。前清末年的官吏，出自曾文正門下者，皆比較正派；出自李文忠門下者，則比較不醇。可見社會風俗的盛衰，直繫於「居高吹之地」的士大夫「一二人之心之所嚮」了。

此外還有知人善任一事：曾國藩不循私情，不計恩怨。確能拔擢真才，不愧一時領袖。李鴻章却不然，我們看他諫阻國藩奏劾李元度之事（元度與國藩曾同患難，李即以是爲言，而曾未聽，因此就離開國藩的幕府有一年），就可知道二人的作風不同，後來李居常路凡四十年，自視太高，與其故吏裨將，昔共患難，今共功名，徇其私情，轉相汲引，布滿津要，委以巨任，不問其才之可用與否，所以他沒有培植什麼人材出來。這是他貽誤事機的最大原因。而且他的同鄉觀念很重，光緒元年，他到北京入覲，候鄉試因科發榜，安徽竟無一人，他就快快口出怨言。曾國藩雖亦利用鄉土觀念，但只是爲打仗團結，絕非植黨聲援，他命李鴻章留淮軍以平捻，把自己的湘軍撤了，又重用塔齊布（滿人），多隆阿（蒙古人）、鮑超（四川人）、李孟羣（河南人）、褚汝航（廣東人）及保薦沈葆楨（福建人）等，都可以見出他的襟懷。李鴻章重視部屬鄉里，纔造成袁世凱、段祺瑞的北洋系，爲中國軍隊添封建割據之觀念，爲近代社會長貪污循私之風氣。倘以湘軍人物當之，必不至於如此。這一種有關國運的轉變，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這樣說來，曾國藩不是託付不得其人嗎？但這却不能歸咎於曾國藩，只可歸咎於社會環境了。怎麼講呢？因為曾國藩保薦李鴻章並沒有錯，李鴻章畢竟也是近代史上了不起的人物，他支持了清末四十年的大局，雖因為環境的壓迫，未能大行其志；但他所遺留的勢力，終取滿清而代之，完成了初步的民族革命。他的運氣似乎比曾國藩好，這是國藩始料所不及的。當南京攻克的時候，曾國荃為衆人所指目，國藩不得不避嫌遠謗，毅然遣散湘軍，要不然的話，功高震主，他和國荃都未必能善終。左宗棠帶老湘軍西征，立功邊徼，維持中原大局，就只有靠淮軍了。他對於淮軍的弱點也未嘗不知道，如前引致李鴻章的信，即可見其微意。又曾說道：

淮勇不足恃，余亦久聞此言，然物論悠悠，何足深信？所貴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省三琴軒均屬有志之士，未可厚非，申夫好作識微之論，而實不能平心細察。余所見將才傑出者極少，但有志氣，即可予以美名，可獎成之（嘉言鈔引）。

他是本精神教育的方法，獎掖淮軍將領，知其美惡，成全他們。但他們的來路究竟不同，

和曾國藩又隔着一層關係，感化的效力不甚大，所以他們沒有湘軍那種樸拙的風氣和高邁的理想。而社會環境又太壞了，時人不能諒解他的苦心，故晚年頗多不如意之事。譬如他以公誠體國，即王闓運也說：「滌公在江西，實悲苦，令人泣下，不能不敬歎。」聞春風之怒號，則寸心欲碎；見賊船之上駛，則透屋旁皇！」出師表無此沉痛」。可是沈葆楨和他爭餉，左宗棠罵他虛偽，李鴻章也說他濡緩：這三個人皆國藩所薦拔，又皆爲賢者，尙不能完全體會他的意思，其餘就可想而知了。所以他說：「革薄從忠，夙懷此志，特有天質本來之薄，有外物激之使薄，本來之薄，革之已極不易；激之使薄，尤覺旋革旋萌」。可見厲末俗是不很容易的。他最初要綜核名實，振之以猛，而到處惹閒氣，碰釘子。他雖在同治六年補授大學士，號爲宰輔，但實際並未入閣辦事，掌握政權。而且滿人的政權也不輕易託付漢人。「手無斧柯，奈龜山何？」自不免有些灰心。他曉得「日中則昃」的道理，「臨澤履薄」，「大懼隕越」，既不能「退藏避事」，只好逆來順受，推美讓功。同治四年他奉命勦捻。捻匪是一種純粹的流寇，東奔西竄，從咸豐初年起於魯豫蘇皖的邊

邑，擢擻十幾年，蔓延七八省，蒙古親王僧格林沁是清朝最倚重最著名之大將，「惟事遇躡，勞而無功」，結果在曹州陣亡了。國藩把南京所未撤的四營湘軍，再招二營新勇，共三千人作爲親兵。淮軍尙有五萬餘人，調以北征，有時候就指揮不靈了。他先建議：「流寇飄忽無常，宜各練有定之兵，乃足制無定之賊，臣由臨淮進兵，將來卽以爲老營，及江蘇之徐州，山東之濟寧，河南之周家口，四路各駐大兵爲重鎮，一省有急，三省往援，庶幾往來神速，呼吸相通」。後來他規定防守運河，扼守沙河賈魯河的戰略：「始終堅持，不以艱難而自盡，不以浮言而中更」。這就是所謂長圍圍制的方略。和孫傳庭所說的：「勦流寇當困之於必困之途，取之於垂死之日」，是一樣的意思。但當時人都覺得國藩行師迂緩，「謗議紛起」。於是同治五年冬，他奏請開缺留營自效。清廷以李鴻章代辦勦匪事宜，命他回兩江總督任。他四次懇辭，均未許。其實李鴻章後來把捻匪打平，長牆壁，「偏之不流」。還不是用他的方略嗎？七年國藩調直隸總督，一年間凡清積案三萬餘件，清廷也說他：「辦事認真，於吏治民風，實心整頓，力挽敝習」，似乎應該讓他好

好的整頓一下了，不料同治九年，天津又出了教案。老百姓因迷拐幼孩，謠傳係天主教所爲「挖眼剖心，採生配藥」。羣衆忿激，焚燬教堂，把法國領事也打死了。曾國藩爲顧全大局，奏誅爲首滋事之人。於是輿論大譁，都說他偏護洋人，至呼爲「賣國賊」。在北京的湖南人，把他所題會館的匾額也燒燬了，大有「白簡紛紛，舉國欲殺」之勢。國藩亦引咎說：「內慚神明，外愧清議，聚九州鐵不能鑄此錯」。清廷更責他拘泥，因兩江總督馬新貽被刺，仍調他回兩江。令李鴻章接任往辦。李鴻章抵津未久，就報結案。當時人都覺得李鴻章的聲望韜略似乎比國藩還大，其實這是他的運氣好，因爲恰逢普法戰爭開始的時候，法國人那裏還有閒功夫管這些小事呢？以上兩件事，都是國藩試作而未成功的，難道這些工作比平定太平天國還要難嗎？或者他已成了強弩之末呢？其實都不是的，乃因其名位太隆，時人的責望太切，國藩所以不能不競業自持者亦在此。李鴻章的機會又太好了，他碰到了這樣一個聖德的老師，加以淮軍用新式武器，新事業都由鴻章承辦，他和外國人的接觸最多，所以李鴻章就代替了曾國藩的地位，而爲晚清命運之支持者。

再以湘淮軍造成私人的軍隊，後來演變成軍閥一事而論；有人也歸咎於曾國藩，說是他的守舊事業的流弊。其實國藩更不能負這個責任。他在堅辭節制四省的奏摺中說：

臣與左宗棠任返熟商，規復浙江，惟當竭誠合謀，斷不敢稍存畛域。所以不願節制四省，再三瀆陳者：實因大亂未平，用兵至十餘省之多，諸道出師，將帥聯翩，臣一人權位太重，恐開斯世爭權競勢之風，兼防他日外重內輕之漸，機括甚微，關係甚大。區區微忱，仰祈鑒納。

「外重內輕，機括甚微」，他確乎是有先見之明的。其所以諷刺李鴻章的腳根下之淮軍，並且在捻亂平定後，奏請遣散湘淮軍，可見他的用心很深，非李鴻章一般人所能了解。這件事為整個的政治着想，清廷當然要說他「惴惴真摯，有古大臣之風」。若拿現在的眼光來看，他把湘軍遣散了，使湖南人「憤鬱慘沮」而相率加入會黨，反替革命黨增加很大的勢力。假如不是李鴻章把淮軍變為私人的軍隊，何以能樹立漢人政權，讓袁世凱利用新軍來推翻滿清呢？辛亥革命之所以能迅速成功，就是假借這兩種力量，可見天下一切的事理，

都有相反相成的作用。他們對於民族革命的功過也足以相抵了。我們並不是故意找出理由爲曾國藩辯護，因爲要從全盤歷史上看，實在有他的「機括」，絕不能僅就形式上來論斷的。而且他辭節制四省之命，一方固然要「防外重內輕之漸」，同時並有與賢才共天位之意。一個人的才力有限，天下的事情多麼繁賾，儘一個人能包辦得了嗎？「與其多掘井而皆不及泉，不如只掘一井」。這種恢廓的思想和豁達的態度，真不愧爲中國文化的代表人物，也可以說是理想人物了。

但是不幸得很，曾國藩纔到六十二歲，就病故於江南任所了。他在天津的時候，曾患右目失明及暈眩症，自然都是積勞所致。臨死的前幾天，他出城迎接一個朋友，忽口噤不能言，旋愈旋發，自知精神散漫，猶力疾辦事看書。有一天午後，他到花園散步，兒子曾紀澤跟隨奉侍，他連呼足麻，扶回書房，端坐而逝。這正是同治十一年二月四日戌時。江南士民巷哭野祭，如喪慈母。清廷亦震悼輟朝，賜卹致祭，予諡「文正」。上諭說：

曾國藩器識過人，盡瘁報國，當湘鄂江皖軍務棘手之際，倡練水師，矢志滅賊，

雖屢經困阨，堅忍卓絕，曾不少渝，卒能萬衆一心，削平逋寇，功成之後，寅畏小心，始終罔懈。其薦拔人才，如恐不及，尤得以人事君之義。忠誠克效，功德在民，允宜疊沛恩施，以彰忠藎。

曾文正公一生的嘉言懿行，處處都值得我們效法，豈僅一般朋僚或朝廷幾篇崇德報功的文字，所能盡其萬一？他生平的事業，完全是從學問修養而來的。要明瞭他的爲人，只有就他自己的著作中可以尋繹一二。據年譜所載，他的著作如下：

文集十二卷。

詩集四卷。

批諭奏章百二十卷。

政蹟批牘二十四卷。

書札六十卷。

日記三十四卷。

尺牘五十卷。

家書二十八卷。

曾氏家訓長編，已成朱子小學一卷，冠禮長編一卷，歷朝大事紀數卷，藩部表一卷，

鈔輯鹽漕河工水利賦役成案各若干卷，餘則臚列序目。

十八家詩鈔三十卷。

孟子四類編，左氏分類事目，禮記章句校評，樸目雜記，周官雅訓雜記各若干卷。

經史百家雜鈔二十六卷。

古文簡本二卷。

鳴原堂論文二卷。

論語言仁類記一卷。

易象類記一卷。

通鑑大事記及六家詩鈔均未成書。

門人王定安錄師訓彙記若干卷，求闕齋弟子四十卷。

在他的全部著作中，最重要的是詩文、書牘、日記、奏諭四項：詩文可以知其造詣之境，書牘可以睹其性情之真，日記可以審其修養之功，奏諭可以徵其爲政之績，但必須體會出他的中心思想和一貫之道，方纔能提綱挈領；要不然的話，就只可看見一些吉光片羽。近人有譏其文集多贈序壽序者，說他也蹈歸有光姚鼐的故轍，能言未必能行。不知他的文集，中，贈序壽序，都是些極有關係的朋友，雖然沒有像顧亭林那樣嚴格的「一概不爲」；但亦不是無謂酬之作，頗有因文見道的意思。集中論文只有首列五篇，是他的思想之結晶。由天道的理則（順性命之理），而修人道的慎誠（君子慎獨論），其用之於政治者，則「選賢任能」（原才），「賞功罰罪」（烹阿封卽墨論），爲古人所標之八字訣，即可以盡「經世」之能事了。最後拿覺悟來綜合情慾理智之演進（召誨），人生自然就有一個歸宿。雖僅短短數千言，要非有真學問者不能道，也非有真理解者不能懂，讀者應勿等閒視之！他曾說過：「僕之鄙願，苟於道有所見，不特見之，必實體行之；不特身行之，必

求以文字傳之後世」。他是作到了的。他何嘗又輕於寫作呢？嗚呼！曾文正公往矣！離現在不過七十餘年，其救世之宏願，雖因社會的積弊而未償；但學業的典型猶在。倘使我們不能紹其遺徽，振其宗風，則不惟辜負了這位偉大的先哲，實亦辜負了中國文化的遺產！我們應當如何的努力呢！

| | |
|-------------|-----------------|
| 民國 53 年 4 月 | |
| 登錄號碼 | 3215 |
| 分類 | 982.877 4412 |
| 編號 | |

